

炎黄春秋



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的时候



错误批判马寅初的前前后后

中国四大家族及其子女现状

鬼戏《李慧娘》冤案画上句号

水的贫困威胁着中国的生存

10
'94

戴林，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花鸟画研究会顾问，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他1914年生于河北深县，自幼酷爱绘画，1933年考入北平北华美术专科学校，先后从师齐白石、王雪涛等著名画家。1938年戴林投身救亡洪流，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抗日宣传工作，解放后在继续进行国画创作的同时，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他桃李满京华，有的已是颇有成就的书画界的名家。

戴林擅长写意花鸟画，60年艺海泛舟，朝夕研磨，博采众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花鸟画作品浓郁清丽、恬静洒脱，洋溢着诗意。尤其他笔下的牵牛花，厚重而又俏丽，豪放而具精微，历来为行家所称道。

筆
墨
清
香
洗
塵
四
喜
圖
戴
林
畫



戴林花鸟画二帧



上：华涵清露香洗尘
下：四喜图

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时候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制成功,曾经历了怎样的日日夜夜?爆炸当日,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忠实地纪录了这段光辉的史实。

东北抗日英雄马占山传奇

马占山——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的英雄。其人其事颇具传奇色彩。此文既写马占山将军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也记下了他的憾事与结局。

鬼戏《李慧娘》冤案画上句号

六十年代初,老作家孟超新编的昆曲《李慧娘》,深受广大观众的赞赏和戏剧界的好评。这出戏从改编到演出,原曾得到康生的支持和赞许。可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康生“翻脸不认账”,竟串通江青之流,把《李慧娘》打成“反党毒草”,对作者更是落井下石,致使孟超同志含恨而死,实乃亘古奇冤。

错误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前前后后

错误批判马寅初,早已成为一段过去的不可挽回的历史了。此文严谨准确地叙述了这段历史,并且提醒今人后人,牢牢记取这类问题的经验教训,再不能重复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了!

水的贫困严重威胁着中国的生存

水的贫困,是文明的贫困,也是时代的贫困。危机存于中国的每一条河流。若是长江、黄河洪水泛滥,百余计的城市将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这绝非危言耸听。此文读来令人警醒!

编读往来

编者按:本刊特邀编委温济泽同志就党中央最近发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给本刊写来一信,提出具体落实的4条建议。建议是切实可行的,我们将据此组织稿件。现将温老的信刊载如下:

把爱国主义旗帜更高举起

最近中共中央发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极为重要。《炎黄春秋》一向以宣传爱国主义为宗旨。我看了《纲要》,觉得《炎黄春秋》在宣传爱国主义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加强。

一、《炎黄春秋》介绍过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在重大事件逢五逢十周年和著名人物诞辰或忌日逢五逢十周年还发表纪念性文章,如今年第三期《甲申三百五十年》、第九期《揭开甲午历史的黑匣子》等,都很受读者欢迎。明年(1995年)的历史重大事件有:甲午战后签订《马关条约》一百周年(4月17日)、五卅运动七十周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等;著名人物纪念有:孙中山逝世七十周年(3月12日)、瞿秋白就义六十周年(6月18日)、方志敏就义六十周年(8月6日)、秋瑾诞辰一百二十周年(11月8日)等。建议尽早作出规划,能有充分时间进行组稿等工作,以利于提高宣传质量。

二、每年都有值得纪念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如1996年就是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百四十周年,又是朱德诞辰一百一十周年;1997年我国将收回香港;1998年是谭嗣同六君子被害一百周年,又是周恩来、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如果把这样的纪念一年一年坚持下去,十年百年一个轮回,就可以永久持续不断,教育子孙后代。

三、对重点事件和人物的纪念,除用纪实文学体裁外,还可用诗歌、散文等体裁,还可用照片、遗文、遗墨、书信等,力求多样化,更能吸引人。

四、《炎黄春秋》有很多老年读者,也有不少是一家三代人都爱读的。我家就是如此。希望老年读者能把有关文章广泛介绍给青年(包括子孙亲友等)阅读,使爱国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代代相传,深入人心。

以上建议,谨供参考。

温济泽

1994年9月12日

目 录

人海浪花	时代潮	古镜台	颗星篇
(56)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其人其事 (62) 四大家族及其子女的现状	(66) 水的贫困严重威胁着中国的生存 (74) 大漠女儿情	(81) 古代廉吏拒贿术 (82) 西陵山下话嫖祖	(86) 胡耀邦谈鲁迅杂文
王雷 马克锋	徐刚 张斌	杨开保 鲁諝	田方

《炎黄春秋》1994年第11期

要目

- △美国友人目睹的乒乓外交内幕
- △周恩来与胡志明兄弟友谊50年
- △中国人你还知道“甲午”吗?
- △60年前谋杀蒋介石案的策划者
- △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是怎样被谋害的
- △设计美国多座重要桥梁的邓文中博士
- △海外华裔投资中国大陆纪实
- △一代宗师郑玄
- △抗日英雄黄骅被害与平叛始末

封面、封底图片说明

- 封面上图：周恩来总理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 下图：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 左图：东北抗日英雄马占山
- 封底上图：西安事变时期的蒋介石、宋美龄和孔祥熙
- 下图：昆曲《李慧娘》剧照

当中国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李翼振



三十年前，1964年10月16日，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最早发明火药的文明古国从此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原子时代。炎黄子孙用自力更生研制的原子弹一声惊天巨响，重新塑造了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辉形象，显示了新中国建设美好前景的信心和力量。

那时，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常驻非洲统一组织总部所在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远在国外，我亲身感受到当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来时，国外友好人士纷纷表示庆贺的真挚情意。我回国后，才知道我国西部核爆炸基地司令原来是我所认识的参加过上甘岭作战指挥的张蕴钰将军，他告诉我，戈壁滩核基地建设的艰苦岁月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现场观察的壮丽情景。

国外的祝贺

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那一天，我在非洲屋脊被称为“新的花朵”的亚的斯亚贝巴，喜讯不断从收听世界广播的新闻界朋友那里传来。事又凑巧，苏联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莫斯科消息也在同一天传开。一时间，朋友们的

主要话题，几乎口口声声都谈论：“中国原子弹爆炸！赫鲁晓夫下台！”一心想卡死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赫鲁晓夫，在中国自力更生核试验成功之日倒台，岂止是历史的偶合，它恰恰是历史的无情讽刺。

1964年10月16日傍晚，我正在新华分社准备听电台广播，忽然接到埃塞俄比亚新闻部办公室官员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声音激动地对我说：“密司脱李，向你祝贺！中国今天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原子弹爆炸前，绝对保密，新华社事先没有什么内部通知。我一听这一特大喜讯，无比激动，立即驾车赶到新闻部亲自看看收报机上有关中国核试验的世界电讯。一到那里，几个埃塞俄比亚朋友热情地同我握手，口中一再说：“重大新闻！重大新闻！祝贺！祝贺！”这时，亚的斯亚贝巴电台英语广播也迅速播报了这一北京重要消息。电台广播中，赫鲁晓夫下台令人注意。当我又赶到附近《埃塞俄比亚先驱报》社时，大办公室内正忙于工作的编辑、记者一见我，也都欢呼般地围过来向我祝贺。他们高兴地争先诉说：“今天两大新闻：中国成功地爆炸原子弹！苏联赫鲁晓夫辞职倒台！”

我回到分社，专门收听北京国际电台对海外的广播，仔细地听了中国核试验的新闻公报和中国政府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声明。我随即驱车去看望非洲统一组织总部秘书长特利·迪亚洛先生。我们平时很熟，还没等我开口，迪亚洛急切地询问我关于中国爆炸原子弹的事。显然他已经听到了电台的有关广播。我说，我刚收听北京电台，这消息是确实的，中国政府同时发表声明，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时，这位非洲统一组织的高级官员竟情不自禁地同我热烈握手和拥抱，脱口而出：“我的兄弟，祝贺！祝贺！”

那时，埃塞俄比亚尚未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只有新华通讯社派我和陈忠英两名记者常驻那里。那年（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十四国时对埃塞俄比亚作了友好访问。随访的乔冠华、龚澎同志戏称我们是外交前哨的“新华社夫妻店”。周总理的来访积极推进了中埃友好关系的发展，达成了“不久的将来正常化”的协议。这时，中国沈阳杂技团正在亚的斯亚贝巴访问演出。那一晚上，埃塞俄比亚新闻副大臣克比德在观看杂技团演出前特地提前来到剧场后台，他对我杂技团团长丁波说，他听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很为高兴”。他主动同丁波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第二天（17日）上午，埃塞俄比亚外交大臣依弗鲁介绍第二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情况，在他的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我赶去参加听他讲些什么。记者会中间，他扫视出席的当地和外国记者。他认识我，当他的目光同我接触时，自言自语：“原子弹……”。他于是在在场的记者们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爆炸了原子弹……。埃塞俄比亚参加了核禁试条约。中国多次清楚地表明，它不赞成这一条约，但主张召开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一项销毁一切核武器的决议。……如果中国爆炸它认为对它安全有好处的一个原子武器的话，那么它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当有记者问：不结盟会议是否讨论了印度提议派代表团去北京呼吁不要爆炸原子弹。依弗鲁反问道：讨论结果怎样呢？为什么中国现在爆炸原子弹。他斩钉截铁地说：“什么决定也没有作出，这就是我能够告诉你的。”（按：印度的提议只得两票，没有通过）。招待会结束后，不少新闻界朋友又过来同我握手祝贺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些天，我还见到坦桑尼亚等非洲一些国家的使节，他们也都对我国核试验成功表示热情关切和衷心祝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西方大国核讹诈的威胁下。把我国核试验成功看作是受压迫人民扬眉吐气的壮举。我在许多场合，见到相识或不相识的许多人，大都友好地向我呼唤：“中国，原子弹！中国，原子弹！”

10月19日，一向对中国友好的埃塞俄比亚拉斯·伊姆鲁亲王特别接见中国杂技团团长丁波和副团长王金山，他也很自然地谈起已经家喻户晓的中国原子弹。他表示欢迎中国核试验成功。他说：“我们高兴中国在过去几年间所取得的科学成就。你们取得了其他某些国家业已取得的成就。有的国家（指西方）也许会感到震惊，但我们埃塞俄比亚人是十分高兴的。”

同一天，埃外交大臣依弗鲁也接见了中国杂技团领导人。他在谈话中，又主动提起中国原子弹。他爽直地说，由于在埃塞俄比亚还没有中国的正式外交代表，他愿意向丁波团长表示祝贺。他强调说：“埃塞俄比亚和中国都反对使用原子武器，但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有自卫的权利。”这位外交大臣还深情地回忆周恩来总理不久前对埃塞俄比亚友好访问的情景，他重申：“埃塞俄比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在不太远的将来，事实上在最近的将来就会正常化起来。”

新华社驻外记者远离祖国，但与祖国心心相连。对于上述非洲朋友与中国人民息息相通的友好情意，我迅速地向北京发回公开的或参考的报道。总社收到后

及时向国内外播发，积极地配合了当时国际宣传斗争，尤其是《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迪亚洛祝贺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道（《人民日报》头版显著地位刊载），在国际上起到了很好的影响。

没几天，国内经邮局给我寄来了许多份英文版《北京周报》，内载我国核试验的新闻公报、中国政府的有关声明和周恩来总理就中国核试验问题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电报。正好各方面朋友向我索要有关材料，我当即把这些《北京周报》分送给他们参考。据看过这些材料的朋友反映，他们对于中国核试验的情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对中国的严正立场表示理解和同情。

这时期，当地报界终于冲破西方压力，公开发表对中国核试验较为公正的评论。《埃塞俄比亚呼声报》10月21日的社论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拥有一亿九千万人的某个国家（按：显然指的是美国）为了保证他们自己的生存而必须掌握热核武器，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七亿中国人民不应当采取旨在保卫他们自己国家安全的一切步骤。”社论又说：“可以肯定，就维护国际和平安全来说，危害不是在中国最近试验它的原子装置时发生的，而是在世界另一部分爆炸第一颗核弹时发生的。”社论最后说：“因此我们认为，在抱有各种意识形态信念的所有国家都愿意和希望签订一个禁止一切核武器的公约以前，世界必须承认中国人民和中国炸弹的现实。”这家半官方半民间的报纸，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有美国影响的国家中，竟然能够仗义执言，明确支持中国进行核试验，实在是很难得的。这多少反映发展中国家在中国核试验成功的鼓舞下，敢于触动不可一世的西方大国，敢于同西方盟主论一论理；这也说明，中国核试验成功打破了核垄断和核威胁，在发展中国家人民中是深得人心的。

11月15日，官方的《埃塞俄比亚先驱报》沉默了一阵子后也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原子弹》的社论。社论认为，由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邀请中国参加世界全面和普遍裁军的有关会议刻不容缓，“否则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协议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价值”。社论指出，阻碍中国参加世界各种会议的“主要是政治性质的考虑。带头反对承认中国及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国家一直是美国。”社论最后直率地指出：“为了更广泛的和平利益，中国必须被接纳进入各种国际会议，从而让它起它的作用。试图使自己相信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今天并不存在是没有用的。事实是中国存在的，而且现在有了原子弹，因此它的存在就毫无疑问变得现实得

多了。我们应该面对事实。”

埃塞俄比亚虽然只是世界的一角，但仅从这个尚未同我建交的非洲国家舆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中国有了原子弹，中国的声望提高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呼声增强了，西方妄图继续阻止世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是不得人心的。

访核基地司令张蕴钰将军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天新闻公报只宣布：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现在人们都知道，那是在我国西部新疆罗布泊戈壁滩上爆炸的，那里是我国核爆炸试验基地。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30周年之际，我特地拜访了首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将军。他现住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的家中，他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职务上离休以后就家居在这里。他任核基地司令时，曾多次参加和组织指挥过原子弹、核航弹、核导弹和氢弹等成功试验，1988年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一座小楼的底层一间幽静的会客室里，张蕴钰将军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认识时他还在奋战上甘岭的十五军参谋长任上，后升三兵团参谋长。1958年底，张蕴钰（原大校后晋升少将）由陈赓大将向聂荣臻元帅推荐，光荣地走上了首任核基地司令员的重要岗位。他是河北省赞皇县人，1937年参军，同年入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今年七十七岁。战争年代炮火连天的日日夜夜和戈壁滩连续核爆炸的坚强磨练，在这位将军的脸庞上留下了明显的老年斑，令人肃然起敬。他虽年事已高，但却身体健壮，言谈温文尔雅一如以往。他的谈话，他写的《中国的一日》和他的诗词百首集《戈壁言情》，生动地告诉我，核基地成千上万中华儿女的艰苦创业和革命军人、科技专家视死如归的英雄事迹，令我深深感动，久久难以平静：1964年10月14日下午，我国西部罗布泊戈壁滩的一座石屋里，聚集着十多位将军和科学家，其中就有张爱萍，刘西尧、成钧、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卿云、朱光亚、程开甲和毕庆堂等人。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会议。这座一明两暗的石砌小屋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子能工业部）副部

长刘西尧由北京来到核爆炸试验场区后的办公室兼寝室,这是整个场区唯一的“高级”住房。

会议最后,主持会议的试验委书记、首次核爆炸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上将,庄严宣布已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决定和命令: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这一久已盼望的日子终于即将到来,与会同志都很兴奋和激动,而六年来一直坚持在戈壁滩艰苦奋斗的张蕴钰尤其心潮如涌。还当我国科学家奋力攻关研制我国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的时候,张蕴钰即受命率领先后来的二万多解放军官兵和科技工程人员,日日夜夜在此大漠荒野,风餐沙浴,为迎接我国史无前例的原子弹爆炸和效应实测创建各项工程设施的试验

区和高级步校选调来的干部,有屡建战功的工程兵部队、运输部队和通信部队,有朝鲜战场归来不久的防化连队和医务工作者,有大城市科研单位等抽调来的科技专家和气象专业骨干,有新从学校毕业的男女大学生……。中华民族这些优秀儿女,来到荒僻的戈壁滩上安营扎寨,住的简陋帐篷和地窖。土坑当床,土堆为桌,狂暴的大漠风沙有时会把帐篷掀翻扯碎。戈壁滩滴水珍贵,初到时,洗脸用茶缸,刷牙隔天,洗澡干搓。部队到了这里,立即修道路,建营房,引水,运粮……,一切都从零开始。

1960年初,以工程建设为主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始了。气象站、通信工程、军用机场,以至科研所的简陋实验室……一个个逐渐建立起来。戈壁滩上一个螺丝

钉、一个零部件乃至一针一线,都来之不易。运输线长、工程项目多,施工量大,大批物资包括精密仪器和贵重设备器材不断从全国各地调运到试验场区。汽车司机常年累月在茫茫戈壁滩简易道路上长途行驶,一路与缺水、饥饿、风沙、寒冷、酷热作艰苦斗争。场区缺乏装卸机械,人力扛抬。同志们不叫苦不嫌脏,只是说:“为我们国家自己的原子弹出力流汗,累死了也心甘情愿!”冬天,戈壁滩天寒地冻,可施工场地到处都有只穿单衣干活的年轻人,在刺骨的寒风中淌着汗水。为了祖国的核事业,为了祖国的明天,他们在戈壁滩上默默地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正当我国积极开展原子能事业的时候,苏联赫鲁晓夫对我国

搞突然袭击,1960年8月,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带走资料,停止提供重要设备器材。我国刚刚起步的国防科技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赫鲁晓夫施加的压力并没有使中国人民弯腰。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发愤图强的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发展原子能事业。陈毅同志甚至用这样的话表示要为祖国争气的决心,他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



■张爱萍在核试验基地向周恩来报告: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获得成功

场地。

神秘的罗布泊蕴藏着中华儿女的奋斗诗史!

1958年12月,张蕴钰和政委常勇亲自到我国西部各地勘察选点,寻找合适的试验场地。他们决意远避我国古代石窟艺术敦煌宝地,转场来到远离人烟的罗布泊戈壁滩。他们看到的这里还是原始洪荒景象。1959年初,大批人员肩负着向亲友保密的光荣使命,辞别东方繁华的城镇,西出阳关,滚滚而来;有原志愿军、各大军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对我国戈壁滩核试验基地建设当然也带来了实际困难和影响。我国自己何时能搞出原子弹？试验基地要不要加紧建设？加之当时国内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基地编制员额紧缩了，部分干部调走了，供给标准降低了，肉蛋没有了，口粮减少了，特别是1961年基地工作困难重重，然而，赫鲁晓夫刮起的阴风，并没有把肩挑重担的基地领导吹垮压倒。基地领导仍坚信党中央，坚信我国科学家，坚信勤劳勇敢的广大群众，坚信我国核事业的光明前景，自始至终坚持在戈壁滩基地的艰辛岗位，没有离开基地一步。而且有的还把自己的家属也从条件优越的大城市迁到了风刮沙扬的戈壁滩来。张蕴钰司令员表示决心，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原子弹爆炸），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有一天要搞出自己的原子弹！”就这样，领导干部坚持职守、密切联系群众并对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大大激励了基地全体同志以戈壁滩为家，以艰苦创业为荣，努力克服困难，为核事业的发展而奋斗到底。

1962年下半年，基地领导人获悉：我国原子科学家进行的爆轰物理实验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和点火装置研制都有了迅速发展。这预示着，我国原子弹进行爆炸试验的日子已经不会久远了。

基地领导认识到，如果原子弹爆炸试验基地的各项工程建设赶不上有关科研生产部门的核武器研制生产的进度，那就会耽误和影响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整个进程。核试验基地责任重大，基地的建设工作进一步加紧了。

不久，又传来消息：周总理出访国外归来在乌鲁木齐短暂停留时，对当地同志说：我们有个原子弹武器靶场，“他们在戈壁滩上条件很艰苦，任务很艰巨”，希望有关各方“给予帮助，大力支持”。总理的话，传到基地，基地同志们倍受鼓舞，深深感受到了党中央对基地工作的亲切关怀，增强了对核事业前景的信心和力量。

从此，基地承担的核试验这一艰巨任务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基地的各项工程建设重新走上正轨，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罗布泊戈壁滩紧张忙碌起来，同志们士气高昂，齐心协力，向着二机部提出的1964年目标前进！

张爱萍上将现场总指挥

1964年初，戈壁滩基地大部分主要试验工程完成了。但基地同志们即使在这个时候，仍然连轻松一下喘口气的机会也没有。科研战线上的喜讯接连传来，我国科技专家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解决了核燃料的生产问题；与此同时，核武器装置部件生产也进展顺利。于是，基地进入了非常紧张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前现场准备阶段。

我国原子弹试验工作的安排，首先是地面试验，然后进行空投，最后转入地下。因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方式确定为地面爆炸试验。地爆试验是由地面高大铁塔托举原子弹装置，通电触发引爆，因此也称塔爆。

这时，一座一百多米高由无缝钢管结构正方形断面的自立式巨型铁塔已经在爆试场区中心高高矗立起来。这是由北京一家金属构件厂为基地特制的，在六十年代这是我国绝无仅有的最高建筑。铁塔设计别致，塔上有工作间，电气、空调、起吊等系统。控制原子弹起爆和测量仪器动作的是一套有线电自动控制系统，主控站距离铁塔爆心二十多公里。

在广阔的大漠上，高耸的铁塔是整个试验场区的一个耀眼目标，催人奋进。张爱萍将军三首十六字令是这样描述这座即将托举原子弹执行神圣使命的塔架的：

塔，
立地顶天披彩霞。
沉戈壁，
从此放光华。
塔，
暴雨狂风任凭它。
金钢体，
挺立战黄沙。
塔，
百炼千锤聚精华。
冲天塔，
喜报飞天涯。

六七月间，全国各地参试单位云集而来，分批进场。天山公路上连日连夜奔驰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车上覆盖着土黄色的伪装布，充满着秘而不宣的气氛。

参加核爆炸效应实物测试的有来自陆海空三军、炮兵、装甲兵、通信兵、铁道兵、防化兵、军事科研机构

以及中国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许许多多单位。基地科研部门的力学测量、光学测量、核测量、理论设计、自动控制等重要科室以及基地的气象、通信、防护、警卫、后勤等单位也都全部投入战斗，积极进行大量的技术准备，在高温干旱的大漠条件下，对多项目、广布点的仪器设备，反复进行适应环境的安装调试。

分布的主要效应实物有坦克、大炮、装甲车、飞机、舰艇、通信设备、工事设施和坚固建筑物等等；还有猴、狗、羊、大白鼠等各种动物以及医药、食品、水、油料等多种物品。参试的1100多吨技术物资（加上32000多吨后勤保障物资），是顽强的汽车驾驶员克服包括防止仪器震坏等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才运进场区的。运送海军舰艇时，有的军舰太大太重，锯断后运到场区再重新焊接。

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效应实物在铁塔四周星罗棋布。这些被放置在铁塔爆心周围不同距离和不同防护环境的效应实物，像大战打响前一样，严阵以待，都将接受原子弹爆炸烈焰的严厉考验，以便核爆炸后获取各类实物在不同距离不同防护条件下所受到的不同程度伤害的可靠数据。

8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以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为为首的中共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二机部部长刘杰在这段时间受命在北京，直接负责周恩来总理和张爱萍将军之间的密切联系。接着，核试验现场总指挥部成立，张爱萍为现场总指挥，刘西尧为副总指挥，张蕴钰为总指挥部参谋长，统一指挥来自全国各地各单位全体参试人员，团结战斗，胜利完成我国首次核武器爆炸试验的艰巨任务！

广阔的试验场区热火朝天，群情激昂，欢乐地传唱着张爱萍总指挥为基地春雷文工团作词的歌曲：

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
不怕困难，
不畏强梁；
任凭天公多变幻，
那管风暴沙石扬。
头顶烈日，
明月作营帐。
饥餐沙砾饭，
笑谈渴饮苦水浆。
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
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敢想敢干，
突破尖端，
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为祖国争光，
人类解放。
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核爆炸试验是大规模综合性的具有危险的科学试验。周总理向参试人员及时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现场总指挥部在核试验前，对试验场区进行重新布置和调整。直接参试人员尽量压缩到五千多人。建设场区的成千上万部队和后勤保障人员直接为试验提供服务。进入试验场区直接参试的所有单位所有人员，都一律编入试验的战斗序列，在统一指挥号令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行动，严守纪律，共同战斗！

基地研究所的34位姑娘都是大学毕业不久来到戈壁滩的。她们在强烈要求下被批准直接参加第一次核试验后，兴高采烈。在场区的东北角有一套几座帐篷连成的“四合院”，她们就住在那里。张爱萍将军给她们的住地取名“木兰村”。直接参试的“木兰村”姑娘又被人称为“核大姐”。她们和“将军队”赛球，和“核大哥”拔河。姑娘们和“核大哥”一样在试验场区无私无畏地勤奋工作和奔波，为崇高的事业和理想作出了终生难忘的贡献。据说，这些姑娘中有人至今已年近花甲却还过着孑然一身的生活。中华优秀儿女就是这样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所热爱的事业，献给了亲爱的祖国。

1964年八九月间，试验场区各单位分别进行预演，然后全场联合预演，对核武器装置的运输、装配、控制、测量、侦察、取样、回收、消洗等等进行了全面演练。核试验的主角——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试验场区露面了。在绝密情况下，原子弹装置部件是从研制生产的某地分批次安全运送来的，它在场区的装配厂房进行总组装。

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气象保障必须让核爆炸放射性烟云飘落在无人地区，避免由于风向的影响而扩大沾染范围。根据气象预测：10月13日以后的一周内，是核爆炸试验的理想“时段”。

9月中，张爱萍、刘西尧飞抵北京向中央汇报并接受指示和命令。回到戈壁滩后，张爱萍对试验场区的各

项工作又进行了最后审研和周密布置,甚至对于万一出现早爆、误爆的意外情况,也作了紧急处理部署。

就这样,10月14日,张爱萍总指挥最后宣布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定于1964年10月16日15时爆炸的决定。

14日晚上,19时20分,巨大圆球形的原子弹已经安全地放置到102.438米高的铁塔上了。它在塔顶,悠悠悠悠哉,安然自若,大家翘首以待那庄严时刻的到来!

原子弹爆炸的当天

原子弹起爆时间定为“零”时,以此倒计时,争分夺秒安排“零”前各项工作。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零”时就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

张蕴钰将军作为总指挥部参谋长和基地司令,他“零”前有许多工作要加紧布置和安排。10月14日会议结束后,他从张爱萍那间石屋出来,回到五六十步远他自己工作兼住宿的帐篷(司令部就在这里)已是晚上23时,即“零”前40小时了。

“已经定了!”一进帐篷,张蕴钰就兴奋地对基地副司令员张英和值班参谋说了这么一句。他告诉他们核爆炸试验的“零”时,要他们立刻通知有关负责同志和布置有关工作。

“好!”这位原志愿军师指挥员的张英也激动起来。他马上通过保密电话用相约的暗语通知坚守另一岗位上的另一位副司令员张志善。这时,爆炸的“零”时除了领导同志和有关操作人员外,仍然需要保守机密。

安排完一切。张蕴钰躺到行军床上已是午夜两点。没躺多久,次日黎明,他即早早起床了。

按分工,试验场区心脏部位铁塔由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负责;试验引爆最重要的关键岗位——主控站,由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把关。

10月15日,“零”前一天,张蕴钰乘吉普车几乎跑遍了试验场区的所有单位所有地方。首先,他随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去防化部队检查他们最后的准备工作。张



■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线指挥部的部分人员(自右至左为毕庆堂、张爱萍、刘西尧、刘柏罗、张蕴钰、范化冰)

爱萍在队前对这支“零”后就要去执行任务的英雄部队,像誓师一样激昂地作了战前动员。张蕴钰也作了动员讲话。离开防化部队以后,张蕴钰自己驾车赶到汽车团的供水连看看。试验场区点站分布之多和范围之广使他不能够在所到之处都做到长时间的停留。当他赶到气象部门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和韩云升处长交谈了顾震潮等气象专家预报的事,感到满意和高兴。韩云升这位蒙古族军人和气象专业老兵,为了核试验的气象保障,日夜在基地辛勤工作。

15日晚,“零”日的前夕,试验场区许多人,如“枕戈待旦”,睡不着觉。张蕴钰多少年以后还能记得那晚的月相:上弦月,月亮呈半圆形从顺时针方向看为右边发亮。

16日,原子弹爆炸的当天到来了。

李觉和张蕴钰于上午10时,分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驶去。当时,铁塔上任何一项工作也不需要他们,更不要说伸手去干。对塔上操作的技术专家,他们也没有丝毫担心。他们在这关键时刻去托举原子弹的铁塔那里,是完全为了陪同那里仍在完成最后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一起。张蕴钰幽默地说:如果铁塔顶上原子弹万一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响”了,我们就和塔上的同志一起来个“太空葬”,那将是一种灿烂辉煌的荣耀,那时我们

会成为最早庆祝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的中国人！

张蕴钰他们的吉普车，一前一后来到了铁塔前，在警戒线外停车。他们下车后，亲切地问候了值勤的岗哨。李觉将军主管铁塔，他钻进铁塔旁的一间小砖房，房内安装着引爆电缆的电闸，还有一架与塔上通话的电话机。他同塔上的同志通了电话。按程序，塔上正在进行接插雷管的工作。

塔上缓慢地放下吊篮电梯，几个操作人员下来，大家互致问候。接着，张蕴钰和李觉登上吊篮，吊篮徐徐上升，把他们送入塔上的工具间内，在那里他们清除了身上的静电后又登上几级台梯才进入爆室。室内，九院试验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检查。方正知教授是一位有着很高成就的科学家，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作风严谨。他简单地对进来的同志说：“就快完了”，然后像一个高级熟练工人那样又继续他的检查工作。

原子弹就在眼前，张蕴钰已经见过它。这时再在前面这颗原子弹，忽然觉得它似乎已经具有了灵魂，使人起敬。

检查完后，方正知教授在塔上最后一件工作是合上了起爆电缆的电闸。随后，张蕴钰在那张操作规程单上签上了名：

“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

从塔上外望，天空晴朗，四周极目所见是布阵有序的坦克、大炮等众多效应实物，悄悄地展开在广阔的地面上，情景就像大战前静寂的战场。

张蕴钰不由的摸了摸装在他口袋中的那把能够起爆这个原子弹装置的钥匙。

张蕴钰、李觉和塔上工作的专家走下吊篮。之后，方正知教授又进了塔旁的小砖房，也合上了那里的电闸。这样，从铁塔上的原子弹装置连接到主控站的起爆电缆已经全部接通了。张蕴钰又一次摸了摸那把钥匙，它还是那样紧贴在他的衬衣口袋里。

铁塔的所有人员都撤离现场。将军和专家也乘车离开了铁塔。张蕴钰的车是最后离开的。车走几百米，他又让车停下来，回头向铁塔看了最后一眼。这座铁塔在几小时后的“零”时核爆炸中将不再是现在的本来面目。

张蕴钰的车子从铁塔直接驶到主控站，他将那把可以启动控制台的钥匙，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在主控站把关的张震寰将军。在主控站，张蕴钰还看望了那里地下室工作的九院研究室主任邓稼先和基地研究所副所

长程开甲。这两位教授是新中国诞生后分别从美国和英国归来的著名原子能学者。原子弹装置部件运进场区组装后，程开甲教授不只一次对张蕴钰说：“它（原子弹）不能不响！”张蕴钰同这些在戈壁滩埋头工作的科学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诗赠著名科学家陈能宽研究员，诗曰：“能量戈壁天小大，宽裁细剪入微观。”

主控站的门洞口堆放着许多沙袋，这些都是防止核爆炸冲击波的压力向这里冲来。这使张蕴钰回忆起朝鲜战场志愿军利用粮袋装填土石构筑工事的情景。

张蕴钰从铁塔最后视察和在主控站交了那把关键的钥匙以后，他回到核试验总指挥部，向张爱萍总指挥复命。

总指挥部选择有利地形，设立白云岗指挥所，在露天堑壕中指挥和观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在张爱萍上将近旁，张蕴钰就位。在这露天场所的所有同志都戴着深黑色的防护墨镜，朝着铁塔爆心方向密切注视。

张爱萍现场总指挥有一架直通北京的专线保密电话，还有试验场区的通信联络设备。

总指挥的“K1”号指令发出，（原子弹爆炸）试验准备工作开始！

“K2”号指令发出，各项仪器进入工作状态。张蕴钰已经在自己的观察位置上。

“K3”号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10、9、8、7、6、……读秒的声音让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亢奋紧张，屏住呼吸，一片肃静。

15时许，读秒的“零”时刚过，突然，前方出现一道强烈的闪电般的光亮。闪光过后，眼前看见的是腾空而起的巨大火球，继而形成蘑菇云不断上升扩张。在整个场区，防化兵部队离铁塔爆心最近，他们最清楚看到了原子弹爆炸的壮观景象，隆隆巨响，犹如地震。

最初的欢呼声来自直接参试人员的参观人群中，他们被核试验成功时在眼前呈现的壮丽景观所激动，呼喊着的，跳跃着的，洒着泪水拥抱着，把帽子抛向天空。

在堑壕观察的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郭永怀等原子物理学家也都难以抑止内心的激动。张蕴钰兴奋得三步两脚走过去，向功在千秋的科学家们表示热情的祝贺。

张爱萍立即拿起电话，非常高兴地向北京报告：“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经刘杰转报周总理、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没想到经过两次报告，毛主

席还要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怎么证明是核爆炸？”尽管试验现场的军人和科技专家都认为这是核爆炸无疑，但却怎样回答北京的问话呢？正在此时，基地研究所用科学的方法测定出蘑菇云顶高约7500—8000米，从而迅速报出了“零”后第一个核试验数据。

张爱萍根据有关数据证实和现场专家分析，很快地再次向总理报告，爆炸威力估计为2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很理想，很成功。

原子弹爆炸后十分钟，防化部队二十多个英勇的侦察兵穿着防护服装，携带仪器，赴汤蹈火地首先出动了，他们要进入辐射沾染区进行实地侦察作业。

空中取样的飞机临空了，朱光亚教授不时抬头仰望，空军飞行员要驾驶飞机冒险钻进蘑菇云中，取回一定数量的核放射灰尘。

防护工作回收取样队的青年队员们，也视死如归地深入爆炸区，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取回了综合剂量仪和大部分接收放射性沉降物的取样盘及取样伞。

基地研究所所长张超和科技专家们紧张繁忙的工作开始了，他们在简陋的房屋和帐篷中，用不健全不先进的设备，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核试验各种实测数据的处理，并作出评价。

晚上，一份详细的文字报告经多方专家之手送到总指挥部，张爱萍和张蕴钰立即签发，于当晚17时50分报给了在北京的二机部部长刘杰。刘杰部长随即转报周总理。接着，北京发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给试验委员会和全体参试人员的祝贺和慰问电。

当天晚上在戈壁滩，很多直接参试的同志长久地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从将军到科学家，不少人写了诗词，抒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

最近，张爱萍将军签名送我一册他的诗词、书法、摄影选集《神剑之歌》，其中收录了他当年当晚在戈壁滩即兴填写的清平乐词《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词曰：

东风起舞，
壮志千军鼓。
苦斗百年今复主，
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喷射云空，
腾起万丈长龙。
春雷震惊寰宇，
人间天上欢隆。

张蕴钰将军《戈壁言情》中一首填写长相思词《首次核试验当日夜》是这样的：

光巨明，
声巨隆，
无垠戈壁腾立龙。
飞笑触山崩。
呼成功，
欢成功，
一剂量知数年功。
敲响五更钟。

当天晚上在北京，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庄严地宣告：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重大新闻很快传遍了整个世界。

核能的和平利用令世人瞩目

自1954年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发现铀矿资源，次年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正式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至1964年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为时不过十年。随后几年，我国又相继进行了空投原子弹、核导弹和空投氢弹的成功试验。现在，我国已把试验转入地下，也告成功。我国原子能工业一直重视将原子能用于和平建设事业。早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和平利用核能、造福子孙后代的宏愿，今天正在逐步实现。秦山核电站和大亚湾核电站先后建成并投入生产，输送强大的电力，已经显示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核技术在工业、农业、医疗卫生事业等方面的广泛应用，也取得了数十倍、数百倍效益的卓著成绩。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自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以后，如今西昌和酒泉发射中心已经成功地用先进火箭把三十几颗不同用途的人造卫星（其中五颗外国卫星）送上太空。

中国核能和航天技术的和平利用前景广阔，令世人瞩目。

东北抗日英雄

● 岳 峨

马占山传奇



明年,亚洲人民将迎来反对日本侵略战争胜利50周年。受这场战祸之苦最为深重的中国人民,对于为赢得这一胜利曾经立下功劳的任何人,都是不会忘记的。

马占山,这位“九一八”事变后,打响武装抗日第一枪的英雄,其人其事颇具传奇色彩。明年又恰逢马占山将军诞辰110周年、谢世45周年,本刊特发表《东北抗日英雄马占山传奇》一文,以资纪念。文章既写了马占山将军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页,也记下了他的憾事与结局。这些,无论是对熟知马占山其名的老年人,还是从未注意到马占山这个历史人物的年轻人,一定都是会感到兴趣的。

——编者

1885年,马占山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自幼丧母,家境贫寒,七八岁就为财主家牧马。他天赋聪敏,爱好骑射,练就了一身马上强功。苦难生活的磨炼,使他性格刚毅倔强,胆量过人。18岁时,为大地主牧马,因丢失一匹马而遭诬陷,被迫逃奔黑虎山落草。

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马占山目睹家乡民众受战争蹂躏之苦，不愿在绿林中混下去，立志从军，报效国家，遂投身怀德县地方武装游击队。不久被清军收编，从此开始了他的行伍生涯。他擅长骑射，作战英勇，在剿灭叛匪（与日、俄帝国主义相勾结的民族败类和匪徒）中屡立战功，深得上司赏识。在一次追击叛匪中，他一马当先，几个叛匪一齐向他射击，他在飞奔的马上，忽然身子一斜钻到了马肚侧面，将头探在马首下，双手射击，几个敌人应声落马。马占山的部下无不佩服。他为入侠肝义胆，重友情，讲义气，性虽刚直，心实慈善，待部属情同手足，他常说：“朋友有困难，找上门来才帮助，这不算真朋友。”因此，他深受部属拥戴。

1913年，随清军被改编到中央骑兵第二旅任少校连长。此后在剿灭叛匪等作战中都很得力，不断得到升迁，至1928年成为奉军的高级将领。1929年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1930年任黑龙江省的黑河警备司令。

在东北20多年的戎马生活，使马占山深深体会到自己的民族总是处于屈辱地位。日俄战争无论谁胜谁败，遭殃的都是中国百姓，尤其是日、俄帝国主义往往与土匪勾结，在东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中国当局对他们总是屈服顺从，民间稍有违抗，尤其是日帝，动辄以大炮击毁村镇，焚烧房屋、残害百姓。马对此极度愤恨。有一次日军由杨大城子移驻怀德县城，却限令中国军队于24小时内退出该地缘的20公里以外，东北当局竟全部接受此无理要求，正在这里驻防的马占山部接到命令，含泪率部出城。他曾说：“他日我若得势，一定要教训教训这帮外国强盗，否则，我吞不下这口洋气！”皇姑屯车站爆炸事件；张作霖和马的老上司吴俊升都被炸死，更激起他义愤满腔，决心“公仇私恨，必报复之”。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他指挥的江桥抗战，写下了抗日战争史的光辉一页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序幕。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政策，使辽宁和吉林二省兵不血刃地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咄咄逼人的日寇又进图黑龙江，只是因为黑龙江与苏联接壤，距其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较远，不得不有所顾忌。

此时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已经叛变，日寇拟假手张海鹏占领黑龙江。于是，为张逆提供大批枪支弹药，支持其宣布“独立”，并秘密策划进袭黑龙江。

消息传到省城齐齐哈尔，全城大为震惊，当时的省主席万福麟远避北平，一时群龙无首，秩序混乱，省军政两署也莫衷一是。

张学良设在北平的行营根据黑龙江省请示，先电令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为代黑龙江省主席兼任黑龙江省总指挥；后又电令：“如张海鹏进军图黑，应予讨伐，但对于日军务须避免直接冲突。”

张逆海鹏迫不及待，趁马占山上任前，于10月13日至15日派少将徐景隆带三个团进攻江桥。江桥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嫩江之上，是通往齐齐哈尔的交通要道。我驻防守军英勇还击，徐景隆触我地雷而亡，进攻之敌败溃。为防止敌军再犯，守军把江桥破坏三孔。与此同时，张逆亲率部分伪军欲从泰安镇方面攻击省城，又遭我省卫团徐宝珍部的迎头痛击而败逃。日寇对张逆海鹏的无能十分不满，靠其夺取黑龙江已无望，图穷匕首见，决意亲自出马，加紧进犯步骤，企图趁马占山刚上任立足不稳之机，一举侵占黑龙江省。

马占山受命于危难之中，他虽知省内兵力单薄，武器不精，但国难当头，不能退缩。“为国家争国格，为民族争人格”，即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10月20日马占山在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官典礼上强调：“……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即维持地方治安，望各位群策群力，共相赞助，各司其事，各尽其职。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在会上当即发表朴炳珊为省城齐齐哈尔警备司令，并分别通电各方。

马占山刚举行完就职典礼，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馆武官林义秀和领事清水突然求见，说是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要求马占山将黑龙江省政权和平让与张海鹏，被马占山斥之而去。本庄又致书说：“考察现之时局，为欲避免战祸，维持地方治安，其唯一方法为马主席即行下野，同时江省政府交与张海鹏，双方应于和平中行使政权之受授，此外决无良策。”张海鹏还无耻地托本庄代说，愿出美金500万元请马出国游历。对日寇的无理要求及张逆的卑鄙行径，马占山极为愤慨，断然拒绝，并说：“马占山决不能出卖黑龙江。你回去告诉本庄，他如想得黑龙江，可拿血来换，不要看不起中国人，拿钱来迷惑我。”

马占山到职后所采取的坚决抗日措施和断然拒绝



■马占山手迹

日寇多次提出的无理要求，使日寇极为恼火，于是赤膊上阵，进行一系列露骨的挑衅：10月26日，日军借口“匪患”进占我四洮铁路全线；次日，又向我方提出限期修复洮昂路嫩江桥的蛮横要求；11月2日，竟以“代”我修桥名义致我最后通牒，无理要我军撤退至距桥梁10公里以外，否则认为对日军有敌意，即行使用武力。同时，日军派铁甲车3列，载重炮两门及日军一小队由洮昂路向江桥进发。

面对日寇多次挑衅，马占山召集党、政、军、绅、商各界，共商应敌措施。会上以参谋长谢珂为代表主张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回击。而劣绅赵作仁、李维周等人却认为“黑省库空如洗，兵无利器，为顾全地方，和平应付……”，主张撤出阵地。马占山听到此投降言论，不禁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厉声说道：“我为一省之长，守土有责，决不能将寸土尺地让予敌人……”“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何如誓死一拼，以尽天职。”马还说：“如果我打错了，给国家惹出乱子来，请把我的头割下，送到中央去领罪。”马占山话音刚落，卫队团长徐宝珍立即站起，拔出手枪，大声喝道：“谁再敢说降，就杀了谁。”至此投降论者再不敢发言。最后会议决定：断然拒绝敌寇无理要求，严阵以待，抵御敌人的入侵。

11月3日，日军通牒的“期限”一到，上午11时果然有日寇两列铁甲车开到江桥，在5架飞机掩护下，30余名士兵武装抢修桥梁。此时我军仍十分克制，为避免冲突，拟将防守江桥的部队撤退到大兴站驻防地。但是，正当我军撤退时，飞机突然向我阵地投掷炸弹，当

即伤我士兵9名。当日天黑时，日军百余名渡过江桥（破坏处已用木材垫好）向我阵地射击，又用飞机投弹，再伤我士兵7名。我守军一忍再忍，未与抵抗，日军方退去。

11月4日拂晓，日本领事馆武官林义秀和书记官早崎，会同我方驻军负责中间指挥部责任的石兰斌及省府秘书张林业等，到江桥前线视察，商定各自训诫自己的士兵严守纪律，避免冲突。谁知正当石兰斌讲话之际，林义秀竟然迫石签字承认将驻军撤退，并要石立即下令。石说，他仅为第三旅参谋长，无权下令。正在争执中，日军突然进入我防地捕去我哨兵3名，再三交涉，不予放回。接着数百名日军渡江，在5架飞机轰炸的配合下向我驻军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我守军悲愤填膺，实在忍无可忍，在马占山指令下实行正当自卫，给予还击，日寇乃退。下午6时，日寇又以飞机7架为掩护，派兵四千，在4列铁甲车和数十门大炮的配合下，对我守军驻地大兴站发动全面攻击。至此，全面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

从11月4日到7日，为江桥抗战的第一阶段。守军全体将士在马占山的亲自指挥下，斗志旺盛，视死如归，与敌争夺，寸土不让。虽然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却能屡屡挫败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

11月4日，当四千敌军，以飞机7架、山炮数10门、铁甲车4列为掩护，气势汹汹向我阵地蜂拥而至时，守军卫队团徐宝珍部遵照马占山“设井擒虎”的战术，沉着注视敌人进入我有效射程内，齐起猛攻，使敌

人的锐气顿挫，然后乘机全线出击，冲至敌人队内，展开白刃战，短兵相接，使敌人的飞机、大炮和铁甲车都难以发挥作用。敌人被迫向江桥溃退，我勇猛围歼追击，使敌人遗尸遍野。

是日晚，不甘心失败的敌军又以重炮向我守军阵地猛轰，并用探照灯侦察嫩江北岸，掩护其百余只船的偷袭。等敌船将靠近岸时，我伏在北岸芦苇塘中的守军突然集中火力扫射，敌死伤及落船者不计其数，余者狼狽逃回南岸。

每当战况危急时，马占山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士气受到异常鼓舞。5日拂晓，8000多敌人在20架飞机、100多门大炮的猛烈轰击的配合下，强行渡江。我江岸守军顽强抵抗，虽毙敌甚多，但终因敌众我寡，我守军阵地被突破。正在这万分危急时，苏炳文部与吴松林部各一个团赶来增援。马占山乘车冒着3架飞机的追击赶到前线，进入正在厮杀的阵地。他一面指挥正面部队进行反攻，一面调动骑兵自两翼包围，血战至傍晚，敌人开始溃退。我一直追击至江岸，敌遗尸700余具南逃，我亦伤亡200余人。

11月6日战斗最为激烈。凌晨约4时，敌近万人冲过江桥，飞机川流不息轮番轰炸和扫射，大炮则连珠般向我军阵地轰击。我全体将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一直坚持到近午。猛烈的炮火将我阵地摧毁，将士们干脆跳出战壕与敌肉搏，敌气竭不支，抱头鼠窜。此役，死敌数百人，我方亦损失惨重。

至此，我士兵已连续作战三天三夜。马占山考虑到我大兴阵地已被摧毁，士兵又无援军替换，遂于6日午后下令守军转移阵地，将主力撤至距大兴站18里的三间房第二道阵地进行休整。

敌军经数次大的挫败，需要增援，遂由江桥南退60里，江桥抗战第一阶段结束。

黑龙江省守军退至三间房后，趁敌人等待援军之间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敌斗争策略，并重整军队，加强防守部署。鉴于敌人增援后，敌我力量的对比更加悬殊，决定电请中央政府，火速增援，同时通电全国报告江桥战况，揭露日寇穷凶极恶的侵略面目，表明前线将士们的抗战决心。

抗战枪声唤起全国人民高度的爱国热忱，特别是给东北人民以极大鼓舞。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慰问团，奔赴前线慰问官兵。各种慰劳会、救国团体以及援马抗日团体亦随之成立。首先行动的是东北人民和各界人士，

各机关团体发起捐献，抗战物资和捐款不断送往前线；许多青年学生、农民、工人主动拿起枪杆，走向抗日战场。远在海外的留学生和华侨读到江桥抗战的消息，奔走相告，握手道贺，为东北军民的不屈精神而自豪。

退至三间房的黑龙江省守军在国内爱国同胞的热情支持下，以“矢志卫国”为己任，士气十分旺盛，被誉为“抗日英雄”的马占山更是信心百倍地同日寇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

日方无耻地制造谣言，如说：“马部与苏俄密结”，“日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遇害”等等，妄图挑起我抗日武装内部的混乱和制造国际事端。这些谣言被马占山一一戳穿后，日寇又以武力相威胁。三次通谍，胁迫马占山立即下野，军队由省垣撤退，将黑龙江省政权移交张海鹏。马占山义正辞严地痛斥日寇的无耻行径，并下令将日领馆人员一律驱逐出境。

这些正义行动，立即得到全国同胞的赞助和声援。张学良也来电嘉奖，赞誉马占山将军“亲临阵地，威声传播，中外交推”，并提升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官，以陆军上将待遇。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写下《敬赠马占山主席》一诗：“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规，十二金牌召不回。”

蓄谋已久要鲸吞我东北三省的日寇，待援军一到，便从11月12日起开始了更加强大的攻势。其主力为装备全新、训练有素的劲旅——多门师团，尔后又从日本本土和朝鲜调来飞机队以及两个混成旅团等。而我方虽在此役的第一阶段有大量伤亡，所能增援者仅民团一千余人，但凭我全体官兵守土抗战的决心，在马占山的率领下，不顾敌我力量悬殊，英勇善战，竭尽全力，连续挫败敌人的攻势，大量地消灭了进攻的敌人。

三间房之战以17、18两日打得最为激烈。17日，敌军已增至三万余，由多门亲任指挥，分三路向我三间房主阵地进攻。一路以长谷旅团旅顺炮兵联队攻我阵地正面，我守军为苑崇谷全部及马属三旅二团李少峰部，敌猛扑十余次均被击退，从拂晓至深夜，战事未停；一路是以朝鲜混成旅团骑兵联队攻我右翼，我守该地者为骑二旅程志远部；一路以天野旅团全部，附坦克车4辆，攻我左翼，我守军为骑一旅吴松林部刘斌、萨立布两个团，战事激烈异常，萨力布团长负伤。

战事直至18日晨2时，我防御阵地均被摧毁，敌人的坦克车冲了进来，我各团营被分割为十数处，这时

敌人的骑兵又包围上来。我军不能立足壕内，只好跳出战壕同敌人肉搏。敌机低空扫射，我战士则仰卧以枪还击。在此期间，涂全胜团曾奉令迂回到大兴阵地，出其不意，将敌司令部包围，击毙敌军官30余，多门亲乘汽车被我缴获。此次出奇之计，动摇了在三间房阵地的敌人。马占山率手枪队督率反攻，士气振奋，将敌击溃，乘势恢复三间房阵地。在这次血战中团长吴德林受重伤。

在夺回三间房阵地后，我军曾乘胜向大兴阵地反攻数次，但未能成功。马占山见官兵连续激战两天一夜，未得饮食，疲惫不堪，伤亡奇重，不忍再做无谓牺牲，遂下令退却。

由于敌我力量过分悬殊，江桥抗战虽以我军的撤退而结束，但我全体将士誓死报国，勇敢杀敌，使日寇付出了伤亡三倍于我的高昂代价。打击了日寇侵略的气焰，振奋了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写下了“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退守海伦的马占山，在日益险恶的形势下，曾作出错误选择，遗恨终生，但他任伪职四十天后，终于大彻大悟，重举抗日战旗

损失严重又孤军无援的马占山部，为保存现有实力，边抵抗，边撤退，先到齐齐哈尔，再到海伦。

11月22日到达海伦后，着手整顿军队，并重组海伦抗战政府。马占山先后发出两封通电：一封给张学良和万福麟，表明此后行动仍以总副司令（张学良）之命是听；另一封通过舆论界向国内外庄严宣告海伦政府正式成立。有关黑龙江省军政要务照常办理。

一时间，海伦这个偏僻的县城竟也沸腾起来：海内外爱国人士和中外记者一批批来访，传出一个个黑龙江省军民浴血抗战的感人至深的消息；省内志愿参战的爱国群众和青年学生云集海伦，来自关内的热血青年又源源而至。由于海伦接纳有限，马占山不得不吁请各省军政协助劝阻青年北上。

此时外界很少知道海伦政府面临情况的严峻：军库空虚，孤军无援。自江桥抗战以来，与马占山久共患难的将士已损失大半，却没有得到过国民党中央政府一兵一卒一枪一弹的支援。海内外手足同胞的慷慨援助，虽使马部将士感到欣慰，但苦于战争条件远水难解

近渴。眼下冬季来临，天寒地冻，军民困苦状不堪言。日寇的进逼时刻未停。11月末和12月初，日寇又调多门师团主力自齐齐哈尔出发，从呼海和齐克对海伦成两路夹攻之势；铃木旅团则纠合张海鹏伪军从北宁路向海伦袭来。其间，马占山曾想趁多门师团在外，齐齐哈尔空虚，联合哈尔滨等地的抗日力量，收复省城。计划报请张学良批示又迟迟未复。海伦已陷于重重包围之中，集结待命的马占山部有聚而被歼的危险。

日寇与军事进逼同时进行的是对马占山的诱降。

早在江桥抗战的第二阶段，日寇内部对马占山的策略即有分歧。关东军主张予以歼灭；陆军本部则要“使其不战而屈服乃是上策”。陆军本部认为马占山在黑龙江有威信，有实力，若能归顺，控制黑龙江省，比张海鹏及另一个降日的张景惠（原东北地区行政长官）之流更为得力。于是开始了频繁的诱降活动。

当马占山率部将要退出齐齐哈尔时，张景惠曾打电话说：“……君可不退，留在省城，与日军从长计议。”马占山说：“占山自信系一好男儿，绝不降日本，阁下如降日本，则人各有志，不必相强。”

11月28日，汉奸赵仲仁通过电话欲疏通马占山参谋长谢珂劝马投降，遭谢拒绝。

11月30日，多门师团长致函马占山，提出马若愿回省，他可负责安全，但只许带80名随从等诱降的四条件。马未予置理。

12月6日，张景惠受命日方打电话给马说，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要亲自找马会谈。马说，现无直接交涉之必要。坂垣接过话筒向马说：“日本欲请马主席仍回省……”马不等说完，即放下听筒。

12月7日8时，坂垣迳率顾问驹井等随从人员及日、英、法、德等国记者一行来到海伦。马占山派参谋长谢珂与之周旋，坂垣则再三要求会见马，并恭维说：“本人钦佩马主席的英勇，此次专为亲善拜见，别无它意……。”

日寇武力威逼和政治诱降两手兼施，身处困境的马占山陷于重重矛盾之中，只能苦苦支撑，穷于应付。

此后，海伦发生的事情令人费解，海伦给予外部世界的印象是诡谲多变：

就在12月7日这天的晚10时，马占山刚对中国记者说：“无论日人如何利诱威胁，我绝不能为降将军。”但12时便一改不与日人接触的初衷，接见了坂垣一行。在与坂垣的会谈中，马占山既说了日人“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本主席只知中国中央政府，不知其他”

的话，但对坂垣提出的“建议张景惠担任黑龙江省长”“马占山掌握军权”“日本负责满洲的国防”等要求，表示可以考虑。还同坂垣等日人拍了合影。

次日，马占山与坂垣会谈的消息和照片在日伪报刊披露，并被大肆渲染，立即引起了外界甚至马占山部属的怀疑。马占山于9日急忙发表通电，表明他“此身存在，誓不屈服”的决心，但10日又应张景惠之邀，率谢珂等人去呼兰，11日与张会晤，商谈内容保密。从此，张景惠成为马占山与日寇打交道的主要牵线人之一。

1932年1月7日，日寇导演了一出傀儡省政府正式成立的丑剧。张景惠任伪省长，马占山表示同意，先后派原省府的几名官员去省城辅佐工作，以示合作，但当外面盛传马占山已与日寇合流，造成军心涣散，严重影响爱国军民情绪时，马占山同谢珂、苏炳文等15位将领又于2月1日联名发出黑龙江省军官团结一致抗战的通电。甚至在2月4日，日伪集中兵力向守卫哈尔滨的自卫军进攻，自卫军致电马占山求援时，马占山立即派苑崇谷旅前去助战，并运去大批枪支弹药，只是由于敌机扰阻并遭日寇袭击，伤亡惨重，才未能到达。2月5日自卫军被迫退往宾县，哈尔滨市失陷。

与海伦成犄角之势的哈尔滨沦于敌手，马占山为此极端震动。马占山为避免全军覆灭，不择手段，下决心亲身与日寇直接接触。

1932年2月8日，他只带一副官和一司机秘密渡江到哈尔滨去见多门。

此次“单刀赴会”尽管马占山事先作了“汽车不熄火，敞开车门，如闻枪声，击毙门卫”以防不测的安排，会谈中也说了许多诸如“你们欺人太甚”，“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马占山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硬话，但他所提出的解决黑龙江省问题的三个条件，其实质在讲和，使坂垣感到：迫马就范已有可能。

马占山在会谈中向多门提出的三条要求是：第一，日本没有领土野心；第二，日本在黑（龙江）省不得驻兵；第三，黑（龙江）省内政不得干涉。关东军对马占山的三条表面应付，佯作赞同，暗中却设下了诱马就范的圈套。

在狡猾的日寇策划下，原辽宁省省长大汉奸臧式毅提出“联省自治”，张景惠在哈尔滨以“自救”为名搞起“东北行政委员会”。其目的无非是使东北脱离祖国。可悲的是马占山竟未识破此阴谋。听信张景惠的劝说，响应“联省自治”，并于2月16日到沈阳参加了所谓“四巨头会议”（即马占山、张景惠、臧式毅和熙洽会议）。然而，在会上根本没有讨论什么“联省自治”，而是通过所谓“新国家（即伪满洲国）的建设大纲。”

这时马占山方知受骗，十分懊恼。在起草所谓“独立宣言”时，他托病未予出席，更没有在宣言上签字。

马占山屈服日伪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谴责的电报犹如雪片飞来，原为江桥抗战慷慨解囊的人，纷纷要



■李杜、马占山、王德林、苏炳文合影

求退款，为纪念江桥抗战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特制的“马占山牌”香烟停止出售。一时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变成了万人唾骂的降将军。

2月18日，马占山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海伦。为了与国民党政府保持联系和向全国人民解释他的行动于2月21日发出“个电”，电文如下：

“于兹四月，环境情形，日益复杂。现既进不能以救国困难，退不足以全地方，真所谓力竭声嘶，莫可为计也。占山不才，谬蒙国人所期许，几欲绝然舍去，以图自爱自好，唯为部曲所不容，人民所挽阻。伏念个人之虚誉，无足轻重，人民之受害，如水益深。且自江东义军东移以后，土匪蜂起，动则千数百人，烧杀抢掠，十室九

空,几经痛剿,现始稍稍敛迹。若再陷无政府状态,转瞬春耕逾时,则人民之灾歎流离,益属无所抵止,此占山日夜萦怀而不愆然置之者也。现在惟有一面应付事机,一面另谋瓜代,于最短期间接替有人,应即负咎引退,以谢国人……。”

事隔一天,即2月23日,马占山率领卫队200名和各厅处官员回到省府齐齐哈尔;24日,在日寇导演下马占山举行就任伪省长典礼。耐人寻味的是,马占山回省之前,曾召开营以上军官座谈会,阐明“回省”意旨,声称“决不卖国求荣,向敌投降”,还为江桥抗战以来阵亡的战士举行了追悼会。

马占山就任伪省长,日本的目的已达到,马占山同日本谈判时的仅有的筹码,也全然消失。来自于日方的,没有了含笑的恭维和难以琢磨的外交辞令,有的只是骄矜傲慢和气指颐使。

马占山到任伊始,日方即通知他,从省到各厅处均设日人顾问,凡省务不得擅自作主,必须取得日本顾问同意;凡省官员任命,必须关东军同意,总务、警察二厅都由日人直接充任,最初生性倔强的马占山,“不肯低眉敛气”,但在日寇羽翼之下,只好极力克制,对日人顾问,亦不公开反对。

土肥原来省城,要马去长春迎接溥仪,马先以黑龙江系“自治省”为由,欲推托不去,可是土肥原一再坚持,马占山恐生他变,遂于3月8日去长春,3月9日参加了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皇帝的典礼,马占山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兼黑(龙江)省省长。伪满洲国开第一次国务会议,日本驹井约马占山参加,马托病未去,派赵作仁为代表。马占山深知任他为“军政部长”是日寇调虎离山,在于解除他黑龙江省的兵权。而马占山回省后只能以计对计,派王静修以军政部次长名义代行部长职务,他自己从未去长春赴任。

3月12日,马占山返齐齐哈尔途经哈尔滨曾和张学良派来的杨成基接头。马占山谈了眼前的困难处境后,对杨说:“回去告知,我另有打算,决不会投降,你赶快离开这里。”

回省后,马占山深受日人挟制之苦,愈来愈感到难以自存。事无巨细不通过日本顾问不能干,日人最低的军官也可以随意进出省府。日寇不仅干涉军务,还千方百计要控制企业大权,以各种名目掠夺我国资源。此时的马占山,对于日伪方面的事务,一律采取既不公开反对,也不立即行动的态度,需签字时,他概以“目不识丁”相推托。另一方面的任务,他却在暗中积极地进行

着:1、密令以前退到海伦的省府各厅处长及重要公务员万勿来省;2、以关东军要求裁减军队及清乡为名,召开军政会议,密派军官多人分驻各县去训练壮丁,编制民团;3、将部分裁减军队的费用秘密转到黑河,还授意各部队长,以“接济”为名借出军款,甚至五万、十万亦不让记帐;4、将省城所存之枪械子弹,密派亲信运往黑河、龙门和通北等县,或藏于民户,或储于大山沟中;5、以接家属来省之名,派少将参议韩述彭去海伦,暗中指使女儿马玉文等化装成商人假道哈尔滨转去内地……。

马占山对伪省事务的敷衍态度,使日人很不满意,对他更加严密监督,事事相逼。日领事逼黑河地方挂伪满国旗激起兵变,马占山在黑河的公馆被抄;日本关东军又在暗中调查黑龙江省财政开支情况。另一方面,张学良来信劝他反正。他的长子马奎也从上海给他写信说:“你如果是真投降就不是我父。”

马占山百感交集,彻夜未眠,他反复斟酌,认为再不能拖延时日,决定率领部队尽快出走,重举抗日旗帜。

为了麻痹敌人,马占山连续数日在日本的淫乐场所“寻欢作乐”,还向别人散布说:“英雄用武无地,特以醇酒妇人终志”。为庆贺本庄生辰,定制银质包金寿星一座,银质金花两盆,先摆在大厅任人观赏。还送枣红马两匹和银器一套给日本顾问,以麻痹日人。

稳住日本人之后,马占山借口巡视防务,先派少将参议韩述彭去拜泉、海伦一带,暗示韩谎报部队有哗变征兆。马占山则以“抚慰”部下之名于1日率领部下三百多人,携带政、军两署关防文件和军饷、办公费等,“乘夜色迷茫,晨星未坠,迳趋北门,拔关而出”,直奔黑河而去。在离开之前,不仅悄悄运走了许多军事物资(包括军用汽车12辆,轿车6辆)和军马300余匹,还派人在拜泉、海伦及黑河等地向省特机关长林义秀发去电报,假称“恐有防军哗变,为抚慰起见,临行匆促,未及亲辞”,并说“沿途视察军情,不日返省”。当日寇发觉马占山真实意图时,马已安抵黑河,并于4月7日在黑河通电反正。

对于马占山“伪府四十天”这段历史,究竟如何认识,至今毁誉不一。就马占山本人来说,当时确有难言之苦衷,过后也似有懊悔之意。在他脱离日伪的次日——4月2日在克山召开的军官会议上,他曾经这样说:“至于个人之毁誉得失,实无暇顾及,且亦不必顾及。余一生之道德观,有两言可以概括之,即生命付诸

造化，名誉但问良心。昔日江桥鏖战之马占山固如此，今日退驻黑河之马占山仍如此，推而至于肝脑涂地后之马占山，亦莫不如此……”。在他4月7日于黑河发表反正通电后，4月12日向国内外发出的通电中谈到了在海伦的困难处境和当时的想法：

“……当是时也，前有强敌进逼，后无要塞可守，内而械窳弹缺，外而孤悬援绝，危急存亡，间不容发。占山自幼从戎，历经战阵，生死二字，久已置之度外，顾念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驱一军忠心，以与强寇锐利无情之炮火相搏，结果徒供一时之牺牲，快敌人心，则恢复之机益将绝望。反复思维，欲解决目前难关，惟有相机应付，缓敌进攻，庶可保存我军现有之实力。候时机一到，再图反攻，并可藉探日人侵略我方之真确计划。故不惜冒险赴哈，会晤日本多门中将，以虚以委蛇之宗旨，搪塞其间，而东北一线之生机，庶得保留……”。

马占山多次表白自己的心迹，无疑期望国人的理解和原谅。但是无论如何，马占山的就任伪职，对当时处境十分困苦的军民，起了不良的作用，造成我抗日营垒中的一时混乱，不能不说是马占山一生中的污点。

当然，马占山毕竟是马占山。行伍出身、没有文化、政治头脑简单、待人接物但凭一腔热血的他，既写下了江桥抗战的辉煌，也留下了伪满四十天的败笔。但是，一旦他醒悟过来再举抗日战旗，则进一步表现了他的顽强不屈，义无反顾。

4月1日马占山一离开齐齐哈尔，分别电邀吉林的李杜、丁超、冯占海等派代表于4月3日到拜泉集会，讨论黑、吉两省联合抗日大计。决定分南、中、北三路军统一指挥，分别与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敌寇进行斗争。

到达黑河后，在黑河重新组织黑河省政府和军署机关，并着手整编军队，除集聚他原来的部队外，联合黑、吉两省的民团、抗日义勇军及各县抗日力量组成七、八万之众的黑龙江救国军。向全国发出誓师通电。

5月15日，马占山统率三路军并兼前敌总司令向哈尔滨方向挺进。出敌不意，在呼兰地区把日寇打得大败，一直追赶到松花江边。只是因原计划作内应的程志远叛变，打乱我方部署，攻哈尔滨未成。

此后马占山率部转战两个月，怀着海伦沦陷的悲愤、亡妻杜氏被掘墓毁尸的仇恨，于7月14日又率部推进齐齐哈尔。后被日寇重兵包围，激战三昼夜，率残部突围后潜入大青山，吃草根啃树皮，饱尝人间困苦，

继续与敌人斗争。罗圈店突围战中，携带关防印信的少将参议韩述彭等一行与马占山失散，韩不幸壮烈牺牲，日寇误认为是马占山，割下头来挂在海伦城门示众百日。

马占山在深林中辗转50多天才走出深山密林，但到达龙门后休整数日，又极力与各路义军联络，并于10月16日和12月初两次制定攻打齐齐哈尔计划，虽然两次均告失败，但显示了马部将士与日伪誓不两立之决心。

日寇穷凶极恶，认为不消灭马部东北永无宁日，于是先以重兵切断马部与苏炳文等部的联系，而后分别围剿。只要一发现义军的目标，即穷追不舍。

最后，这支坚持了一年多的抗日队伍，被迫退入苏联境内。从12月至1933年2月，我抗日军民先后进入苏联境内的约有一万多人。马占山于1933年1月初化装成普通农民，混在官兵中进入苏境。

屡经磨难的马占山回国后，报国之心弥坚，虽因诸多原因他未能再建丰功伟绩，但也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好事，1950年11月他怀着对新中国的希望因病辞世

马部等被迫越境的官兵，经中苏两国协商，分批送回新疆，并编入当地部队，再没有机会转回东北继续抗日了。少数知名的高级将领马占山、苏炳文及李杜等派往国外游历。途经苏联、波兰、德国、意大利、印度和新加坡等国家，于1933年6月初经香港回到上海。

一路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欢迎和鼓励的马占山，回到祖国满以为可以重整旗鼓再返前线，蒋介石却令他出任新疆省主席，其用心马占山自然明白，便托词推掉。后蒋介石给他一“军事委员”的空头衔，更使他大为失望，只好回天津住家休息。

马占山的反正和继续抗日，使日寇十分恼怒，必欲除之而后快。当马占山寓居天津时，屡派特务企图将马暗杀未遂，又勾结汉奸绑架其子马奎实施威胁亦未得逞。后又利用一老“乞丐”冒充马占山之父，造谣生事，说马抛弃亲父，忤逆不孝，闹得满城风雨。然而，最使马占山不安的是日帝对华北的侵略有增无已，全国抗日爱国运动日益高涨，他却闲居天津。他再次向蒋介石提

出请纒杀敌的强烈要求,却依然得不到回答。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在洛阳电召马占山,当马赶到洛阳时,蒋已去西安,留函嘱马到西安。马刚到西安,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马占山积极赞成这一行动,并成了在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抗日八项主张上签名的第四人。他建议严禁部队乱开枪,以免误伤人命。他主张不要杀害蒋介石,以免国内陷于无政府状态,使日寇从中渔利。张学良采纳了他的意见。“事变”后他又回到天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全面抗战,不久天津失守,马占山逃离天津直奔南京向蒋介石请战,蒋再无法推脱,8月21日,任命他为挺进军司令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并要他到绥远大同组建挺进军司令部。尽管蒋拨给他的兵力、财力十分单薄,他仍然慷慨受命。8月24日,即赶到山西大同着手工作。

组建一支军队谈何容易。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乎蒋介石的意料。马占山靠蒋介石拨给他的中央骑兵第六师刘桂五部和国民兵团李大成部(地方武装)为骨干力量,在与强大的日军和强悍的伪蒙军周旋的极端困境中,不到一年的时间,挺进军的队伍就组织发展起来了。在保卫绥远和阴山血战中,先后收编大量伪军和伪蒙军,编为两个骑兵师、四个骑兵旅、一个骑兵团及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挺进军支队,最多时曾发展到十万之众。1938年8月初蒋介石再次委任马占山为东北挺进

军总司令。马占山对训练队伍,十分重视,抓得紧,要求严。经常勉励部下爱国爱民、精诚团结,把驱逐日寇、收复国土作为本军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挺进军面对的是装备十分精良的坂垣师团和酒井机械化部队以及强悍的蒙德王伪军,与之浴血苦战达十月之久。马占山亲率挺进军带着骑兵迅猛冲杀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经常给敌以出其不意的袭击;他教育伪蒙军“蒙汉为一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俘虏采取留去自便的政策,因而有许多蒙族同胞自愿参加挺进军。挺进军的发展壮大,使日寇大为惊慌。

年过半百的马占山仍然保持当年作风,经常亲临前线指挥杀敌。有一次,马占山的反攻部队,直逼敌人的张北老巢,行至阴山中段,与敌遭遇,连续激战七昼夜后,在撤退中被敌人包围。卧病的马占山闻讯后,翻身跃起,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亲率部队奋勇冲杀。在枪林弹雨中,他的警卫排长和贴身警卫全部牺牲,随从指挥官也被炮弹震昏,马占山仍然指挥士兵顽强拼杀,终于突围。就在这次战斗中与他生死与共的刘桂五师长不幸牺牲,他悲痛至极,含泪率部转向大青山。不久又遭敌寇包围血战八昼夜而突围。于1938年5月马占山率全军转战到陕北府谷县的哈拉寨,划归西北行营胡宗南统辖。在哈拉寨重新整编部队。蒋任命他为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5月,再度任他为黑龙江省主席,以后,他便以此名义进行抗日复土的活动。

马占山一贯反对内战,主张一致对外。早在海伦组织抗战政府时,马占山就曾发电向国民党内部纷争的派别呼吁消弭党见,团结抗日。马在天津寓居期间,与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闫宝航、栗又义等交往甚密。杜重远曾介绍共产党员孙达胜,通过马占山联合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马曾批评张,不该听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丢掉了东北,他说:“参加剿共是无期徒刑,是卖命换饭吃。”“必须保持一点老本,争取打回老家去。”

抗战期间马占山转战大西北时,他率领的挺进军与八路军一直友好相处。他对挺进军中的共产党员,不排斥,不歧视;八路军也坚决支持他的抗战主张和行动。1938年7月间,马占山由重庆返哈拉寨的途中,路过延安,为答谢延安对挺进军的多次援助,拟去晋见毛泽东。但行至距延安



■马占山与夫人之墓碑

50余里的稻草铺附近,兴致勃然的马占山操枪打猎,不料枪筒爆裂,炸断三指。枪救后,中共中央领导请他留下治疗,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很快好转。两个月的养病期间,许多朋友,特别是东北的老相识、老战友都经常来看望和慰问。张学良胞弟张学诗看望他最多。

出院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开了欢迎会,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致欢迎词,对马占山将军的抗日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希望国共两党携起手来,共驱日寇。马占山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延安的一切都给马占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月下旬惜别延安。

1945年日本投降,蒋任命马占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委员。1946年挺进军的两个骑兵团在楚溪春统率下为蒋介石死守大同,并于9月21日突围后到得胜堡与傅作义部会师,接着又进攻张家口。9月23日,马占山调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他将两个骑兵团交给傅作义指挥。蒋又任命马为松北挺进军司令,但马长期避居北平,未去上任。他对家人说:“看到自己人打自己人;总感到痛心!”

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马占山于1947年曾去沈阳“到职视事”。在市府广场的民众欢迎会上,各界赠给他“民族英雄”大锦旗一面,他深感自己挂名副司令无所作为,与过去抗日英雄名称也很不相称,又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便以治病为名,于1948年10月回到北平。

在北平马占山受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常常与家人半夜收听新华社广播,请地下党员到家中讲社会发展史,积极为东北三省来北平请愿的学生代表解决住房、伙食等问题。

马占山和傅作义本有金兰之契,马应中共地下党的要求,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他对傅说:“蒋介石消灭异己,永不会改变。”“不要因为你傅宜生一个人把千年古都和一、二百万人的生命财产毁于一旦,而作了历史罪人。”当时傅作义曾派代表与中共接触过两次,谈判未成,正在发愁,马建议傅找邓宝珊来作为谈判代表,傅欣然同意。马一个电报就把邓请来了。1949年1月14日,邓宝珊接受傅的委任前去蓟县会谈,这次谈判很快达成有关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托人打电话邀请马占山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参与讨论国家大事,他很高兴,但因正身患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疼痛难忍不能行动,未能如愿。1950年当朝鲜战火烧至新义州,

又要危及我东北时,马占山热情支持小外孙女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自己也立即请人代笔写下上前线的申请,表明他爱国的一腔赤诚。

1950年11月,马占山将军的肺癌病情加重,自知即将离开人世,让女婿陶英麟代笔,留下遗嘱:

“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现,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理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因病与世长离,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引者按:指其子女),务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此嘱。”

1950年11月29日下午8时6分,马占山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病逝于北京寓所,终年65岁。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占山病故的消息并刊登了他的遗嘱。马占山的遗体安葬在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

(根据采访马占山女儿马玉文的记录及马玉文等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 洛松

本刊现有1993年精装合订本(总10—总21期),每本定价42元,邮费2元。欲购者可向杂志社或读者服务部汇款,款到发书。杂志社地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邮编:100802,联系人:朗瑜。读者服务部地址:北京朝外金台西路机械工业学院分部《炎黄春秋》读者服务部,邮编:100026,联系人:李洁清。

另外本刊有创刊号至1992年底部分单行本(缺总第2期、第3期和总第9期),欲购者可按每本2.80元汇款到本杂志社。

兴建

天安门英雄纪念碑

内情写实

●闫树军

在天安门广场的南面，耸立着一块碑，这块碑是为纪念1840—1949年间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而建立的高大碑塔——人民英雄纪念碑。

奠基时记者“摄”“花絮” 毛主席喊“步兵操”口令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根据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决议兴建的。当天下午，毛泽东等全体政协会议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奠基典礼。

人们常见的奠基仪式，是由奠基人撮土一铲，投入其坑即成。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则显得严肃庄重。面对着100多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毛主席抖擞精神，站好立正姿势，两手分贴裤缝，用高昂的声腔，喊出了合乎《步兵操典》要求的“口令”：

“立——正”

“向右看——齐！”

“向前——看！”

在庄严的“口令”下，委员们闻风而动，十分严肃认真。尔后，毛泽东跨步向前，挥铲撮土，投入其坑，其他委员们随后一一撮土如仪。

突然，著名侨领、年逾古稀的司徒美堂老人不慎压

伤了手指，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见状，立即找来急救人员为老人包扎。一位记者赶忙用笔在本子上“摄”下这个镜头，周总理见状，微笑着对这位记者说：“怎么，连这个也要记上啊？”

记者连忙回答：“这是很精采的‘花絮’啊！”

毛主席亲笔题词 周恩来颜体写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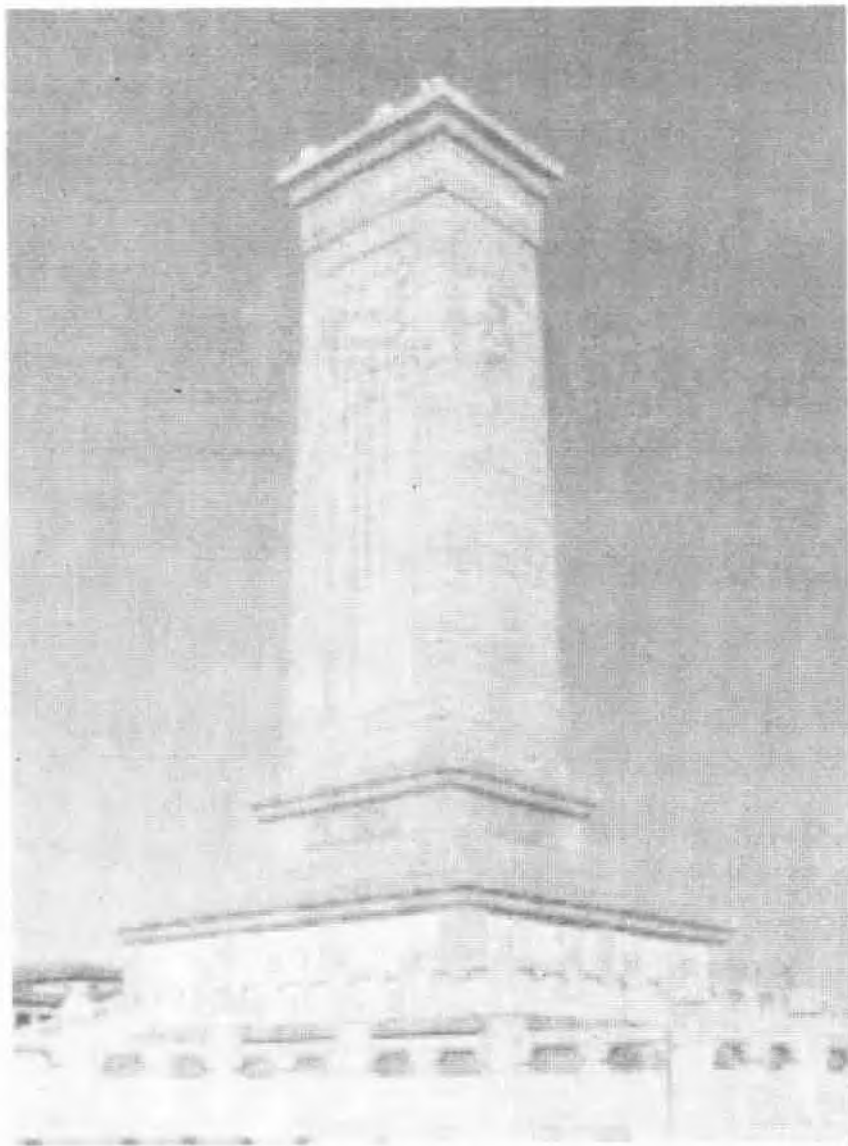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向着天安门，碑心石上雕刻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镏金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碑身背面，是毛主席著文、周恩来亲笔书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定在向北的碑面上，是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定的。他还建议碑文由“写得一手极好的颜体字”的总理周恩来手书。



周恩来总理为了写好碑文，他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他前前后后共写了四十多遍，最后选了最满意的一篇。从这一件事也可看出，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先烈的崇敬、怀念之情。

建碑形式多而难定 彭真拍板选用“建筑顶”

纪念碑奠基后，便开始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

时间不长，来自全国的二百多份方案寄集到京。对这些方案归类，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平铺地面式；二是巨雕像式；三是碑形、塔形。经过各方面、各团体代表以及在京的一些建筑师、艺术家会同评选，平铺地面式的方案先被否定，但雕像和碑、塔的形式成了建筑形式争论的中心。

在对建碑的形式举棋不定之时，有人说中央首长对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和北海“琼岛春阴”碑有偏爱，为此建碑形式便开始向现在建成的形式来设计。

1952年5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组成，彭真任主任，郑振铎和梁思成任副主任。但此时浮雕主题和碑顶形式仍未定下来，成了两大久悬不决的难题。

为加快纪念碑兴建，又成立了专门的史料委员会。在由范文澜主持的史料专门委员会，很快便提出了九幅浮雕主题方案。报请毛主席指示后，毛主席批示：将“井冈山会师”改为“八一南昌起义”；“义和团运动”改为“甲午中日海战”；“平型关大捷”改为“延安出击”。主席的批示不是最后的拍板，而是在此批示下，又经过

多次送请中央审查，多次发回继续讨论，最后定下来八幅浮雕，即现在建成的，从碑身东面起，按其反映的历史顺序排列，依次为鸦片战争、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江。

在纪念碑的主体形式确立之后，便开始基础设计并施工。按主体形式，碑的高度约为40.5米，是按广场扩建为宽200—250米，由北面任何一点看过去，在透视上碑都高过正阳门城楼。

那碑顶的形式又应是什么样子？

建筑家们的观点又各不相同。有的建筑家说“建筑顶”，但雕刻家主张用群像，他们认为“大尾顶”形象太古老，有人反对群像，认为像在40米的高空，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

彭真得知此事后，经过认真思考，指示：群像的形式使主题混淆，不相配合，用“建筑顶”为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念碑顶便是按民族传统的建筑形式建造，是上有卷云、下有重幔的小虎殿顶。

浮雕巨石运到京 “阳文”打在碑身上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用1.7万块坚硬的花岗石和洁白的汉白玉砌成的。碑基约3000平方米，碑高37.9米，比对面的天安门城楼还高4米多。碑正面的碑心石，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103吨。这块碑石采自山东青岛市浮山，开采下来时，重达280吨。为了把这块巨石运下山，曾在巨石下面铺上枕木铁轨，并用六组大滑轮缓缓下放。1953年8月，这块巨大料石安全下山，并启运北京。

在大料石启运来京前，为了加强领导，做好搬运巨石的工作，青岛市人民政府还专门组成大料石搬运委员会，并由首都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工程师和应约协助工作的鞍钢技术工人进行指导。参加这次搬运工作的有修建纪念碑的工人，民兵负责保护。搬运途中，碑身巨石被安放在一个六吨重的铁排子上，下面另铺上垫木和滚木，并系上钢丝绳，用推土机在地面上拖着拉运，从而安全搬运到北京。

纪念碑从地面开始有双重月台，踏着花岗石台阶

上走，是承托碑身的大小两层须弥座。碑身四周围绕双层汉白玉栏杆，美观、朴素。碑身东西两侧上部，刻着以红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光辉永照”的装饰花纹，象征着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万年长存。小碑座的周围，刻以牡丹、荷花、菊花等组成的8个大花圈，象征着“高贵”、“纯洁”、“坚忍”，表示全国人民对英雄们的永远怀念和敬仰。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字是怎么刻上的？

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刻到坚硬的花岗石碑上的，是已故著名书法家魏长青。毛主席的题字原写在信纸之上，每个字只有两寸左右见方。要把这些字雕刻到碑心石上，首先要放大二十倍，其中一个“永”字就两米多高。当时用幻灯投影机放大，并按照光影把字描下来。魏长青精心细摹，把加工好的字再缩小到原来那样，与原来字体相对照，使复制品与原来字体不差分毫。

把字体往花岗石上刻，又遇到了难题：石碑又硬又脆，一刻就崩。魏长青建议：把胶皮覆盖在碑体上，将需要篆刻部位的胶皮挖下去，形成“阳文”轮廓，然后用高压喷射矿砂往花岗石上“打”，就这样打出一个个边缘整齐的大字。

魏长青出色地完成了刻碑任务后，建碑处要给他丰厚的报酬，他坚辞不受，并说：“为人民建碑应尽心效力。”魏长青先生病故于1977年，终年79年。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动工，1958年4月建成，同年5月1日隆重揭幕。

《大众文摘》

《大众文摘》是大众化的大型社会性文摘月刊。以“博采中外，撷英集粹，启迪心智，开阔视野”为办刊宗旨。《大众文摘》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采用国际标准开本（大16开）、四封彩印、64码的大刊。气魄宏大，装帧精美。

《大众文摘》每月从国内外近千种报刊中摘选佳作，精心编辑而成。选文源于大众，通俗而不庸俗；高雅而不故作。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1995年的《大众文摘》将继续办好读者欢迎的美文欣赏、国人忧患、地球村、商界风云、东亚群星、警戒线、两性之间、人生百味、往事回首、轶闻趣事、史海钩沉、体育博览、军事天地、养生秘诀、书海泛舟等20多个栏目。既关注热点，又荟萃精品，集知识性、哲理性、趣味性于一体。可读、可用、可存。

《大众文摘》每月1日出版，订价3.20元，全年38.40元。邮发代号：52-209，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欢迎广大读者订阅95年《大众文摘》。杂志社地址：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内，邮编：710062 电话：(029)5268234

更正

本刊今年第四期刊登的《省委书记——叛徒——烈士——？》一文，作者署名童乃元是甘乃伟、邵景元二人的笔名。甘是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邵是淮安市党史工作委员会主任，特此证明。

《炎黄春秋》编辑部

1994年9月10日

红色牧师的故事

●王朝柱

在中国漫长的革命历史中，不仅有少林寺的和尚成为将军，而且还有上帝在人世间的布道者——牧师变为我党地下工作者的。他就是董健吾同志。下边，简介几个和董健吾同志有关系的故事：

一、冯玉祥将军为他平反

董健吾，原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的学生，曾和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同学。他毕业之后，受基督教圣分会的派遣，到基督将军冯玉祥所部担任牧师，负责宣讲教义。1926年3月，冯玉祥兵败下野，去苏联考察。同年10月，冯玉祥将军响应北伐回国，并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举行五原誓师。就在这时，冯玉祥将军的身边又来了一名新牧师浦化人。这位浦牧师的真正的政治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受命和著名的共产党人刘伯坚一道辅佐冯玉祥将军，使之坚定地执行三大政策，努力完成北伐大业。与此同时，浦化人还利用牧师职务之便，对冯玉祥将军所部的神职人员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工作。由于浦化人和董健吾有同乡之谊，很快转变了董健吾的政治信仰，并于1928年由浦化人和刘伯坚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将军息影泰山。董健吾遂脱离北伐军回到上海，利用他的声望，以及和宋子文等南京国民政府要员的关系，在上海的一座教堂中又谋了一个牧师职位。不久，浦化人也回到了上海，他打着神职人员的幌子，在中央宣传部供职，并领导董健吾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之后，董健吾利用牧师的公开身份参加革命互济会，在营救被难者以及成立“自由大同盟”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就是在这期间，董健吾同志被圈内的亲朋友好称之为红色牧师。

不久，董健吾同志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基督教方面的反对和不满，遂借口董的恋爱生活违犯了教规，革除了他的牧理的职务。这样，董健吾同志不仅需要承受来自基督教方面的舆论压力，而且也失去了从事特殊工

作的依托，他为之十分痛苦。

党的保卫部门为了使董健吾更好地从事情报工作，出经费为他开了一家古玩商店。他利用自己懂英文的有利条件，把很多外国人吸引到古玩商店来洽商买卖，巧妙地掩护了党的这个情报据点。同时，他利用自己和国民党上层的特殊关系，又通过平时为地下党员——昔为“筹安全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为师，遂成为青帮大亨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客；他通过和宋子文的同学关系，经常出入宋公馆和孔公馆；自然，被国民党封为国母的宋庆龄也成了他很好的朋友……总之，董健吾同志是我党情报战线上建有功劳的特殊哨兵。

但是，董健吾同志终因被革除牧师一事耿耿于怀。党的保卫部门也为失去这样一个“上帝”赐予的依托和据点而遗憾。这时，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潘汉年同志接任陈赓同志中央特科二科的负责人，他告诉董健吾同志：不要心急，一定寻机为他恢复牧师神职。

这样的机会终于等来了！“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拢络人心，宣布恢复被他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冯玉祥的党籍，并请孔祥熙做调停人，请冯玉祥将军到南京来帮助他渡过难关。这样，冯玉祥将军遂结束泰山读书生活，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要职。就在冯玉祥将军来上海的时候，潘汉年通过内线关系，有意请冯将军为董健吾“拉场子”，帮助董恢复在基督教中的地位。

冯玉祥虽是出了名的基督将军，但他的基本思想还是传统的。那就是特别重视“仁”和“义”两个字。他和董健吾的关系渊源流长，并认为董是一位忠于职守——并富有民族意识的神职人员，他有难处自应帮忙。另外，他还认为董被革职，和自己兵败中原有直接关系，那就是基督为了取悦新接受洗礼的蒋介石，而有意给他冯某人点眼色看看。因此，他欣然允诺为董健吾说话。

上海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已经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回到了上海，在一次隆重的欢迎宴会上，他有意把董健吾拉在自己的身旁就座，他乘着酒兴指着董健吾说了如下这段话：“他是我当年的专职牧师，给我宣讲了多年的教义。这次来上海，听说为了

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革除了他的牧师。我知道上帝是最宽容的，而我们这些上帝的奴仆也应该学着宽容兄弟姐妹们犯错误。他已经为自己的过错向上帝忏悔——并得到了上帝的宽容。我们这些上帝的奴仆们该不该宽容他啊？”（大意）

“该——！”众口一声地答道。

就这样，董健吾恢复了在基督教中的地位。从此，他以古玩商店老板和牧师的双重身份，为党从事特殊的情报活动。

二、协助潘汉年处决叛徒

一天上午，董健吾身着神职服装走进古玩商店经理室照例先冲好一杯进口的咖啡，然后坐在舒适的沙发上，翻阅刚刚送来的中外报纸。突然，他被一条消息所吸引：

昨天傍晚，一艘待命驶往南昌的客轮停泊在码头，穿戴不一的旅客蜂拥上船。这时，一辆美式轿车戛然停在码头上，先走下两个腰插手枪的便衣刑警，旋即又走下一位身着长衫，手提皮箱的中年男人，故作有派的样子起步登船。随着“啪、啪”两声枪响，他当即倒在了码头上……

恰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信号似的敲门声。董健吾知道是自己的同志到了，热情地说：

“请进来！”

屋门打开了，走进一位阔气的中年客商，他随手轻轻关死屋门，把右手握着的那柄入时的手杖往右手腕上一挂，摘下银灰色的礼帽，取下架在鼻梁上的方型墨镜，他原来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潘汉年。潘笑着问：

“董老板，在忙些什么？”

董健吾请潘汉年落座，旋即指着报纸上的那条新闻耸了耸肩膀，说道：

“我正看有关你们的‘杰作’的消息。”

潘汉年用眼扫了一下报纸，微微地摇了摇头，说一句“我正是为这条消息来求你，”遂又讲起了有关这条消息的来龙去脉……

为了配合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进行，需要前方有战争经验的同志来充实上海的秘密工作。其中有一个在江西从事机要工作的干部刚到上海，就投敌变节，并把他掌握的中央苏区有关的机密报告了敌人。国民党设在上海的特务机构经过研究，认为这个叛徒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决定派人把他护送到江西南昌，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他掌握的所有机密。

潘汉年通过内线的耳目，及时地获知了这个叛徒到达上海后的一切活动，并随时向中央保卫机关的负

责人陈云同志做了报告。经和陈云、康生研究，为了确保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顺利进行，决定在上海处决这个叛徒。交由康生负责的三科执行。遂演出了码头狙击叛徒的好戏。

是日深夜，潘汉年又通过内线获知，叛徒被击中一枪，子弹从颈项穿过，竟然没有死去，当即被租界捕房送入仁济医院抢救治疗。潘汉年顿感情势严重，立刻向党中央做了报告。很快，他又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为了确保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下党的机密不被叛徒出卖，趁这个叛徒伤势严重，几度陷入昏迷的情况下，把他击毙在医院中。

仁济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附设在一座教堂的后面。平时，医院中就有着良好的医疗秩序，一般看门诊的病人是不准进入住院区的；就是探视住院病人的亲属，也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时下，敌人清楚这个叛徒被狙击致重伤的原因，在他的病房门前，一定设有专门人员看守，想接近这个叛徒是困难的。怎么办？潘汉年和助手们共同认为：若想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处决叛徒的计划，必须摸清叛徒居住的病房，以及病房四周敌人布防的情况，而要完成这样一项特殊的侦察任务，又必须找到一位和教会有关系的情报人员，打着宗教的旗号，进入病房区巡视。这时，潘汉年和他的助手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董健吾。

董健吾深知这项使命的严肃性。他受命之后，找到医院中一位和自己很熟悉的牧师，在一般的闲谈中，获悉这个叛徒住在隔离病房，专由巡捕房警务处所监守，防范甚严，非经特许，不准接近。接着，他又以关心病人为名，和这位医院中的牧师视察了所有的病房，他还发现，在这个叛徒的病房门口还有两名武装巡捕监守。他回到自己的古玩商店以后，通过关系向潘汉年做了汇报。

潘汉年摸清了叛徒的病房位置，但他却无法把我们的保卫人员打入医院，进入隔离病房，越过武装巡捕的监守，去处决这个倒在病床上的叛徒。他只好再次要求董健吾利用和医院中的那位牧师的特殊关系，做好有关医务人员的工作，尽快拿出一个可行的处决叛徒的方案。

董健吾遵命再次拜访了这位有正义感的牧师，并在他的帮助下，说服了执班的护士，很快和潘汉年共同密商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

是日夜，我们的保卫人员化装成仁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护士和牧师的带领下，以查病房为由，大摇大摆地走到叛徒的病房门口，出奇不意地制服了监守的武装巡捕，闯进病房，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这个叛徒的生命，然后越墙逃出医院，坐上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车，安

全地撤离了。

潘汉年指挥的这次行动，由于是在武装巡捕监护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因而无论是对公共租界的巡捕人员，还是对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的人员——尤其是那些叛变投敌的败类，都产生了岌岌可危的恐慌感。而这次行动的幕后英雄却是董健吾牧师。

三、受宋庆龄之托密访陕北

蒋介石入主南京后，他认定共产党是“心腹之患”，而日本军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国是“皮肤之患”。由此产生了他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但是，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以及华北日渐危急，全国上下掀起了坚决抗日，严惩汉奸的救国热潮。就在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刺杀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案。当蒋介石获悉刺客的枪口原本是对着他的，因他未出席合影，汪精卫做了他的替罪羊之后，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还能行使多长时间。

蒋介石很快醒悟到必须接过抗日救亡的大旗，方能赢得对外——欧美诸国乃至苏联的支持，对内——举国上下的拥护。自然，这也要获罪于日本与国内的亲日派。他为了对外遏制日本的侵略，对内分化、瓦解共产党和红军，遂又想到了苏联。也就是在这前后，他认真地阅读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及中国共产党有名的《八一宣言》。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委派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英洛夫接触，并亲自出马和鲍格英洛夫进行秘密会商。当他得到苏联外交部明确答复：苏联政府不充任“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谈判的中间人”以后，遂决定通过几条渠道，亲自和共产党建立秘密联系。其中一条就是希冀他的郎舅宋子文完成这一秘密使命。

宋子文是欧美诸国在华的代言人，因而是个坚定的反日派。他虽说愿意完成这一秘密使命，可他身边并没有和共产党有关系的亲信，遂求助于二姐宋庆龄。

宋庆龄先生为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右派斗争了近十年。在这期间，她和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有着较为密切的接触。当她听宋子文说：蒋介石希望派一名使者进入陕北苏区送信，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她似乎未加思索地就笑着说：

“我看你的同学可担此任。”

“哪个同学？”

“董健吾牧师。”

董健吾接受了宋氏姐弟的委托，赴陕北苏区送

信。为确保董健吾沿途的人身安全，行前，宋庆龄交董一张委任状，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名委任，以保障旅途通行无阻。

1936年1月，董健吾告别上海乘车西去，十分顺利地到达西安。这时的西北高原恰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隆冬季节，一时难以雇到通往陕北苏区的车辆。他急中生智，打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旗号求见张学良将军，希望张能派专机送他去陕北苏区。

张学良将军和宋子文私交甚笃，且又为寻找共产党而着急。俗话说得好：“打狗看主人。”他当即约见了董健吾。当他看到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他完全心领神会董健吾陕北苏区之行的真实目的，遂派飞机送董到肤施（即延安），再由东北军派一骑兵连护送董过境，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在苏区边境接待他们。几经辗转跋涉，董健吾于2月27日安全到达瓦窑堡。

林伯渠、张云逸、袁国平等领导同志在瓦窑堡门口迎接董健吾。翌日，“董由林伯渠陪同将宋氏密信呈递博古，传递了南京政府要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意向。”

此时，中央红军已渡河东征，中共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都在前线石楼。几经密电往返磋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施之谈判”。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与此同时，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曾于3月2日致电博古，要他和董健吾等人一起来石楼，讨论和国民党的联络问题。但是董健吾想到自己离开上海已近两月，为不引起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疑虑，希望快些回上海复命。3月4日，在电告上述五项条件的同时，同意董健吾不来石楼，先回上海。

3月5日，董健吾带着上述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诚如刘家泉先生在其专著《宋庆龄传》一书中所评述的那样：“当时的几条渠道都对国共谈判作出了贡献，宋庆龄则帮助沟通了两党中枢间的直接联系，起到了别的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

这是十分公平的论断。

今天，还应补充这样一句话：“而沟通国共两党中枢间直接联系的秘密使命，是宋庆龄先生委托董健吾牧师完成的。”换句话说：“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头功，董健吾牧师是有一份的。”

四、帮助张学良寻找共产党

就在汪精卫被刺的四届六中全会不久，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骂作不抵抗将军的张学良面对华北危局，希望国民党五次大会开成救国抗日的誓师大会。但蒋介石却在“对外关系之报告”中强调对日关系“当为最大之忍耐”，并公然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会后，张学良仰天自语：“华北休矣！”

东北三省是在张学良的手中丢掉的，他唯有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才能洗刷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为此，他秘密去监狱中探望了东北政坛名士杜重远先生。

杜重远先生因《闲话皇帝》一文受累入狱。他由前来探监的老朋友——秘密共产党员胡愈之的口中获知了《八一宣言》，以及蒋介石正在秘密谋求和共产党接触的消息。因此，他希望张学良在东北军集中陕甘两省的情况下，走联合抗日道路。并指出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第二，陕西省的实力派杨虎诚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的盛世才原是张学良的部属，他利用有利的地势，可以和苏联搞好关系，这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抗日力量。

张学良信服杜重远先生的见解。他为了尽快地打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想了很多的渠道。其中之一是请求原部属李杜将军帮忙。

东北抗日失败之后，李杜和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将领退入苏联国境，遂和共产党发生了联系。不久以前，他辗转回到上海，依然和共产党保持着接触。他为了快些完成张学良的付托，请求有红色牧师之称的董健吾帮忙。

这时，董健吾已经接受宋庆龄先生的付托，去陕北苏区送信，他答应李杜将军：等外出回到上海再帮忙。

诚如前文所说，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对国共谈判的条件和复信回到上海，当面交给了宋庆龄先生，并受到宋的感谢。

也就是在这次相见中，董健吾说起在去年十二月，张学良曾秘密会见李杜将军，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他征询宋庆龄先生：可否从旁相助以及如何相助？

宋庆龄认为张学良想联共抗日是好事，应该给予帮助。说到如何相助一事，她想起前天史沫特莱和艾黎

曾带来一位避难的“周先生”，“是个颇有学问、经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很适合去从事这项工作。”她建议董健吾去史沫特莱家去和这位“周先生”谈一谈。

董健吾遵命来到史沫特莱家，他一见这位“周先生”惊得一怔，禁不住地说道：

“怎么是你？”

这位“周先生”淡然一笑，风趣地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全是万能的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嘛！”

这位“周先生”的真名叫刘鼎，原在中央特科工作，先是陈赓的副手，后是潘汉年的搭当，自然和董健吾是老熟人了。董健吾惊诧地问：

“你不是早已撤往中央苏区了吗？”

但是，刘鼎同志途经闽浙赣苏区的时候，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被封锁。经方志敏同志的劝留——并征得中央同意，他留下担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不久失利被俘。刘鼎等人隐藏在弋阳仙霞岭一带活动，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1935年盛夏，因下山觅食被俘。先解往南昌行营军法处，后转送九江俘虏营。他寻机逃离九江，潜回上海。刘鼎通过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蔡厚叔同志，找到在华的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当史沫特莱听说刘鼎是来自江西的红军，遂把刘鼎带到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并嘱咐道：“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刘鼎遂以“周先生”的化名留居在路易·艾黎的家里。

董健吾把张学良想找中共关于商谈抗日的事说了，问刘鼎可否当此重任。刘鼎感到事情有点突如其来，不知底细，就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董说：“到了西安才可以去陕北，这是一个条件，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

刘鼎听说这是找到党中央的一个途径，很兴奋，但想到事关重大，表示要考虑两天再答复。李杜得到刘鼎的答复，立即电告张学良：“寻找我朋友，已经找到了。”这时，张学良则刚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同中共建立了联系，但仍然很重视李杜介绍的关系，立刻选派自己的亲信，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从此，刘鼎摇身一变，成了中共派驻张学良身边的代表，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功勋。

时人和后人，也应该记住董健吾帮助张学良找到刘鼎同志的功劳。

两广总督叶名琛误国辱身记

● 吴印湘

1859年4月14日，一只英国轮船“十字火号”在广州市河金花庙岸边停了下来，一位英国军官叫来一位清朝官员，从船上抬下一具棺材。不久，大街小巷就传开了——上一年被洋鬼子捉走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如今尸骨还乡了。稀稀落落有官员来河边吊唁，不知是谁送来这么一幅挽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一连六个不字，写出了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颀顽自负，玩敌误国终至魂散异域的历史悲剧。

叶名琛是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五年（1835）中进士，历任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道光二十八年（1848）升任广东巡抚。第二年，英国侵略者再次提出进入广州城，叶名琛与总督徐广缙坚决不允，并联合民团严加防备，使其阴谋未能得逞。清政府原打算接受英人入城，听说广东交涉成功，喜出望外，降旨嘉奖，叶名琛封一等男爵。咸丰二年（1852）年，叶名琛继任两广总督，他以残酷手段，一举平定了广东、广西的会党起义，功拜体仁阁大学士。自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南大门，作为封疆大吏的叶名琛，虽然极其痛恨洋鬼子，但他顽固排外妄自尊大。英人入城失败后，叶名琛格外小瞧外国人。当时清政府还未设置外务官衙，两广总督实际主要负责与外人交涉事务，可是每有外国照会送来，叶名琛只是三言两语作答，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这样一来，就激怒了傲慢的英国驻华使臣，又使侵略者有了挑衅的借口。有些满清官吏私下批评叶名琛：“功日益高，气日益固，内既自雄，外遂轻敌，而祸机伏于是矣。”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带兵搜查停在黄埔的中国“亚罗号”商船，捕走十二名中国海盗水手。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口亚罗船领有港英执照，要求释放被捕水手，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拒绝。这就是英国侵略大肆宣扬、歪曲的“亚罗号事件”。巴夏礼立

即向叶名琛提出命令式的照会，要求中方放人并公开道歉。巴夏礼同时致书香港总督包令和海军长官巴厘，说“期待很久的对广州示威的良机终于到了”。叶名琛开始还婉言辩解，后来一再退让，送还全部被捕水手。但巴夏礼拒绝接受，转而命令海军按预定计划进攻沿江炮台。10月23日，叶名琛无视英军攻城之危险，一大早就前去校场观阅乡试马箭。不到一个时辰，就听到东边有隐隐的炮声，不久兵丁前来报告：三艘英军战舰驶入内河，已攻占了猎德、中流等炮台。各随行官员听后大惊失色，请商应变办法，叶名琛却微笑着说：“哪有这样的事！天黑自然会退兵的！”同时他下令，水师各船收旗，有敌船入内，不许放炮还击。第二天，英军继续进攻，相继占住凤凰山、海珠炮台，中国守兵都不战撤退。27日，英军在城外架炮，轰击总督衙门，衙役、仆人逃避一空，叶名琛一人闭目坐在堂上。29日，英军扑进广州城，到处杀人放火。叶名琛这才派出广州知府蒋立昂前去英领事馆责问兴师之罪，巴夏礼回答说：“英中两国官员不相会晤，两情不通，屡乖和好，我要进城会见总督。”但是叶名琛害怕会见后受洋鬼子当面羞辱，还有被人劫持、身遭不测之虑，所以他拒绝了巴夏礼。英军于是继续炮轰广州内城，焚毁多处民房，繁华的十三行也在兵火中化为废墟。

亚罗号事件传到英国后，内阁作出决定，扩大侵华战争，并勾结法国组织联军。1857年12月11日，英法两舰插白旗进港，向叶名琛送来照会，提出通商、入城、会晤、赔偿等多项要求，一面进行军事部署，封锁广州。叶名琛却错误地认为，洋鬼子白旗求见，表明他们技穷自服，求和通商，所以他提出：“若不再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并将节次要求各款，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则得陇望蜀，伊于胡底？”因此他对英法的侵略要求层层批驳，作了强硬答复。这份答复送出

的第二天，英法几十艘兵船驶进内河，占领河南地方，占夺民房驻扎军队，准备发动全面进攻。叶名琛却偏信英领事馆内的汉奸“内线”张同云的诬报，认为这是洋鬼子以开战姿势恐吓求和，不会真的动武。僚属中有人提出调兵设防，招募团练，叶名琛却发火说：“水面根本不是对手，兵勇虽多无益，陆路上鬼子不敢上岸，我敢出结保证。谁要添兵募勇，由他开支饷银！”这样一来，水路陆路到处不做防备，各乡团练也早被叶名琛赶出城外，大敌当前，广州事实上成了不设防城市。叶名琛又跑到他私建的长春仙馆求仙，得了“过十五日便无事”的乱语。阴历11月15日是阳历12月30日，当时有人劝他早作防备，叶名琛却满有把握地说：“别急，过了十五日就会没事的！”

12月26日，英法军队送来最后通牒，上列总督、巡抚、将军、左右都统五衔，除重申前次要求外，限叶名琛在24小时内答复，否则开炮攻城，使广州变成灰烬。叶名琛并没有将这份最后通牒给巡抚、将军等传阅，又私自作了强硬答复。28日凌晨，英法从海珠炮台上开炮，据当时一位英国战地记者描述：“缓慢而连续，沉闷而单调，好像隔一分钟一放的葬仪炮……炮轰继续着，没有排炮，没有快放，没有激动，每一炮都在许多分钟的瞄准后准确地打中城墙上的目标。”总督衙门成为英军炮弹的攻击目标，这里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叶名琛一人守在里面，挽起袖袍翻检重要文书。有人劝他赶快转移，叶却说：“只有这么一阵子，过去了就没事。”到了这种地步，叶名琛还死死地认为：这只是洋鬼子的恐吓伎俩。12月29日（阴历11月14日），侵略军进入广州内城，占据制高点观音山。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纳等被俘，广州城还没到“15日”就沦陷了！为此，有传言说，巴夏礼深知叶名琛迷信鬼神，所以贿赂了扶乩之人。

当时谣传叶名琛在城陷时自杀，其实叶逃离督署后，住进粤华书院。书院离观音山很近，常有英兵到门查寻，叶名琛又转退左都统署，仍照常会见下属，嘴上还念着“过十五日便无事”的乱语。提及和谈，叶指示说：“各绅讲和，他事都可许，或给以银钱都无可，盖彼实穷窘异常，独进城一节断不可许！”1858年1月5日，巴夏礼得到情报，派英兵包围左都统署，从第三院搜出左都统双龄。当时叶名琛住第五院，家人劝他赶快换个地方，叶不同意。过不久，英军据说从投降了的柏贵嘴里得到消息，又来搜查，终于将叶名琛抓到，然后用一顶轿子把他送往观音军营。当天晚上，又将他转押白鹅潭英舰“天畏号”，当时送行人中有人以手指水，示意叶名琛投水自尽，保住名节，但叶毫无反应。

英国人害怕叶名琛对广州的傀儡政府不利，把他解往香港。叶在香港应洋人之请，每天作书画相赠。随从劝他不要题写姓名留下笑柄，叶乃签下“海上苏武”。1858年2月，英军又将叶名琛转送英属印度。叶到孟加拉时，清政府也派人送来上谕，指责他“刚愎自用，办理乖谬，大负委任”，革掉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等一切职务。这实际上是做了傀儡的柏贵等人联名上书弹劾、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头上的结果。英国人把叶名琛安置在孟加拉大里恩寺镇海楼上居住，门外有四名英兵把守。叶名琛自带了几个仆人和衣物钱粮，每日赋诗诵经，饭量渐减，4月9日在风雨中凄然死去。洋医从叶名琛口中灌进半瓶水银药液，把他装进一口形似橄榄的铁皮棺里，准备把他就地埋葬了事。但有个在当地做生意的广东潮州人金子达不同意，出资把尸柩运回了广州。叶名琛从前一位下属华廷杰和几位湖北同乡，重金请来几位洋人打开铁棺机关，把他重新装殓，制棺埋葬。华廷杰还写了一首凄然的挽联：“身依十载春风，不堪回首；目断万重沧海，何处招魂？”

叶名琛玩敌误国，辱身丧命，无处招魂，除了他自己顽固愚昧外，也还有别的原因，薛福成在《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文中，对此作了较好的分析。他说：“昔林之忠公（林则徐）初禁洋烟之时，洋人未识中国虚实，有顾忌心，若使林公久于其任，未必无以善其后。乃使相琦善继之，而大局一坏不可振，耆英、伊里布又继之，和议遂定。彼时舍此无以弭外患，而主和议者例受人指摘，下流之居，未必如世俗所讥之甚也。粤民之与官相抗，亦琦、耆、伊三相有以激之。叶相见林文忠、裕忠节（裕谦）诸公，或以挑衅获重咎，或以壮往致败，而主和之人，又皆见摈清议，身败名裂。于是于可否两难之中，别创一格，以蕲所以自全者。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之间。乃举事一不当，卒至辱身以大辱国，而洋人燎原之势，遂无可复遏。然则洋人之祸，引其机者琦相，决其防者叶相也。”薛福成可说是揭穿了叶名琛“六不”行为的复杂内心与误国大罪！

本文参考材料：

1. 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
2. 华廷杰：《触藩始末》
3. 七弦河上钓叟：《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
4. 梨园：《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

以上均见中国史学会编《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料。

5. 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6. 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65年版。

蒋介石行刺陶成章

始末

●张家康

1912年元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距此仅十三天，闻名国中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竟在上海住院养病时遇刺身亡。消息传出，震动上海，震动全国，国人闻之无不瞠目结舌，言之愕然。陶案主使者为同盟会主要领导者之一、沪军都督陈其美，主要凶手则是其盟弟蒋介石。案发后，陈其美遮掩罪责，蒋介石逃之夭夭，陶案也便不了了之。八十多年过去了，陶案已是过眼烟云，飘浮流逝。但是，它的始末起源、孰是孰非，历史自有公论。

积怨成仇暗藏杀机

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幼年时曾受过很好的旧式教育，后又接受一些新书籍，思想渐趋激进，开始萌发推翻满清统治、挽救祖国危亡的革命思想。他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负责联络苏、浙、皖、闽、赣五省的会党工作。他与下层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常用麻绳束腰，穿着草鞋，日行百里，奔走革命。他对鲁迅十分信赖，常到鲁迅寓所谈论革命，兴起时往往口讲手划，眉飞色舞，告诉鲁迅什么地方不久就要“动”起来，什么地方已经“动”起来，他多次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享有较大的名望和影响。

1905年8月，以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为基础，中国同盟会作为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日本宣告成立。但是，同盟会内成分复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充斥其间，组织相当涣散。陶成章的宗派情绪和小生产的门户观念就是典型的一例。1908年，陶成章两度下南洋宣传革命，请求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款，孙中山因南洋经济恐

慌而未予支持。于是，他对孙中山产生误会和不满，开始不负责任地诽谤孙中山吞噬华侨巨款，并受章太炎蛊惑，要将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去，给革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是，在以武力推翻清王朝这一总的革命立场上，陶成章及光复会与孙中山及同盟会始终是一致的。到了辛亥革命时，各革命党派同举义旗，浴血奋战，旨在推翻清王朝，宗派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陶成章也意识到宗派主义的危害。1911年7月，孙中山在与伍平一的谈话时就把他与章太炎进行了比较，他说：“陶君为人予信其亦无他，不过东京党人（指同盟会）以其与太炎接近，遂疑及耳，惟予则不信其有异志，以才论，陶胜于章也。”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08年，他奉孙中山命回上海，联络沪、浙及京津革命党人。蛰居上海时，他常以青帮大头目的身分，周旋于三教九流之间，免不了上赌馆、逛妓院。陶成章对此深恶痛绝，多有微词，并当孙中山的面批评陈其美，劝其戒赌戒嫖，以不失革命者本色。陈其美以为陶成章有意侮辱他，故而顿生芥蒂，忌恨在心。

上海光复时，陶成章的功劳并不在陈其美之下，1911年11月24日《民立报》曾是这样记载的，陶成章“组织敢死团五百人……首次攻陷江南制造局、炸毁上海道署、浙江抚署等，俱系敢死团之伟业也。”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哄抬为沪军都督。可是，革命党内不少人并不信服陈其美，认为沪军都督一职非陶成章莫属。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交椅还没坐热，便又对转谋浙江都督一事甚为殷切。其时，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举章太炎、陶成章和陈其美为都督候选人。浙江士绅又纷纷致

电催促，共举陶成章主事浙江。陶成章无意浙江都督一职，当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竟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上海光复后，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游弋，并选择吴淞、闵行一带，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军事压力。凡此种种，旧怨新仇，是可忍孰不可忍。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剪除此公，以绝后患。

为虎作伥制造血案

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此时名志青）由日本回上海，投入陈其美麾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隶属于其把兄、师长黄郛的沪军第二师。陈、黄、蒋三位盟兄弟在上海滩相与托结，互为依存。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1908年春，他二渡日本后，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5月，又经陈其美介绍，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因此，蒋介石视陈其美为良师益友。他们虽是换过兰谱的盟兄弟，可是，人前人后，蒋介石从不冒昧地称其为六哥，而总是尊称其为“先生”。

他对陈其美唯命是听，唯马首是瞻。辛亥革命时，他远在日本，未建寸功。奉召返沪后，虽在杭州光复时率“先锋敢死团”参加战斗，但在革命党内仍是无名小卒。二十五岁的蒋介石少年气盛，常常为壮志未酬，才华难展而夜不能寐，辗转反侧。

蒋介石欣然接受了陈其美交予的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他以为是天赐良机，一可建功立业，令革命党人刮目相待。二可报答盟兄的知遇之恩。但是，执行如此机密的任务，非一人所能及，必须有一心狠手辣、武艺高强的人作为助手，方可如虎添翼，马到成功。他很快就想到他的旧交、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此人原为太湖强盗，枪法精湛，且可飞檐走壁，现虽加入光复会，但旧习未改，常以会内机密与人换取钱财。陶成章对此极为恼火，骂他是吃里扒外，猪狗不如的“瘪三”。蒋介石获取这一情报后，找到王竹卿，对其恐吓讹诈，散布陶成章俟机严惩王竹卿的谎言。王竹卿信以为真，铁心要先下手为强，杀害陶成章以保全自己。

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相继避居于客利旅馆、国民联合会、江西路光复会、汇中旅馆，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

1912年1月12日午夜，朔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

天气格外寒冷。几天来为寻找陶成章的行踪，蒋介石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蜷卧在马车的软座上，似睡非睡地打着盹，车经福州路时，迎面吹来的狂风卷起厚实的车帘，纷纷扬扬的雪花洒在蒋介石的脸上和脖子里，他打着冷颤，从昏睡中惊醒，睁开眼却意外地看见路旁屋檐下正在避雪的陶成章。蒋介石喜出望外，急令停车，车未停稳便“噎”的跳了下来，趋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打招呼。陶成章向以革命前辈自居，蒋介石对其又执弟子礼，和顺谦恭，所以陶成章毫不介意，两人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互致问询，谈得十分投机。当夜，蒋介石用自己的马车，把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记下了陶成章的病房号码。次日，蒋介石又带了礼品，以探视为名，实地勘察陶的病房环境及进出途径。

1月14日凌晨，地白风寒，夜凉如冰。广慈医院灯影黯淡，庭园岑寂。沿着墙根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蹑足来到二楼的走廊上，顺着门房找到205号病房。其中一人学着护士的腔调，轻轻地叩门道：“陶先生，吃药时间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朦胧间听见有人呼唤，便懵懵懂懂地“唔、唔”虚应着，当他刚拉开门，便应着“碰”的一声枪响，凄然倒地。清脆的枪声，划破冷寂的夜空，顿时，全院哗然，当护士匆匆赶来时，凶手早已遁去，血泊中的陶成章已丧命九泉。次日《民立报》是这样报道的，“……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室（院）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这二人便是蒋介石和王竹卿。

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陶成章被害后，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在上海举行的盛大追悼会上，不少人相继演说，词意悲壮激烈，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奸，非死于私仇，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私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说着便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当陶成章的骨灰迎回杭州，在杭州召开追悼大会，到会者多达万人，群情激愤，同声要求严惩凶手，

孙中山闻讯，十分气愤，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孙中山是个胸怀坦荡的革命家，陶成章虽然生前反对过他，和他有政见分歧，但是，孙中山不计前隙，对其惨遭暗害，深表痛惜，立即发出唁电，电文云：“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

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惜！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浙江都督府赏三千元缉拿凶手。作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也不得不装装样子，悬赏一千元缉拿凶手。

不多日，王竹卿缉拿归案，很快便被处死。蒋介石惶惶不安，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第三次东渡日本。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可是，蒋介石对这段历史却总是耿耿于怀。1935年，他的“天子门生”邓文仪著《蒋主席》一书，1937年，他的昔日老师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都直言不讳地叙述了陶成章被杀一案，他们混淆视听，改历史，说蒋介石之刺杀陶成章，纯是因陶成章不顾革命大局，并欲谋刺陈其美所致。蒋介石是不欲为之而为之，只得先下手为强。这一卑劣的恐怖行径反被他们说成“以安革命全局”，是蒋介石“革命重要历史之一也。”

中华民国肇始，百废待兴，人心未定，北方清廷重兵压境，新生的革命政权尚在襁褓之中，革命党内部如此相互仇杀，岂不使亲痛仇快，造成革命阵营内部混乱，什么杀害陶成章“以安革命全局”，纯系一派胡言。在中华民国的后来历史中，杨杏佛、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等人被暗杀，杨虎城将军一家被秘密杀害，正是陶成章历史悲剧的继续和发展，正是蒋介石压制革命、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专制独裁的历史劣根性的必然轨迹。

鬼戏《李慧娘》

●穆欣

六十年代初，老作家孟超新编昆曲《李慧娘》，深受广大观众的赞赏和戏剧界的好评。这出戏从改编到演出，原曾得到康生的支持和赞扬。可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康生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翻脸不认帐”。他竟串连江青，把《李慧娘》打成“反党毒草”，对作者残酷迫害，终使孟超同志含恨逝世，造成文艺界一桩罕见的冤案。在这整个过程中康生扮演了卑鄙可耻的角色。

（一）《李慧娘》推陈出新，获得广泛的赞扬

孟超，原名孟宪，号励吾，1902年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共产党员。曾在我国文坛上驰骋半个世纪。他是二十年代“太阳社”诗人，三十年代“左联”作家。长期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国民党统治区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生活刻苦，写作勤奋，有诗集《候》、《残梦》，小说集《冲突》，历史小说《骷髅集》等问世。尤擅杂文，出版过《长夜集》、《赤偃草》等。他曾致力于野史、稗官小说之类，所写杂文别具一格，尖锐泼辣，针砭时弊，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国后曾任中国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等职。继续活跃于文坛，兼务杂文、戏剧，常在报刊发表文章。1959年冬天，他应北方昆曲剧院的约请，将《红梅记》改编为《李慧娘》。

《红梅记》是明代戏曲作家周朝俊（夷玉）所作传奇剧本。写的是南宋时书生裴禹同卢昭容相爱，受权奸贾似道迫害，历经磨难终于结合的故事。剧中有贾似道侍妾李慧娘，因在西湖邂逅倾盼裴生而被贾似道杀害，进而拘捕裴禹。慧娘鬼魂与裴生相会，救裴脱难，并与贾似道面辩，突出地表现了慧娘的复仇精神和反抗性格。

此剧在明代有袁宏道删订本，徐肃颖改订本。后世昆曲及高腔，皮簧、梆子系统的大型地方剧种，均有据《红梅记》改编的剧目。孟超根据玉茗堂本《红梅记》，同时广泛搜集和研究了有关的剧种和剧目，如秦腔《游西湖》、川剧《红梅阁》、梆子《阴阳扇》、京剧《红梅阁》等，在此基础上，去芜取精，将原有34场的《红梅记》，提炼为6场的昆曲《李慧娘》。前后埋首

冤案画上句号



书案一年，于1960年春夏之交完成了初稿。改定以后，1961年在《剧本》杂志第7、8期发表，1962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孟超改编本《李慧娘》，删去原作中裴禹与卢昭容的婚姻故事，集中刻画南宋末年太学生裴禹和奸相贾似道的宠妾李慧娘之间离奇、悲壮、纯洁的生死恋，突出反映了贾似道荒淫误国以及人民对他的斗争。全剧叙述贾似道偕众侍妾游西湖，被裴禹等太学生撞见。裴禹当面痛斥奸相误国害民的罪行。贾似道对裴禹恨之入骨，侍妾李慧娘见他英俊倜傥，不禁脱口称赞。不料被贾似道听到，怒不可遏，下令回府，将李慧娘杀死，埋在后园红梅阁畔；又将裴禹骗入相府，关在红梅阁里，准备第二天将他杀害。李慧娘死不瞑目，她的鬼魂又回到人间，到红梅阁与裴禹幽会，救裴脱难，并寻贾似道当堂辩论，痛斥奸相。新编本突出描写裴禹对南宋腐败

朝政的抨击和李慧娘对奸贼贾似道的反抗斗争，突出了李慧娘的正义感，提高了全剧的思想性。经过改编，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李慧娘这个优美可爱，爱憎分明，伸张正义的复仇女魂，揭露了权奸误国，写出了爱国的正义斗争。

孟超在《李慧娘》剧本的跋语中，特地说明他改编此剧的思想出发点，“不过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而已”。他说：“有人认为李慧娘生前懦弱，死后坚强，虽亦感人动人，毕竟是虚无空幻，寄希望于渺茫，也难免有过屠门而大嚼，聊以快意，无补于现实；但我则终以为生前受尽压迫凌辱，白刃当前，渐露与权奸拼死斗争之机，染碧血，断头颅，授死不屈，化作幽魂，再接再厉，不仅为个人复仇雪恨，且营救出自己的心佩情往之裴禹，并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如此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即是纤纤弱质，亦足为鬼雄而无惭，虽存在于乌何有之乡，又焉可不大书特书，而予以表彰呢。”

1961年夏秋之间，《李慧娘》由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正式公演。剧中主要人物，由李淑君饰李慧娘，丛兆桓饰裴禹，周万红饰贾似道。新编本不但突出了不畏豪强，为民请命的主题，在政治上加强了反对南宋腐败政权祸国殃民的斗争，在艺术上也吸取《红梅阁》、《阴阳扇》等地方戏传统剧目中一些优点，使游湖、杀姬、幽恨、放裴、鬼辩诸场唱做并重，抒发了李慧娘爱憎鲜明的强烈感情。裴禹、贾似道等人物形象也都刻画得比较突出。此剧经过认真排练，主要演员的功力高超，自始到终，唱做兼重，载歌载舞，别具风格，表演精彩迷人。李慧娘扮演者李淑君的表演尤其出色。改编本独创的《幽恨》一场，李慧娘出场时用脚尖走快速的挫步，宛若凌云御风，飘然而到。整个表演不落俗套，没有运用喷火、变脸等特技，而以魂步、鬼纱等渲染精灵的气氛，还穿插了腾空跃起、盘膝而落等很见功底的表演，给人以视觉、听觉等多方面美的享受。公演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博得戏剧界、评论界等各界人士的热烈赞扬。首都

各报发表的评论，无不认为《李慧娘》是个成功作品：结构严谨，矛盾集中，人物鲜明，文字清新。《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作《一朵鲜艳的红梅》的评论。《光明日报》于1961年9月1日发表两篇评论：《个性以辣，风格以情——观北昆〈李慧娘〉偶得》（长白雁）和《略谈昆曲〈李慧娘〉的导演》（郑亦秋）；8月19日还发表了陈迺冬的两首诗词：《满庭芳·北方昆曲剧院上演孟超同志所编〈李慧娘〉》和《〈李慧娘〉观后》。前者全文是：“孟老词章，慧娘情事，一时流播京华。百花齐放，古干发新葩。重谱临安故实，牵退思，缓拍红牙；樱心处：惊弦急节，铁板和铜琶。堪嗟！南渡久，朝酣百戏，野哭千家。看美人碧血，沁作丹霞。鬼辩半闲堂上，夺奸胆、击鼓三挝。浑不似，秋阶蟋蟀，白露泣蒹葭。”

这年8月3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以“繁星”笔名写的《有鬼无害论》。他曾观看了《李慧娘》的公演。观后写作此文，热情地为《李慧娘》“作护法”，赞扬这出戏“不但思想内容好，而且剧本编写得不枝不蔓，干净利落，比原来的《红梅记》精炼”，集中最精彩的部分，充分发展了这场斗争，“是难得看到的一出改编戏”。

这篇文章是廖沫沙应晚报记者的约请撰写的。记者约稿时说：“许多人看了都觉得戏编得好，只是把李慧娘写成鬼，舞台上出现鬼魂，让人看了总觉得不好。”廖沫沙当时的想法是，“舞台上常演《游园惊梦》、《钟馗嫁妹》等鬼魂出现的戏，人们不都很喜爱吗？同时想到的是，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过舞台上的牛鬼蛇神无须禁绝……。”（陈海云、司徒伟智：《廖沫沙的风雨岁月》）

廖沫沙的文章针对那些观众的顾虑说：“依照唯物论的说法，世界上是没有超物质的鬼神存在的。相信有鬼神，是一种迷信。”但在我国文学遗产中，许多作品“是离不开讲鬼神的”。“问题在现代来改编旧戏，可不可以或应不应该接受、继承前代人的这些迷信思想？”文章指出：“在文学遗产中的鬼神，如果仔细加以分析，就可发现，它们代表自然力量的色彩已经很少，即使它们的名称还保存着风、雷、云、雨，实际上它们是在参加人间的社会斗争。本来是人，死后成鬼的阴魂，当然更是社会斗争的一分子。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我们不能单把她看成鬼，同时还应当看到它是一个至死不屈服的妇女形象。”

文章说：“是不是迷信思想，不在戏台上出不出鬼

神，而在鬼魂所代表的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是屈服于压迫势力，还是与压迫势力作斗争，敢于战胜压迫者。前者才是教人屈服于压迫势力的迷信思想，而后者不但不是宣传迷信，恰恰相反，正是对反抗压迫的一种鼓舞。”因此，作者认为：“如果是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这篇文章不是从哲学意义上肯定鬼神的存在，而是从文学意义上赞扬赋予鬼神形象以反抗压迫精神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原是一篇富于创见、立论新颖的好文章，不料却和《李慧娘》一起惹来了一场灾祸。

（二）福兮祸伏，康生说：“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

康生和孟超都是山东诸城县人。康生原名张叔平，张、孟两家均列名于诸城四大地主（张、臧、王、孟）。（在这桩冤案中申通康生迫害孟超的江青，也是诸城县人）康生同孟超不单是同乡，还是亲戚。1964年7月24日，康生在钓鱼台召集几家中央报刊和中央、北京市委宣传部门负责人讨论学术批判问题的会议上，曾经谈到孟超。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吴冷西、胡绳、邓拓、李琪、范瑾、陈浚、范若愚等。康生在会上比较详细地谈了批判“合二而一”的经过和下一步批判的计划后，又泛论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提到新编《李慧娘》的时候，康生说，孟超是我的老同学，我和他在明星社同台演过话剧。两家还是亲戚，我姑母是他嫂嫂。我们一同去上海大学读书，他进中文系，我在社会系。“四·一二”前，他在上海沪西区委当过我的宣传部部长。大革命后，他们有一批人组织太阳社，蒋光赤为首，还有阿英、陈波儿等。实际上，康生同孟超的关系还不止此，当时康生故意隐藏了某些重要情节。孟超的岳父赵孝愚是山东省安邱县名门望族，清末曾在北京任过九门提督。康生由山东去上海时，曾在济南得过赵孝愚的资助。孟超和凌俊琪1928年在上海结合，是经由康生、曹轶欧夫妇介绍的。1956年康生由山东调到北京不久，听说孟超有个女儿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曾通过副部长王甫和部长安子文找到孟超的三女儿陆沅（孟博）。第二年秋天，康生还请孟超和陆沅两家人到他家里去作客。孟超的革命经历，康生是完全清楚的，以后仍然常有来往。

从1959年着手改编《李慧娘》起，孟超曾多次向康

生“讨教”，请他提意见。康生始终表现了特别的热心，曾经看过原稿，提出过不少修改意见。1960年彩排的时候，他也到剧场来看过，曾出主意把李慧娘所戴的蓝色鬼穗子改为红色。他还为剧本改词，将剧本中李慧娘在游西湖时见裴禹斥贾贾似道而生敬意发出的叠句“美哉少年！美哉少年！”改成“壮哉少年！美哉少年！”其后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又指令《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不然他就不看。1961年8月，这出戏正式在北京长安戏院公演时，康生亲去观看，深表满意。看后曾和到场观看的许多首都文化界知名人士登台祝贺，并与孟超及全体演员合影。还曾写信给孟超说“祝贺该剧演出成功”。康生除了全面肯定《李慧娘》的编导、音乐和表演，还说它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称赞孟超“这回做了一件好事”，指令“北昆今后照

听齐燕铭讲，词写得好，比一般昆曲通俗。我看过后，觉得就是好，所以向总理推荐。当晚，此剧即在17号楼小礼堂演出，董必武同志也陪总理一起观看。我因先前公演时已看过，还需回去上夜班，饭后就先回报社。据知，在演出中，总理和董老都很赞赏。演出结束后，总理、董老与演员握手道贺并合影后离去。康生对孟超和剧院导演、作曲、主要演员及北昆领导人又进行了长谈，再次对《李慧娘》作了全面肯定，赞扬它“改得好”、“演得好”，是北昆成立“5年来搞得最好的一个戏”。

康生将《李慧娘》推荐给总理观看，也不是偶然的。因为这出戏的诞生，同总理的启迪有关。总理是昆曲爱好者，1958年看过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戏《红霞》。看完戏，总理接见全体演员和职员，在同他们谈话时说，剧院今后的剧目，应当三并举：既演出优秀传统戏，也要演出新编历史剧，还要演出革命现代戏。对传统戏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推陈出新。1959年冬，北昆剧院领导同志听说孟超正打算根据《红梅阁》等传统剧目，突出李慧娘编写一出新戏。他们觉得合乎总理指示的精神，就约请孟超把周朝俊的《红梅记》改编为昆曲《李慧娘》，康生那样对这出戏的改编、演出“关心”，不会不晓得剧本的这个来由。他将这出戏推荐给总理，显然不无“表功”的因素在。在这一点上，他和江青的“脾气”是相同的：喜欢把别人劳动的成果据为己有；惯于将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所以，康生见总理在观看演出中很赞赏，他更喜形于色，甚为得意。孟超这天晚上陪总理、董老看戏，听到总理称赞演出成功，心情激动，深受鼓舞。但当回到家里，向儿女



■1976年4月，孟超逝世前与外孙女合影

谈起来的时候，他又尽量抑制着这种激情，只是简单地

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这年10月，康生还把这出戏推荐给周恩来总理观看。10月15至23日，总理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14日晚，康生特地安排北方昆曲剧院到钓鱼台演出《李慧娘》给总理观看。康生知道我和孟超熟识，这天叫秘书打电话到报社，让我用车陪孟超和北昆剧院扮演李慧娘的李淑君先去钓鱼台。康生还在8号楼设小宴招待他们。席间康生兴致很高，对这出戏赞赏有加。他说，《李慧娘》这出戏，先有王昆仑来信称赞，再是

说：“总理看得高兴，鼓了掌。”这并没有瞒过儿女们的眼睛，她们从他的神态看出他内心不寻常的兴奋、激动。那个瞬间的情景，至今陆沉谈起来还历历在目，宛若昨天的事。在这里，孟超的谦诚和康生的奸计，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康生翻云覆雨，孟超大难临头

这个时期，1957年开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有所发展。1962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中将社会主义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时号召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次会议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

紧跟政治气候的变化，擅于见风转舵的康生，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兴风作浪，进行政治投机。在十中全会前后，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李建彤著）是“为高岗翻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写了一个字条向毛泽东诬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念这个字条，康生就到处宣扬说，“这是毛主席指示”，后来竟然把它编入新版《毛主席语录》。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康生极力煽动，事情还没弄清楚，就把与小说作者有关连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反党集团”。

康生对孟超和《李慧娘》的态度，这时也在迅速地变化。这年7、8月间，中央为了对全党干部进行再教育，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组织编写轮训干部用的两本教材（党的建设、社会主义），陆沉参加了编写组，前往北戴河开会。对这两本教材的编写，邓小平亲自抓，叫康生主持。有一次讨论教材编写工作的会议上，康生突然对陆沉说：“告诉你爸爸，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写别的东西。”8月底，康生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十中全会开幕前夕，他又给孟超送来一个字条，上面写着：“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康生”。

几年来异常起劲地提倡大演鬼戏的康生，突然写了这么一张字条，显得十分奇怪。深知康生为人的孟超，马上意识到，此公要变脸了，要洗刷他同大演鬼戏的干系，尤要抹掉支持《李慧娘》的痕迹。这个信息不胫而走，在戏剧界迅速地辗转传开，人们无不为孟超捏一把汗。1963年起，《李慧娘》就被打入冷宫。但是，这年8月11日，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李慧娘》时还曾说过：“周扬同志告诉我，孟超写了检讨，其实不一定写检讨。”孟超告诉笔者，康生当面也曾这样“宽慰”过他。并说，其间康生曾经多次要他前去交谈，1964年元旦还曾去过。表面看来，康生对孟超似乎依然“关切”，暗中却正在加紧陷害。

1963年起，《李慧娘》开始受到报刊的批评，被打成了毒草。主要理由有两条，一是说戏中出现了鬼魂形象，是“鬼戏”，宣扬封建迷信；二是说孟超在改编时，突出裴禹、李慧娘两个主要人物的反抗和斗争性，是着意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剧中奸相贾似道的官职称作“平章”，李慧娘有“千古正气冲霄汉，俺不信死慧娘斗不过活平章”的唱词，有人就说是反对现在的国务院总理。这当然是强加给作者的罪状，纯属无端诬陷。

1962年11月22日和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相继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说：“近几年来‘鬼魂’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的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报告》要求全国各地，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题材。

这样，就给《李慧娘》判了死刑。《有鬼无害论》也被与《李慧娘》联结在一起进行批判。在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的《报告》后不久，5月6日和7日，上海《文汇报》接连两天发表了江青通过上海市委组织的、长达近两万字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严厉批评，指责《李慧娘》作者及其辩护者是影射共产党。戏剧界对“鬼戏”的批判高潮由此进一步展开。

这篇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璜撰写、以笔名梁壁辉发表的文章，硬说孟超改编《李慧娘》，“并没有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相反的，却发展了糟粕。”同时武断地将《有鬼无害论》归结为：提出了一番“‘有鬼无害而且有益’的奇谈怪论”。文章指责廖沫沙“忽略了鬼魂迷信的阶级本质，因而也忽略了它对人民的毒害。所以，他能够很轻松地认为‘有鬼无害而且有益’了。”“一般的有鬼论，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看出它的迷信；而现在，把这种空虚、软弱的思想，用‘反抗’，‘斗争’等的字眼加以涂饰，就不大容易为人辨明。”它还将廖沫沙的文章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联系起来，认为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在封建迷信活动时发生的条件下，“我们就应当注意帮助人

们破除迷信，至少也不要去拨动封建迷信的余烬，使其复燃。”梁文说，对待“鬼戏”，“并不是‘没有办法可想’。有些鬼戏我们可以干脆不演；有些鬼戏可以把鬼去掉，例如《十五贯》，本来有鬼的，现在无鬼了，而且也更好看了。”文章还说：“生活在当前国内外火热的斗争中，却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

以后闻知，原先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里列入了《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也写上了作者的署名“繁星”，但当自称为文艺界“流动哨兵”的江青看到这个报告的原稿时，她说：“你们知道‘繁星’是谁吗？他就是廖沫沙。为什么不把他的真姓名写上？”可见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正是江青与康生合谋策划指挥的。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下达、梁壁辉的文章发表后，批判“鬼戏”、围剿《李慧娘》的这场烈火就更凶猛地燃烧起来。

实际上，这个时期提供大演那些早已禁演的坏戏、鬼戏，宣传封建迷信的正是康生和江青。1960年末，康生不顾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忽然热衷于多年不再上演的旧戏。他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讲：“旧戏要照老样子演，不然我不看。”他借口“京戏中的花旦戏实在太少”，特意在北京点演解放后禁演的《花田八错》。担心著名演员不愿或不敢照原样表演，康生亲自跑到后台鼓劲，叫她放手演：“过去怎么演的，现在还怎么演，演全本的，出了问题算我的。”受其影响，一时间舞台上出现了《纺棉花》、《马寡妇开店》等不堪入目的下流淫荡戏。康生凭借权力，以后又在昆明、成都、杭州等地继续强迫一些剧团演出了许多未经整理、早已禁演的表现色情、宣扬迷信的坏戏，如《十八扯》、《宝蟾送酒》、《辛安驿》、《虹霓关》、《大五花洞》等。经他“发掘”出来的《红梅阁》、《盗魂铃》、《大劈棺》和《大五花洞》，都是地道的“鬼戏”。康生反对京戏演现代戏，曾经对人说：“谁叫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在昆明，康生叫金素秋演《宝蟾送酒》，有人反对，他却蛮不讲理地说：你允许看《红楼梦》，为什么不让我唱这出戏！1962年春，他陪江青又在杭州连续点看了不少久已禁演或演员自动不演的《虹霓关》、《打渔杀家》、《斩黄袍》、《战太平》、《沙桥饯别》等剧目。演员对这种戏历来是抵制的，早已不演，康生伙同江青仗势压人，非看不可。结果上行下效，致使一些坏戏、鬼戏在各地舞台

上泛滥，形成空前的混乱局面。

十中全会以后，康生马上来了一个急转弯。为了赖掉他曾鼓吹大演坏戏、鬼戏的账，一改过去反对戏剧改革的面孔，顿时变成了京剧改革的激进派。他和江青相勾结，打起“京剧革命”的幌子，到处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将许多优秀作品打成毒草，陷害许多著名作家。他们挑起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本来受到人们赞扬的《李慧娘》，也被康生、江青扣上“反党”的帽子，遭到围剿。1964年还在行政上采取措施，强令孟超“停职反省”。

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批判，声势逼人。但是仍有不少戏剧界、学术界人士表示了不同意见。尤其是各个剧种的演员，对于这样的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鬼戏”一律禁演的做法，心里是不服的。许多人认为，鬼戏中有糟粕，也有精华。那些宣扬迷信、淫荡、荒诞、恐怖的“鬼戏”极端有害，但是好的“鬼戏”则有积极的意义。不能认为“鬼戏”都无教育意义，有些“鬼戏”曾经激起人们反抗压迫者的情绪，得以长久流传。一律抹杀“鬼戏”，不是艺术批评。有的文章说：“鬼戏”像其他文学遗产一样，也是“糖蜜和毒素往往紧紧地混合在一起”。“鬼戏”的好坏要看具体内容，而不应该把所有的鬼戏都要“拉下舞台”。邵力子，宗白华教授等一些知名人士，都曾向《光明日报》记者表示，赞成演出“鬼戏”。宗白华说，从艺术欣赏角度来看，“鬼戏”中确有极为精彩的东西。他说，“鬼戏”是历史的产物，看待“鬼戏”要用历史的眼光。在旧社会里，被压迫人民有冤无处申，有仇无法报，只能借托鬼魂来报仇雪恨。因此，生不能报仇，死化作厉鬼的思想，不能说是消极的。试想，在南宋，一个弱女子如李慧娘，面对着权奸贾似道，除了化作厉鬼，还有什么抵抗的办法呢？孟超改编《李慧娘》并没创造一个新鬼，还是《红梅记》里的那个旧鬼，这样改编是可以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有位住在北京崇文门外的读者反对批判《李慧娘》，要求《光明日报》编辑部转给孟超诗一首。诗曰：“鬼影婆娑鬼更香，人情足可傲荒唐。为文轻薄凭他去，醉步狂影李慧娘。”来信没有署名，只在诗末自注：“今之妄评昆曲《李慧娘》，余不服，口占一绝，寄孟超先生指正。”

在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了“两个批示”以后，1964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江青又对《李慧娘》大张挞伐。康生竟把《李慧娘》作为“坏戏”的典型，号召继续对它围剿，严厉批

判。他既批孟超，又批廖沫沙，说他们是“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7月30日在会演结束时的讲话中，康生竟然指责北京剧协“15年来没有写出一个好剧本，相反倒有了《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并且上纲说，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就是思想、立场不是为工农兵劳动人民服务的，不是为社会主义的，而相反地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为少数人服务的。”他还故意“装蒜”，装作惊奇莫名的样子质问北京剧协的同志：“为什么会出现了牛鬼蛇神，出现了《李慧娘》这样的鬼戏？”责令各地对此情况一定要作出“彻底检查”。继而又说：“六二年我们才发现，我们共产党内部有的负责同志反对党的这个方针（按：指江青的所谓‘京剧革命’方针），进行反党活动。这些反党分子拉拢戏剧团体的人在他们周围，你们西北方面的剧团应当知道这个问题，北昆剧团的同志应当了解这个问题。……党内有些反党分子有时候也利用他们的地位，利用同志们不晓得情况，利用你们向党进攻，扩大他的影响。”

康生说，《李慧娘》是代表着死亡了的阶级的，“李慧娘这个鬼说要报仇，向谁报仇？就是向共产党报仇！”经他这么一讲，报刊上对《李慧娘》的批判跟着升级，不再局限于“封建迷信”之类的学术问题，而上升到指责孟超是拿这个剧本，配合反动阶级势力“向党报仇”的政治问题了。

康生信口雌黄，如此蛮横地把“反党”的帽子扣到孟超和《李慧娘》头上，是毫无根据的诬陷。只要看一看这个剧本，就能揭穿他的谎言。在原本《红梅记》中，李慧娘就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纯情善良的勇敢女子，描写得相当精彩动人。《鬼辩》一折，更突出地表现了她复仇的精神和反抗性格。孟超新编《李慧娘》发展了原作将裴、李爱情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写法，加强太学生反对南宋腐败政权和贾似道误国害民的斗争，并以此作为裴、李爱情的基础。新编本更加突出了李慧娘对贾似道的反抗斗争，使她愈加光彩夺目。李慧娘变鬼后，“忧的是灾黎苦，愁的是流离怨”，在贾府后园救出被囚禁的裴禹。在《鬼辩》一场中，她与贾似道当面展开辩论，痛斥贾似道欺君误国，残害百姓。谴责贾似道：“俺笑君王无知昏庸，／认你做好平章。／你却向元兵称臣投降，／任意诛杀、苦害善良，……”发出“俺李慧娘，生作冤禽，死为厉鬼”，“俺不信死慧娘，斗不过活平章”的正义誓言。剧中也突出了裴禹对南宋腐败朝政的抨击，《游

湖》一场中对贾似道严词质问：“为什么劫民盐，重利盘剥，／为什么占民田，压榨抢掠，／为什么增赋税，强索豪夺。／为什么滥用刑法，排挤善类，杀人如麻……／闹得这大宋朝，哀鸿遍野，黎民失所。”这种忧国忧民，除暴安良的主题，不正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么？

可见，康生强加给孟超的罪名全属于虚乌有，根本不能成立。他和江青串通起来，突然如此起劲地批判“鬼戏”，围剿《李慧娘》，意在进行政治投机。想以玩弄“金蝉脱壳”、“销赃灭迹”的伎俩，来遮掩他对这出戏曾经那样地热心“关注”，抹掉自己带头鼓吹大演坏戏、“鬼戏”的事实。

（四）康生落井下石，铸成亘古奇冤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来，《李慧娘》的作者、导演和编辑出版部门的同志，以及曾经写文章赞扬这出戏的廖沫沙等，甚至著文泛论过“鬼戏”可以演出的作者，毫无例外地都遭受了残酷的政治迫害。这出戏的导演白云生，也和作者一起受迫害致死。前后株连之广，是罕见的。

康生没有放过孟超，江青夸耀她的“战绩”时也没有忘记围攻《李慧娘》、挾伐《有鬼无害论》的“功勋”。江青经由柯庆施、张春桥“组织”的那篇《“有鬼无害”论》，“文革”期间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刘邓司令部展开的猛烈反击”。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说，它是“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1967年4月12日，她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呵！”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孟超既被康生、江青两个大奸贼惦记着，自难指望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廖沫沙虽已被迫对《有鬼无害论》作了检讨，1965年2月16日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我所写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第二天《人民日报》摘要转载），但他仍为江青“念念不忘”，硬把这篇文章作为他的“反党罪证”，揪住不肯松手，使他在“十年浩劫”中为此继续

大吃苦头。就连约请廖沫沙写作这篇文章的《北京晚报》记者侯琪，也被责令写“交代”。

孟超和廖沫沙还被一齐扯进另外的两桩公案。先是上海《文汇报》以全版篇幅，重新刊登了1961年《海瑞罢官》公演时《北京晚报》发表的5篇文章。其中有孟超以史优笔名写的《也谈历史剧》，廖沫沙以繁星笔名写的《“史”与“戏”》。接着又被“造反派”揭发说，孟超、廖沫沙和吴晗、邓拓等一起在《人民日报》副刊的杂文专栏《长短录》中写过杂文。这样，他们两个又被和吴晗捆在一起当作靶子打。

孟超和《光明日报》联系比较密切，经常给这个报纸写文章。因此，这场围剿也没有放过《光明日报》和当时主持工作的笔者。报社的“造反派”极力追查孟超同我的“黑关系”。他们从1960年4月30日至1961年3月16日《光明日报·东风》上，查出孟超的18篇文章，就把题目、笔名和刊出的时间，列表公布于“造反总部”1967年12月10日非法出版的什么《光明战报》第13期上，名曰《穆欣勾结孟超在〈光明日报〉放毒帐单》。同时攻击笔者“说过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写得‘文字优美，通俗易懂’。”诬蔑我“在向上汇报的《情况》中谎报军情，大刊特刊孟超一伙吹捧孟超（按：指《李慧娘》）反映，不登广大读者批评孟超的意见”；还无中生有地造谣说，《李慧娘》受到批判以后，笔者“到四川饭店大宴孟超，为其壮胆压惊”。经过如此这般的罗织周纳，就诬陷孟超和笔者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勾当。

“十年浩劫”当中，一直是无法无天的揪斗，没完没了的“交代”，孟超受尽折磨。打从“文革”开始，康生、江青这两个诸城县的“老乡”就揪住孟超不放。他不单精神上备受摧残，生活也异常艰难。他的夫人凌俊琪建国后因身体健康欠佳，提前辞职，在家操持家务。老少几口主要靠他的低工资过活。本来日子就比较紧，这时每月又强行扣掉工资100元，告他说是“交党费”；《李慧娘》的稿费也全部被逼迫交公，弄得生活都很困难。（这也是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作法。一边把别人打成“叛徒”、“反革命”，一边又强扣别人的工资，说是“交党费”。把交党费当作一种“惩治”手段，实在是对党的亵渎。而在孟超的冤案平反之后，亲属多次要求退回非法扣留的工资、稿费，始终未得到解决。）家中本无什么值钱东西，“抄家”时他最心爱的藏书都被劫走。

为了解脱强加在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罪名，孟超曾把康生写给他的两封赞扬《李慧娘》的信，交给逼他“认

罪”的中央专案组。可是，掌管他的专案的，就是康生本人。这两封信自然如同石沉大海，杳无消息。《李慧娘》首次演出时，康生看后曾与前去观看的文化界知名人士上台祝贺，并与编剧、导演、演员合影。孟超一直把这张放大的照片压在卧室书桌的玻璃板下。“文革”开始不久，康生就派人将这张照片抢走。（这是当时康生采取的一种“应变”手段：谁“出了事”，他就派人把先前给这个人题写的字、或其他具有“康生”标识的东西迅速夺回，以示他同此人“从无瓜葛”。）康生为了赖帐灭口，竟将孟超定为“叛徒”。江青也亲笔诬陷他“是一个重要叛徒，反革命分子”。

孟超遭此不白之冤，控诉无门，奇冤难申。面对权倾天下的康生、江青联手迫害的千钧压力，宛若泰山压顶，陷入绝境，决心以死抗争，曾经服毒，生命垂危。经家属发现后急送医院抢救。接诊医生执行江青一伙“医疗为政治服务”的方针，竟向闻讯来到医院的专案组人员问道：“这个人你们还要不要？”专案人员讲：“这是一个大叛徒，可不能让他死了！”这才加紧抢救活过来的。人是活过来了，可是心灵上的巨大创伤，再也无法愈合。严酷的现实摧毁了孟超那颗老骥壮心，无情的折磨使他痛苦不堪。他在悲愤、屈辱、凄绝、惶惶不安的心情中度过生命的最后岁月。

在此期间，孟超全家的成年人无不受到株连，甚至连未成年的第三代也没有躲过这场劫难。他的夫人凌俊琪是湖南人，早年由烈士余立亚（是他表哥）带到上海参加互济会工作。1927年“四·一二”后的血腥日子里，余立亚被国民党枪杀，白色恐怖严重，没人敢去收尸，是她挺身而出，将烈士安葬。“文革”中她因不堪折磨，患了重病。经家人送到医院，医生不问病情，却先盘问病人“什么成份？”再决定是否给她医治。女婿方德气愤地说：“是烈属”，医院才将她收下。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病情迅速恶化，于1970年12月病逝。病重时她因不知陆沉下落，倍加思念，昏迷中还连续呼唤“陆沉”的名字。当时陆沉在吉林省白城子干校正被“群众监督劳动”。家里在一天中连给陆沉发了三封电报，干校专案组都没有交给她。第一封电报讲“病危”，干校却对她说成“病重”；第二封仍讲“病危”，根本没告诉她；第三封讲“临危”，他们竟说：“完了，你回去也没用了。”始终不让她回京和她见上最后一面，造成无法弥补的终身遗憾。

孟超共有5个女儿。大女儿是共产党员，在青岛工

作；二女儿早毁；其他3人在北京工作。陆沅是1948年从华北局党校调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当时中组部驻在河北省平山县城南庄），先后作过安子文部长的秘书、研究室研究员。她被中央专案组定成“三条黑线”：首先是受父亲孟超冤案牵连；还说她是“刘仁的地下党员”（他们胡说“刘仁的地下党员全黑了”）；“安子文死党”。后者纠缠最久。安子文冤案在中央组织部机关内外立案关押和株连108人，其中迫害致死6人。在康生捏造的安子文的所谓“特务电台发报案”中，陆沅被诬陷为“安子文特务系统香港与青岛特务密线重要成员”。她从1967年4月起就被隔离审查，蒙受了长达12年的严酷迫害。



■1978年10月12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了孟超同志追悼会

刘少奇同志的冤案都已平反了，因安子文冤案还未平反，她仍继续受迫害；安子文同志的冤案平反前后，眼看有了指望，另又无中生有地诬陷她“恶毒攻击毛主席”。继续把她困住，总不让她解脱，一直整到1978年。她虽没有坐牢，但在中央专案组逼供的时候，经常以要她“进去”（即关进秦城监狱）相威胁。有一次，专案组找她谈话时竟然说：“你的问题是敌我矛盾。我们把‘帽子’拿在手里，你得老老实实，不老实就给你戴上！”她在中组部内“隔离审查”期间，专案组军代表向她逼供，曾经多次蛮横地动武。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对她拳打脚踢，揪头发、捺脖子，弯腰“请罪”。她的左耳被打致聋，始终没有治愈。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紧急命令”后，把她“发配”到吉林白城子中组部“五七”干校，交“群众监督劳动”（其后中组部“五七”干校迁往河南省长葛县，随同前往）。她丈夫丁克在北京市做教育工作，“文革”一开始就被揪斗，强给他挂的牌子上写着：“孟超的女婿”。四女儿孟健原在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教书，被放逐到地方工厂当工人；她的丈夫方黎德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演员，被诬陷为“重要叛徒”。在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的小女儿孟伟，写了一条“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仅因笔迹不很端正，硬诬陷她写的是“毛主席‘才’岁”。无情的揪斗、批判，加上父亲的冤案，如同晴天霹雳，霎时大祸临头，猝不及防，使她受到极

大刺激，工作也受到严重影响。

这桩冤案还株连到第三代，孟超几个外孙女都被迫失学，致使这个几代“书香之家”的后代不能读书。虽然以后她们全都奋发图强，自学成才，在事业上各有成就，但再没有人习文继承“祖业”。陆沅年方14岁的大女儿孟力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一年级，学习成绩优等，数学老师给她打过102的高分。她原指望将来能够做一个工程师，认为“清华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打算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可是，一下子“全家黑了”！1969年学生下乡时，许多同学都到“北大荒”参加军垦劳动，孟力被划为“黑帮子弟”，竟然丧失去北大荒的“资格”，而被派往白城子农村插队。当地靠近祖国北部边疆，当时中苏关系紧张，由于苏联军队入侵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这里已成前线，又是鼠疫重病区。初时孟沅虽也在白城子，但是严禁她们母女见面。5年过后，大部回城，她却走不了。那些人提到孟超、孟沅和丁克被诬陷的“罪状”，对她说：“你的档案就没法看！”推荐上学、招工都没有她的份。1974年夏天，家里设法将她转到山东陵县农村孟沅的表妹家里，又在那里插队两年后，考进水电部第十三局设在山东德州的机械厂当学徒工。直到1976年冬天，孟力和一个要去德州安家的北京人“对调”，方才回到家里，进北京照相机厂做工人。这一下，先前做工程

师的抱负就破灭了。

孟超的身体本就十分羸弱，瘦骨如柴，经此磨难，“像一条野藤般的瘦小身体”很快地垮下去。1969年林彪“一号命令”后，已届67岁高龄的孟超，还被押送到湖北省咸宁县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因他久被“隔离反省”，丧失人身自由，别人都不能同他接触。他在那里孤单独处，劳动繁重，苦不堪言。1970年一度让他回到北京参加“批陈整风”运动，叫他揭发陈伯达。当时凌俊琪正患重病住院，竟不许他到医院探视。后经四女儿孟健出主意，他方得以偷着同患难与共42年的妻子见上最后一面。这次相见，竟成诀别。办完妻子的丧事，他在北京家里呆了一年，又被迫去干校“劳改”。1975年秋天，孟超才又回到北京。这时已被害得家破人亡，只有小女儿孟伟同住照护。这年6月，中央专案组硬将孟超定为“叛徒”，开除党籍。他们强迫他在这个结论上签字，孟超严词拒绝。孟超据实申诉，他们置之不理。从此抑郁成疾，终在1976年5月6日含恨逝世。那时距离“四人帮”垮台只有5个月了，他却在黎明之前含冤而死。贼子未灭，沉冤未雪，使他死不瞑目。

孟超已经含冤死了，那些迫害狂还不放过他，不让他的英灵宁静。为了遮掩或减轻他们所犯的罪行，捏造谣言！说是“他得到了补发工资，心里很高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工友把钱带来给他，这位工友原是他的好朋友，他便买了几样熟菜，招待这工友，可能是兴奋过度，多喝了两杯，第二天便不起了。”孟超的老朋友秦似不信对他的这种诽谤，写信向孟健询问孟超含冤逝世的经过。孟健回信告诉他说：

“这事不知是谁造的，我觉得这个人太可怕了。人都死了，还要给编这样的谎言，为什么这么急于想为‘四人帮’翻案？爸在活着的时候就没有恢复过他的工资。事实上在那个阶段，是他们搞了个所谓的结论，逼他签字。要给他定案。因为不符合事实，而且是明显拼凑的‘证明材料’，爸不肯签字。当时，我们也认为这个字不能签。社里三天两头的把他叫去，拍桌子打板凳的逼他签字，甚至说：就是他不签字，也要这样定，也可以这样定。5月1日、2日爸是在我家过的。他很难过，说过：哪个沟里没有屈死的鬼呀？冤枉呵！心情极坏，痛苦不堪，神思恍惚，老叨念着冤哪！冤枉呵！5月5日社里的老丁同志去看他（老丁是能喝酒的），他们是喝了

酒。爸爸是为了招待老丁喝了一小杯葡萄酒。但爸不是什么高兴的，而是在满肚子的冤枉、屈辱无处诉说又不能诉说的悲痛状况下喝的。事实上最后阶段，爸一直是在这种心境下挣扎着，以至再无力挣扎而死去。”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6月16日，经过子女多次要求、督促，中共人民文学出版社委员会作出《为孟超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决定》写道：

孟超同志，原我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中共党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在阴谋迫害一大批老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同时，对孟超同志罗织罪名，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陷害。那个顾问先是鼓动孟超同志编写《李慧娘》，并亲自修改剧本，赞誉其为昆曲创作方向，继而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江青亲自组织文章对《李慧娘》大加挞伐。文化大革命中，又亲笔诬陷孟超同志“是一个重要叛徒，反革命分子”。1975年6月硬将孟超同志定为叛徒，清除出党。致使孟超同志于1976年5月含冤逝世。

孟超同志早年参加革命，从事进步的文化活动，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为党为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文学事业方面有一定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诬蔑为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将孟超同志定为所谓“叛徒”，纯属“四人帮”及其顾问对孟超同志的政治陷害。现经国家出版局党委批准，报中央组织部备案，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75年6月给孟超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推倒强加给孟超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孟超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原级别待遇，并补开追悼会。

1979年10月12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了孟超同志的追悼会。《李慧娘》也在1980年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印发行（并且收进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中），同时重又在舞台上演出。孟超同志连续遭受迫害十几年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被康生、江青颠倒了的历史又被颠倒过来，孟超的英灵得以安息。这桩艺苑奇冤至此画上了句号。

错误

批判马寅初的

前前后后

●辛平

编者按：错误地批判马寅初先生的控制人口理论，导致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这在今天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平常道理了。我们党我们国家已经接受了马寅初的意见，彻底纠正了这个问题上的错误。错误批判马寅初，也早已成为一段过去的不可挽回的历史了。此文沉痛地严谨地准确地叙述了这段历史，是作者想借此提醒今人后人，牢牢记住这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再不要重复这类问题上的错误。我们发表它，也是这么一点用意。

毛主席在天安门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但由此而引发的一场关于中国人口多少好的争论却延延续续了40多年，至今中国人仍深深感受到由于这场争论造成的余痛。

中华人民共和国像一轮旭日升起在亚洲大陆的东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率领着开国功臣们从容地走上天安门城楼，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人类四分之一”的概念，按当时世界总人口计算，就是近六亿人。六万万中国人民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

本身就显示出他有何等巨大的能量和威力。所以，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湘音，无比自豪、无比自信说：“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

新中国刚刚成立，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解放胜利的狂欢之中，生产和社会秩序从长期战争的混乱状态中逐步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可是，伴随而来的人口生育率提高，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趋势，远远不能适应当时的国力承受力，这不能不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焦虑。1950年，年近古稀的政务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国务委员）邵力子就怀着担忧的心情，发表了他的关于节制生育的主张。他认为，新中国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生产落后，基础薄弱的烂摊子，建国后正有待振兴发展，而人口发展太快，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如不防患于未然，对人口加以控制，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影响民生，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被人们誉为“和平老人”的邵力子是凭着自己多年的从政经验，提出了上述颇有见地的主张。可是，此意一出，却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责和非议。

1953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

这次人口普查引起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注意，他对人口普查的结果表示怀疑。因为这次人口普查是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即将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实际增长率。马寅初认为这种调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据他了解，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率就是千分之三十九，能否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公式就能说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呢？为了证明他的看法，他从7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假设：第一，解放后，人民生活安定，就业率高，结婚人数增加，生育机会多；第二，解放前婴儿死亡率很高，解放后，社会福利和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新生儿存活率大大提高；第三，解放后生活条件改善，鳏寡孤独皆有所善，人均寿命延长；第四，战争消逝，天灾损失降低，社会安定，人民死于非命者少；第五，尼姑还俗，娼妓从良，组成新的家庭，创造生育机会；第六，封建残余观念，如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五世其昌等等，推动着早婚多生；第七，政府对于一胎多婴的家庭，除了奖励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补助，无形中变成多生有奖的政府行为。

马寅初之所以把人口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他发现：“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如果让中国人口像过去和现在这样无限制地发展下去，那么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受到极大阻碍。他在一张纸条上写道：“人口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民族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必须引起重视，早为图之。”为了证实这个结论是对的，马寅初开始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有趣的是，马寅初不仅同第一个提出节育主张的邵力子是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而且还是1882年同年生，又同时先后提出节制人口的主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马寅初和邵力子双双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第一次会议上邵力子发言时提出：“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计划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这个建议虽然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赞扬，但在当时，不少人认为，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正是我们的优势，是战胜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因素。

邵力子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他深信自己提出的节制生育的主张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是切实可行的。但鉴于当时人们的科学知识匮乏，同时又片面认识人口和强大的关系等现实，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之

后，邵力子于同年12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文章。他认为，要计划生育，就必须普及避孕常识，人们一旦掌握了避孕手段，就可以减少盲目生产，减轻妇女的痛苦。故避孕是节育的第一步。

12月27日，刘少奇召集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卫生部、轻工业部、商业部、中宣部、全国妇联的负责同志开了一个节制生育问题的座谈会。会后，刘少奇做了总结发言：“关于节育问题，我们党、我们的卫生机关和宣传机关，是提倡还是反对？有些人是反对的，有的人还写了反对文章。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

1955年2月，中共卫生部党组根据刘少奇的讲话精神，写了一份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份报告。批示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也正是在此时，马寅初经过3年的调查研究发现，我国人口的增长率不是每年增长千分之二十二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千分之三十，这实在是太高了。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马寅初曾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

在这次会上，邵力子也正式提交了一份《请加强避孕常识的宣传和放宽节育技术的限制》的提案。可是提案一出，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温州市政府的一位要人说：“邵某代表哪一界人民的利益？我们人民将要求把他的人大代表资格撤销。”由此可见，推行节育工作将会遇到多么大的阻力。其实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本身还有很大的区别，节制生育只是适当地加以限制，计划生育则是有硬性的指标规定，可就是适当的加以限制，

当时也为一些人无法接受。

1956年1月，第一届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邵力子补充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重申了节育的重大意义。并写信给温州市政府中提出非议的那位领导，请他从国家的前途考虑问题。随后，邵力子取得生理工作者赵以炳等人的科学论证结果，并得到卫生部长李德全等人的支持，于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节育办法和避孕药品。之后，在邵力子的主持下印发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小册子。在这次会议上，马寅初也再次提出了控制人口问题，得到在场科学家们的赞成。

9月，周恩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马寅初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节育问题被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看来可以公开谈论控制人口的问题了。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到，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对马寅初的支持。毛泽东一语双关地笑着说：“邵先生，你们两个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马寅初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互相看了看，也开心地笑起来。

3月，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邵力子就计划生育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强调指出，现代人在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都可以有计划，在生育方面也必须有计划。他针对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规定，提出“不造成以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口流产”，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四条。“男20岁、女18岁，始及结婚”的规定，主张提高结婚年龄，宣传迟婚。他还主张大力向农村推行节育工作，不要对持久性避孕手术进行限制；等等。邵力子的发言，立即得到医学专家钟惠澜的支持。同时也得

到马寅初的大力赞同，但是，马寅初在计划生育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上却与邵力子有一点分歧。他们都主张避孕和推迟婚龄，但马寅初坚决反对人工流产。他认为有比人工流产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最好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解放后第一次作公开的学术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百分之三十，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见到马寅初时，严肃地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马寅初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作了自我批评。后来，他在撰写《新人口论》时，就确实没有再提出上述观点。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从10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邵力子对这篇文章极表赞成。他在发言中说：“在这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一篇《新人口论》，也可以说是人口控制论，他从多方面说明我国控制人口的必要，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邵力子之所以不说完全赞成马寅初的意见，是因为他不能接受马寅初认为的人工流产就是杀生的带有基督精神的观点。

然而，这时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组织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席卷全社会。马寅初当然也被波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在这场扑面而来的急风暴雨之中，马寅初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几个月前计划生育问题刚刚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而现在却又受到人们的批判……

诚然，这些指责并不能代表毛泽东的看法。在9月至10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由毛泽东主持修改并通过的《1956—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中，还明确地规定“除了少数民族地区

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在做会议总结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人口节育，要3年试点宣传，四年普及推广，也是10年计划，不然人口达8亿再搞就晚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推广，山区人口过少也不要推广。也要大鸣大放大争论一下。我主张中学也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这时的毛泽东仍表明他是赞成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的。

但是，实际上毛泽东对于人口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内心却一直是矛盾的。这在毛泽东的批驳艾奇逊的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心迹。

毛泽东批驳艾奇逊说：“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和朱总司令立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院于8月5日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写道：

“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9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批驳了艾奇逊的人口观，他以革命理论家所特有的那种犀利的口吻质问艾奇逊：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

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他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1955年，在毛泽东发动下，中国农村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即合作化运动。他面对这场波澜壮阔的高潮自信而豪迈地说：“合作化以后，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毛泽东还认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是“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因此，他以为当然还要靠增加人口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报告中他又不无矛盾地说：“我国有6亿人口，……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有什么困难呢？3月20日，他在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过这样一番话：“1949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们只有2,200亿斤粮食，去年我们就有3,600多亿斤粮食，增加了1,400多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是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1949年没有粮食，现在还是没有粮食，还是不够。”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人多一些好”的主张。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尽管他谈到了节育问题，但仍念念不忘那个曾经令他极度兴奋过的命题：“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他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再增加几倍，我们也不愁没饭吃。可是，就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1956—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第二十九条又明确规定了节制生育

的政策。很显然，毛泽东的讲话与上述政策发生了冲突，他本人也体会到了这一点。于是，又补充说：“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的。”

莫斯科大会上，毛泽东豪情满怀地说：“如果打原子战争，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

1957年11月2日8时，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登上苏联派来迎接的“图104”客机，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两次都是去苏联），也是最后一次出国。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和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领袖都云集在莫斯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共运中最盛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聚会。毛泽东和他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被当作贵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包括有许多重要内容的讲话，如提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为首，反对赫鲁晓夫把和平过渡写入《莫斯科宣言》，以及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毛泽东在他多次的讲话中，详尽地阐述了他对未来战争和与战争相联的人口问题的看法。

“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还有一半，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就多次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这一思想一直困扰着毛泽东，他甚至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什么要早打呢？他认为我国刚刚从战争走过来，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和一支训练有素、斗志高昂的军队；同时我国底子差，还没有搞什么建设，国民党留下的只是一个烂摊子，再打也还是一个烂摊子，打完了，可以全心全意地去建设。为什么要大打、打核战争呢？因为打仗总是要死人的，牺牲越大换取的果实就越大：“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

毛泽东对党的高级干部曾说过这样的话：“6亿人

口，动不动就毁灭，哪有的事？何必说得这样严重嘛！就是原子弹大战，顶多会毁灭我们一半，我们还有3亿人，怕什么？……过去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打了4年，现在是原子战，可能只要3年，打了再建设，索性把帝国主义搞了再建设也好。”

作为战略家，可以说毛泽东最在行的就是打仗，因此，对于战争他比任何人都敏感，他要求全党全国都纳入他的战争思想的轨道。“人多一些好”的思想也正是基于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考虑。

**“大跃进”开始了，粮食卫星飞上天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

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听赫鲁晓夫说，苏联将在15年后超过美国，毛泽东马上表态：“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苏美两国的人口相差不多，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可能容易接近或赶上或超过。但中国与英国相比，在产品总量方面超过英国并不是难事，问题是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当时英国的人口还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超过英国10倍以上才能真正超过英国。

限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较低，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产品总量有较大的增加，就必须增加劳动总量和提高劳动效率，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要靠人力来实现，要么加大劳动强度，要么增加劳动人口。从近期效益来看，只能选择加大劳动强度，搞群众运动，打人海大战，而要解决长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是要增加劳动人口。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一些好嘛！恐怕将来搞到7亿人口时再说，现在不要怕人多，是地大物博嘛！”但同时他又表示：“我是赞成节育的。”

马寅初和邵力子是否出席了这次最高国务会议，笔者不清楚，但他们对毛泽东多次说到的“赞成节育”的话，是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在2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第一届五次会议上，他们仍然把节制生育问题作为发言的中心议题提了出来。

马寅初在发言中重点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是节制

生育，第二是文化技术下乡。他说：“关于节育，党和政府在过去的一年中，直接地间接地做了不少工作。我所谓直接，是指取消军属多子女补助费一类措施而言。我所谓间接，是指最近热火朝天的兴修农田水利一类措施而言。”

直接者还可以说是措施，间接者根本与措施无关，纯粹是由于将大量的强劳力集中于水利工地，减少了夫妻接触而产生的负效应。

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参与，使节育工作有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城市，晚婚问题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但中国的主要人口在农村，关键的问题还是农民的问题。马寅初对节制生育工作在农村中取得的进展还是持乐观态度的。他认为：“自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之后，在农村中已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已取得了不少收获。……有些社员还建议在农村加强节育的宣传，改进避孕药物的供应工作；并希望医院能想出更简便更经济的避孕方法。”尽管这种情况在当时农村还是极个别的现象，但马寅初由此已看到了节育的光明前途。

在第二个问题中，马寅初通过说明“文化技术下乡”和“帮助农民向大自然进军”的种种好处，以证明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主要是靠提高人口质量和劳动效率而非增加人口。他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作用。他说，知识分子下乡，一方面可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可以将现代科学文化与技术传授给农民。马寅初讲这番话时确实是在响应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下乡的号召，但由于他的思路与毛泽东考虑的不同，因此，他过分强调了知识分子作用的一面。他说：“毛主席曾经说过：‘年老体弱的可以不去农村工厂锻炼’。他大概是指体力劳动而言。而写作（指帮助农民总结经验——撰写者注）是一种脑力劳动，年老体弱的知识分子亦可以做。”他表示：“自己就抱有这样的志愿。”其实，毛泽东所讲的“锻炼”是专指体力劳动而言，而马寅初过分强调了脑力劳动的作用，这本是曲解了毛泽东的本意。果然3个月后，毛泽东就在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讲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3月，毛泽东在成都召开会议，统一全党的思想，将中国引上了“大跃进”的轨道。

在这次会上，他不断地发挥他对人口是多了好还是要少一些好的看法。当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笈谈

到入地矛盾引起吃饭难的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5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7亿5至8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很难叫农民节育……”

4月15日，毛泽东在批示《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时，又进一步发挥他的观点：“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5月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继续发挥他的“人多是好事”的观点：“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个大国，中国人口多，为什么不当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现在是6亿人口，再过十几年是8亿人口，这么多人吃了饭干什么？要干事，无非是工业、农业、文化科学技术这一套，在这些方面赶上一切国家。”

“8亿人口，10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100年后中国占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就会节育了。”

此时，马寅初并不清楚，他的理论已经面临着最高决策层的挑战。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举办六十年校庆的大会上，就指名道姓地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作检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的错误。

7月9日，毛泽东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民主人士，听取他们对“大跃进”的意见。为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而担忧的邵力子，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他抓住时机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泽东支持节育，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在达到8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毛泽东此时正陶醉于各地大放高产卫星的喜悦之中，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英明预见：“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而此时的马寅初面对对他不公正的批判却变得越加冷静。他认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于5月9日和7月24—3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和《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两文；但马寅初也并没有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十全十美，所以，从8月起，他多次走出校门，到外地搞调查，

以求证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一次有位与马寅初非常熟悉的党员学者，听说马老来视察，执意要请马老吃一顿便饭，马寅初应邀而来，没想到这位学者没说几句话，就劝马寅初说：“现在大跃进，粮食吃不完，不是不够吃，您的人口论恐怕要重新考虑考虑。”马寅初当即起身告辞，连筷子都未曾动，其实此人只是为马寅初的处境担忧而说的这番话的，但刚正不阿的马寅初自有他的信念和准则，在没有证实自己的理论有错误时，是决不会因压力而放弃他的观点的。

1959年，马寅初曾对当时对他人口论的论战有过一个小结，并申明自己的做人准则：“去年有二百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生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

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敢言。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来总理对马寅初的处境非常担心，特意约马寅初谈了一次话，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别人劝马寅初，马寅初还可以不放在心上，周总理劝马寅初，马寅初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这次谈话后，马寅初仔细地对《新人口论》进行了梳理，看看是否真有什么错误。但梳理的结果，证明并没有错。他仔细阅读了报刊上发表的批判他的文章，对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一一进行反驳，又写成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文章的后面还有两篇附带声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其二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马寅初将手稿送到《新建设》杂志编辑部，要求尽快发表。

马寅初的倔强是出了名的。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寅

初来到当时的大后方重庆，鉴于他的学识和声望，被聘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因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不满，写了不少揭露四大家族在国难当头下大发国难财的文章。触怒了蒋家王朝。开始是蒋介石派人游说马寅初，企图用封以高官来收买他，但马寅初愤而拒绝。

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而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不敢言。”

《新建设》杂志编辑部收到马寅初的文稿后，不敢擅自作主，将文稿送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阅。当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是康生。

康生是靠整人起家，善搞“莫须有”的老手，有两个人他是绝不放过的：一种是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影响的人；一种是可以为他的政治生涯铺路的人，马寅初当然就属于这后一种人。

自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以来，对人口问题有过多次论述，特别是毛泽东在去年8月讲过“人口的观念要改变”，康生就一直等待机会，当他看到马寅初的文章和附带声明中的：“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就大发其火，决定向马寅初动手了。

10月24日，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部署对马寅初的全面批判。他得意地说：“马寅初送给《新建设》的文章，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的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

他还要《新建设》赶快把这篇文章登出来，一次全文发表，而且要快发表。为了掩盖他的鬼魅之心，他还布置对党外先不要讲“批判”。

11月初的《新建设》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发表编者按。十二月初就组织大批判。康生指使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份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马寅初是一个代表。要花点工夫把他的经济理论看看。不要说他胡说八道，资产阶级学者就是这个水平。”还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要考虑：马寅初还当不当得成北大校长？批判完了要准备换人。可以尽量揭露，不要给他戴错了帽子，但是适当的帽子不可不戴。”

马寅初的文章发表后，报刊上就开始发表批判文章，北大也组织了“批马”座谈会。一天，康生亲临北大座谈会现场，听到发言者都不能击中要害，他越听越觉得有必要“定个调子”加以主导，于是他打断别人的发言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布满了北大校园，连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的批判会连续不断，语言越来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对此，康生还不满意，12月23日，康生以个人名义给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面对来自全国上下的文攻谩骂和政治高压，马寅初胸怀坦荡，无所畏惧。他幽默地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马寅初的幽默毕竟还带着一些苦涩：为什么一个学术问题带来的不是友好的讨论，而是敌意的谩骂。

在马寅初受到批判围攻时，就有人暗示他已不宜再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劝他辞职。马寅初不愿受职务所累，于1960年1月3日到教育部提出口头辞职，翌日，向教育部写了书面辞职报告。很快国务院就批准了马寅初的辞职。随后，又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与此同时，也剥夺了马寅初发表文章的权利。马寅初也由此从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了。

被当作资产阶级学者而遭到批斗的马寅初忧心忡忡地说：“我不讲食物够吃不够吃，我讲的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能不能保证全国人民早些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

正当康生挥舞着权杖向马寅初大举进攻的时候，

中国的某些地区由于“大跃进”的疯狂带来的负作用，出现了粮荒、浮肿病和出外逃荒等等不应有的现象。促使问题向严重方向发展的是，这时的报纸上还是一个劲的宣传“形势大好”，农业到处放“高产卫星”。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的一个决议上就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难道共产主义就是解决一个吃饭问题吗？当时已被当作资产阶级学者而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说：“我不讲食物够吃不够吃，我讲的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能不能保证全国人民早些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

面对天真，马寅初可以装聋做哑；但是面对无知，马寅初就要有所理论。只要还给他说话的权利，他绝不会将这个权利就着米饭吃下去。

六十年代初，由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全国再度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也由于“大跃进”带来的浮夸作风和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使学毛著出现了形式主义和庸俗化的倾向，马寅初对此感到忧虑。在全国政协组织的一次学习小组会上，有位委员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即使在一千年后也是对的。”马寅初听后说：“不能这样说，你这样说不对，不符合马列主义原理；革命实践告诉人们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但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同志，他们的话或著作，特别是关于政策方面的言论，只能管一段时间，一个时期，并不是在百年、千年之后，或永远都是有用的。我相信毛泽东本人如果听了你的发言，也肯定不会赞成！”他忧心忡忡地说，搞个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我们要爱护毛主席！”

“大跃进”虽然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但由于这些严重错误产生的负效应，却为暂时的控制人口出生率提供了一个机遇，尽管这个代价是多么巨大。以1955年到1958年的全国人口平均增长率计算，1959年到1961年人口实增长比前四年少生了4600万人，全国人口总数实际上维持在“大跃进”以前的水平上。

可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由于开始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中国前进的路线又重新拨上正轨，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人口出生率也随之上升了，这个现象再次引起了有识之士们的大声疾呼，要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的一次座谈会上邵力子听了著名妇科专家严仁英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讲话后，不胜感慨地说：“让我讲真心话，假如这几年内少生些孩子，国家的粮食就没有那么多困难了。我建议，医药卫生

生组在宣传计划生育方面应该多做些工作。”

在批判了马寅初和三年大跃进的折腾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提计划生育的问题，此时中国再一次面临着人口与吃饭的矛盾。尽管没有人敢提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但是计划生育问题还是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3年，中共中央又批转了国务院关于中央和地方都要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决定，使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经过6年的挣扎之后正式迈出了第一步。

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对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他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宣传讲解晚婚和计划生育的具体要求。1965年3月，全国政协第四届的一次常委会上，周恩来指示医药卫生组要协助搞好计划生育工作，他对与会的人士讲：“这件事，邵力子有一功。”1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指出：“我们要搞计划生育，来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计划生育是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计划生育，这是个大问题。我们是无产阶级的计划生育，和资产阶级为了个人享乐搞节制生育不同。”

毛泽东重复了马寅初曾经大声疾呼过的“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这句话。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由于全国顿时又陷入无政府状态，刚刚起步的计划生育工作又被停顿了下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有如脱缰的野马，向前狂奔，据统计，从1965年至1973年的9年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除两年略低于两千万外平均每年都要增加两千万人，使总人口数急速地向9亿冲刺。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加上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力的破坏，全国城乡人民又面临着一场生产力的发展不能适应人口增长的矛盾，人口与吃穿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个严峻的形势，不得不又引起中央决策人的重视。1968年，毛泽东就提出过：“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号召，试图通过“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来缓和这个矛盾。而此时的中国，又一次不是按正常的轨道在运行，即使是伟大领袖的号召，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而已。但毛泽东毕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1970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呼吁：七十年代要注意计划生育。同年，他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对卫生部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不

满，批评他们说：“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1971年7月，周恩来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个别特殊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的领导。1972年，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会议。1974年，毛泽东重复了马寅初当年大声疾呼过的那句话：“人口非控制不可”。这句话引起了全党的重视，为脱缰的难以控制的人口膨胀这匹野马戴上了笼头。遗憾的是，这时中国的人口已经突破了9亿大关，如此庞大的基数，为中国控制人口带来了无比艰巨的使命，同时也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埋下了一个时时引发阵痛的隐患。

1965年1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来华访问，毛泽东单独约见了她。在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斯诺问：“主席先生，在中国自己这个联合国里，实际上究竟有多少人？你能根据最近的调查，给我一个人口数字吗？”

毛泽东回答：“我确实不知道，有人说六亿八千万到六亿九千万。对于这个数字我不太相信，中国哪有这么多人？”

可1970年12月，斯诺再次访华，毛泽东在同她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又谈到了人口问题。斯诺说：“人类已经在一些事情上改变了上帝的观点。其中的一件事就是节制生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同5年或者10年以前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变化。”

毛泽东这一次不再回避这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了。他坦率地说：“没有。你受人欺骗了。在乡下，妇女仍然想要男孩。如果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都是女孩，她还想要再生一个。如果生了第三个，还是个女孩，这位母亲还想再生。很快就生了9个。这位母亲已经四十五岁左右了，他最后只好决定就这样算了。这种态度必须改变，但是需要时间。”

自从毛泽东指示“人口非控制不可”之后，中国的人口确实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80年，已降至千分之十一点九二。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过大，这时的人口总数已经接近10亿，中国人口仍以每年新增上千万人的速度递增。假如毛泽东当年支持了马寅初等人的意见，中国人口可能就被控制在7亿多。然而，任何假设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必须面向未来，中国人还将为庞大的人口付出代价。

（责任编辑 方 徨）

『九一八』夜张学良与

胡蝶跳舞纯属谣言

● 荣华 红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明星”影片公司的《自由之花》、《啼笑姻缘》和《落霞孤鹜》三个剧组正分赴北平拍摄外景。三部影片中的女主角不仅均由胡蝶一人同时担任，而且在《啼笑姻缘》影片中，名门闺秀何丽娜与唱大鼓的卖艺姑娘沈凤喜还要由胡蝶一人兼演两个角色。

在同一时期，由同一个演员在题材各不相同的三部影片中，饰演四个身份各不相同的角色，其难度可想而知。其时，胡蝶的声誉正如日升中天，光芒四射；面对难题，她胸有成竹，游刃有余。正如《啼笑姻缘》的作者张恨水所称道的那样，他评论胡蝶是：“为人落落大方，性格深沉、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梦》人物相比拟，十分之五六若宝钗，十分之二三若袭人，十分之一二若晴雯。”如此的推崇，胡蝶应受之无愧。

然而，好事多磨，乐极生悲！

正当胡蝶在两个月内，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分别在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以及颐和园、八大处拍完了三部影片的外景镜头，怀着喜悦的心情凯旋返沪时，不料上海《时事新报》1931年11月20日刊出了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根据传闻写出的两首政治讽刺诗——《哀沈阳二首（仿李义山北齐体）》：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15分，日本关东军制造事端，借口南满铁路被炸，起而护路，侵入中国守军驻地北大营，进而侵占沈阳以及东北三省全境。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之际，身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因为早先接到蒋介石“不许抵抗”的密令，他只好按兵不动。日寇不费吹灰之力席卷东北，举国哗然，异口同声责难张学良“丧师失地”、“风流误国”。日寇为了转移视线，浑水摸鱼，又指使特务机关故意放风，讹传“九一八”之夜，张学良正和胡蝶在北平六国饭店酣舞情浓并馈赠胡蝶十万之酬金的谣言，更在日方主办的报纸上，以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手法，将张学良、胡蝶二人的照片合印在一起，作为佐证。上述两首政治讽刺诗，就是根据这种传闻写出来的。

政治讽刺诗见诸报刊以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大骂张学良“不爱江山爱美人”，大骂胡蝶“商女不知亡国恨”、甚至还波及到胡

蝶和林雪怀这对已订婚的夫妻感情产生裂痕，酿成婚变。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实际上，“九一八”之夜，胡蝶所在的外景队乘坐的火车还滞留在天津，根本不可能和张学良见面，更遑论婆婆共舞？再说，在北平期间，外景队订有严密的纪律，任何人均不得外宿，胡蝶又岂能彻夜不归？为此，“明星”公司的导演及演职员们——张石川、洪深、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人，不仅在报端刊登启事，为胡蝶洗冤作证，而且还在《申报》上刊登了以胡蝶个人的名义发表的义正词严的长篇辟谣启事：

“……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谈，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辩。及日更有某国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诬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某国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惟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不食者矣。呜呼！某国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而欲造谣生事……。”

辟谣启事中说“某国”系暗指日本，公开揭露了侵略者造谣生事所包藏的罪恶祸心！

这段公案的目的，固然首当其冲的是造谣诬蔑张学良，但是，“红粉祸水”、“莫须有”的罪名却使胡蝶银海沉冤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其实，胡蝶不但未和张学良跳过舞，而且也从未和他见过面。1933年3月，张学良宣告下野在上海小住时，曾经亲口对朋友说过：

“胡蝶究竟是怎样的人物，连得在银幕上的影子我也没见过。”

当朋友建议介绍他和胡蝶面晤时，张学良却摆摆手说道：

“算了，我倒不要紧，不要再害别人了。”

1964年6月，当胡蝶赴台湾出席第11届亚洲影展时，也曾有记者问她“要不要会见张学良”。胡蝶回答说：

“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过去这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现在相识，岂不又给骚人墨客以题目？”

1985年，胡蝶在其撰写的回忆录中，又再次重申：

“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素未谋面，以后也从没见过面，真可谓素昧平生。”

然而，当事人本身的辩辞总令人扑朔迷离。最有说服力的辩辞还有待于张学良的司机。1978年，这位年已78岁高龄的司机

老人车宝书，才向新闻界披露出“九一八”事变之夕的事实真相，确证并无张学良、胡蝶在六国饭店婆婆共舞之事。至此，为时近半个世纪的银海沉冤，方得以彻底昭雪。

原来，9月18日晚，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在北平中和戏院主演其精彩剧目《宇宙锋》。当地达官显贵、绅商名流，争相观赏，盛极一时。当晚，张学良偕同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也驱车来到中和戏院观剧。演出中间，张学良的随从副官夏宝珠急匆匆地来到张学良的座位旁，低声报告沈阳有紧急长途电话，务必请副总司令亲自去接。张学良当即离开戏院，驱车快速返回协和医院，接听了沈阳军方报告日军是夜炮轰北大营的电话。嗣后，张学良便一直忙於和沈阳前线方面以及南京政府方面不停地通电话，并又在协和医院临时会议厅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研究对策。

於此可见，“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彻夜未眠，忙於处理军国大事，又何暇、更有何闲情逸致与胡蝶在六国饭店婆婆共舞？难怪胡蝶每每申言：“这是我生命史上最感到悲愤的一页！”若干年后，她在回忆录中仍然再度重申：“谣言止于智者，当时除那那则启事外，我感到没有必要作更多的解释，……该结束了吧？这段‘莫须有’的公案。”

关于蒋光慈被开除党籍的 一些内情

●张振明

近几年来，有些报刊对我国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作家蒋光慈被开除党籍一事，不断提出一些看法。有的认为，蒋光慈是因为“对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作法不满和抵制，被开除党籍的”，“是立三路线继续的一个表现”，“完全是左倾路线的产物”，提出要“澄清是非”。

关于蒋光慈被开除党籍一事，粉碎“四人帮”后，1982年，中央有关部门曾应有关人员的申请，进行过调查了解，找到了当时处理蒋光慈党籍问题的当事人，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主要事实经过和情况是这样的：

蒋光慈被开除党籍，发生在立三路线前的1929年上半年，是当时上海文化支部处理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许多党组织被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逮捕屠杀。也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分子，被反革命的屠杀所吓倒，动摇，叛变，离开革命队伍而去。在革命处于低潮的这种情况下，当时党组织的任务，就是组织广大党员和群众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进行反击和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既要保存革命的力量，又要进行必要的斗争。这时期，蒋光慈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即文化支部的领导下，在太阳社，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但他思想消沉，不参加党的会议，不过党的生活，不接受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不缴纳党费，连他的住址也不告诉党组织，组织上有事找他都找不到。他写了一篇小说叫《丽莎的哀怨》，描写一个白俄妓女流落上海的遭遇，寄予同情。不少同志认为他文艺倾向有问题，党组织找他谈过话，他很不满意。1929年，未经党组织允许自行脱党去日本。蒋还写了一个脱党声明。在这种情况下，经文化支部党支部书记李初梨同志请示闸北区委、中央文委和中央宣传部批准，开除了他的党籍。因当时他在日本，党组织无法找到他，无法将这个决定通知他本

人。1930年3月，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刊登了蒋的脱党声明和党组织开除他党籍的决定。

这就是蒋光慈被开除党籍的大体经过。从这些情况看，开除蒋光慈党籍，是在立三路线（立三路线统治时期是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之前发生的，与立三路线无关。退一步说，假如像现在有些报刊上所说的那样，蒋光慈对当时党内有些左的做法不满，那也绝不能用脱党的办法去抵制，去解决，而只能通过正确的党内斗争去解决。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党。对党的某个组织或个人，有意见，当然可以批评，甚至斗争，但是，不能允许因为对党的某个组织或个人有意见，就可以不参加党的生活，就可以自行脱党。如果肯定蒋光慈自行脱党是正确的，并且现在还要为他恢复党籍，那末，我们共产党还要不要组织纪律？！还是什么具有严密组织纪律的战斗集体？！

根据以上情况，中央有关部门复查认为，按党中央关于党籍问题的处理规定，蒋光慈的党籍问题不能恢复。

当然，说蒋光慈的党籍问题不能恢复，并不否认蒋在我国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蒋是五四运动后我国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是把马列主义旗帜插到文艺园地的旗手，他在创作实践上为左翼文艺运动奠定了若干基础，为革命文艺带来了一些新鲜题材和新鲜人物，为革命文学争取了许多读者，扩大了政治影响。即使被开除党籍以后，他在筹备成立左联过程中，在左翼文化工作中，仍然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不能因为他在革命文艺工作中的成绩而掩盖和宽解他的这个问题，也不能因为他的这个问题而否定他的成绩，这恐怕应是对蒋光慈的正确看法吧。

袁世凯的 长子袁克定其人 其事

●王雷

引子

公元1916年6月5日(旧历五月初五),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北京中南海居仁堂。窃国大盗袁世凯由于搞帝制活动遭到国人普遍反对,四面楚歌、众叛亲离,原先所患的膀胱结石症一下子转成了尿毒症,已经卧床不起,俨然不久于人世了。

法国医生贝熙叶刚刚给他打了一针强心针,袁世凯苏醒过来,对站在病榻旁的长子袁克定说:“克定,去请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他们四人来,我有话对他们讲。”

很快,客人到齐了。

袁世凯费力地转动着短粗的脖子,看到刚刚进门的徐世昌,勉强说道:“菊人(徐世昌的字)来得正好,我已经是中不用的人了。”徐世昌急忙安慰了他几句,接着说:“总统有话,早点安排出来也好。”“约——法。”袁世凯嘴唇动了一动,只吐出这两个字来。“是‘金匱石屋’?”袁克定在旁急急追问。袁世凯把头微微动了动。袁克定急忙叫贝熙叶再给袁世凯注射一针强心针,“他害了我!”袁世凯说出这句话,就昏迷过去,直到第二日(6月6日)清晨,怀着一腔羞恨撒手尘寰。

“他”是谁呢?有人猜测“他”即是指袁克定。这位袁大公子对于袁世凯帝制活动不遗余力地四出奔走和推波助澜,加速了袁世凯政治的失败和生命的完结。

所谓“金匱石屋”,是袁世凯密写的遗嘱,他将段祺瑞、冯国璋与自己的儿子袁克定一同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但是袁克定此时还不知道,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

帝制活动失败后,已预感到前景不妙,怕留下千古骂名,已将“金匱石屋”中“袁克定”三字勾去了。

随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失败以及袁世凯本人的死亡,袁克定朝思暮想的皇太子梦也一去不复返了。

(一)贵公子的生平、嗜好

窃国大盗袁世凯随着在政治上的不断发迹,在私生活方面也越来越奢侈腐化。他共有一妻九妾。妻妾们共计给他生了三十二位子女,而妻子于氏只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嫡长子袁克定。

公元1878年12月(旧历腊月十七),在河南省项城县袁家宅第里,降生了一个男婴。婴儿额头上带有一块明显的青记。初为人父的袁世凯听见自己喜得贵子的消息,自然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注视着婴儿额上的青记说:“孩子小名就叫记光吧。”“不,还是叫小记儿好些。”妻子于氏笑着反驳。

这位叫做记光或者小记儿的男孩,就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袁世凯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小孩子日后的政治野心丝毫不亚于他本人。

由于是嫡长子,袁世凯便将袁克定从小带在身边。无论是他在朝鲜任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一职期间,还是在济南任山东巡抚,以及在天津任直隶总督,及至后来在北京任军机大臣,袁克定始终都跟着他。

袁世凯很喜欢这个长子,为他聘请过专门的德语教师。故而,袁克定当时尽管年纪很轻,却熟读德文,英

文也相当不错。

袁克定在三十岁的时候，做过清朝官吏（农工商部右丞）。在这之前，他在社交界出现时基本上是个贵公子。袁世凯在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期间，袁克定更是太岁作风，在天津一带无人敢惹，并因此与天津城另一个太岁大城李（太监李莲英的侄子李福）小有磨擦。而且险些给政治野心很大的袁世凯带来祸患。

一天，袁克定和李福各带一帮小厮去下天仙戏院看戏，为一点小事，双方小厮发生争吵，并且仗着主人的权势，彼此互不相让，以致大打出手。此事惊动了袁世凯，他深怕得罪李莲英，派人将李福请到家中，好言抚慰，又给李莲英亲自写信，百般解释，以求得谅解。最后，袁世凯又让李福与袁克定结拜为把兄弟。这可谓“不打不成交”了。袁世凯为人处事的投机、圆滑由此可见一斑。

清王朝的淫威给袁克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随着袁世凯政治上的崛起，早年的这段经历使袁克定渐渐萌生出政治幻想和野心。

由于从小就跟随在袁世凯身边，袁克定年纪轻轻，对于官场中事就了如指掌，耳濡目染了相当多的官场习气和派头。有这样一件事：1913年过年时，冯国璋拉段祺瑞到总统府给袁世凯拜年，行的是跪拜大礼，袁世凯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可是，当他们同去万字廊，给袁克定拜年，仍行跪拜大礼时，袁克定却端坐不起，其骄矜倨傲之色溢于言表。

由于是大家族中的长子，袁克定在家人面前竭力要做出一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榜样来，他不吸烟，不喝酒，不近女色，不信宗教，一举一动，颇合旧时代的规矩。尽管他表面上自奉很严，但在私生活方面也不是没有嗜好的。

一是听京剧。这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他和很多梨园艺人都有交谊，如余叔岩、姜妙香、尚小云等。据说余叔岩这个艺名还是袁克定给起的。在这些人当中，袁克定最欣赏的是尚小云。尚小云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并称京剧四大名旦。尚小云每次演出，必为袁克定在剧场留一个包厢，而袁克定逢尚小云演出时，尽管事务繁忙，也要抽空去捧场，几乎场场必到。

袁克定再一个癖好就是同性恋。

袁克定除了在中南海有一套住房外，还在万字廊边有一座小院，以及北海团城、锡拉胡同、小汤山、西山等地拥有自己的私邸。之所以有这么多处，也是为了私生活不受打搅。在他的私邸中，也总有那么一些儒雅

俊逸的小书童或唱戏的男旦服侍他。

同性恋，古称“断袖”。和袁克定有表兄弟之亲的现代著名画家、金石家、藏书家张伯驹曾回忆过一桩往事：

“克定有断袖癖，左右侍童，皆韶龄姣好。辛亥，先父在彰德总办后路粮台，居室与克定室隔壁。一日夜，有童向克定撒娇，克定曰：‘勿高声，隔壁五大人听见不好’……但先父已闻之矣。”张伯驹为此戏题一绝：

断袖分桃事果真，后庭花唱隔江春。

撒娇慎勿高声语，隔壁须防五大人。

袁克定身上的贵公子脾性，直到袁世凯死后多年，一直不改。

解放前夕，他在生活上已经相当潦倒。主要是因为挥霍无度，又无固定收入。

另外也是因为身边蓄养的男僮仆役连偷带摸，使他损失了不少金钱财宝。他所住的清华轩里，原先值钱的字画古玩陆续被送进了当铺，只剩了一个空架子，连房租也日渐筹措不上了。只有一个忠心耿耿的老仆人，到街上给他捡白菜帮子，蒸窝头给他吃。开餐时，他必正坐，胸戴餐巾，用刀叉将窝头切成片，佐以咸菜入餐。

解放以后，袁克定靠从人民政府领取救济为生。

袁克定死于1958年，终年80岁。

（二）出使德国，小试锋芒

袁克定受其父袁世凯的熏染，很早就介入国家政治生活。辛亥革命中，他与其父袁世凯一起，导演过一出绝妙的政治双簧。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袁克定受袁世凯派遣，奔赴武汉前线，就在这时，父子演出了一场双簧戏：一方面，袁世凯命令冯国璋进军武汉，做出一鼓作气，剿杀革命的姿态；另一方面，袁克定又密令朱芾煌去武昌与黎元洪接洽和谈。当时武汉前线两军对峙，冯国璋蒙在鼓里，贪功冒进，并逮捕了朱芾煌。袁克定致电给冯国璋，声称“朱即是我，我即是朱。若对朱加以危害，愿来汉与之拚命。”

由于父子这出双簧戏演得很成功，不久，清廷便明令授权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

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就在黎元洪入京赴任的那一天，袁世凯召袁克定速回京师。不料想，克定在骑马赶往彰德火车站的路上，从马上坠下，腿部骨折，又由于误信巫医，延误治疗，以致造成终身残疾。

1913年，袁克定赴德医治腿疾。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袁世凯交给他一项政治使命：了解德国对华外交立场，促成帝制早日实现。

由于袁克定身负这样的政治使命，故而袁世凯非常重视袁克定的德国之行。他派去火车站为袁克定送行的人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北洋派重要人物如段芝贵（北京警察总监）、江朝宗（北京九门提督）等等。欢送仪仗和仪式均采用总统仪仗执事，近于对待国家元首的礼节。相当威严、相当隆重。

袁克定抵达柏林后，谒见德皇威廉二世，将袁世凯的亲笔信函转呈给他。德皇亲自设宴款待他，并与他密谈多时。袁克定向德皇力陈中国非君主立宪不能图强，深得威廉二世同情与赞赏。威廉二世又把从前摄政王载沣来访时，对载沣说过的关于“强干弱枝”的理论又向袁克定重述一遍。最后，威廉二世将一封亲笔信交给袁克定，请他转交其父袁世凯。“请转告袁大总统阁下，我国将在外交方面全力支持他。”

袁克定回国以后，将威廉二世的态度告知袁世凯。“干得好！”袁世凯拍着克定的肩膀不禁欣喜若狂。

由于复辟帝制活动得到德国这个新起的欧洲强国的支持，袁世凯父子俱受鼓舞。

接下来，袁克定向袁世凯提出两条建议：（一）迎接王士珍来京，代替段祺瑞主持军事；（二）在总统府内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由总统亲自掌握。这两项建议与袁世凯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很快就得到采纳。

袁克定为何如此热衷于他并不了解的军事呢？尽管他是袁世凯的长子，但他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力，他在军队中占不到一席之地，这必将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因此，袁克定迫切地要求跻身军界。

袁世凯于是下令撤销总统府军事处，于1914年5月8日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包括段祺瑞、刘冠雄、陈宦、萨镇冰、王士珍和蔡锷。这一重要机构的设置，很明显地是削弱了段祺瑞作为陆军总长的军权——因为自“二次革命”之后，陆军总长段祺瑞手中的兵权足以使袁世凯感到惴惴不安。

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设立以后，袁世凯便以北洋军暮气沉沉，毫无生气为由，下令于1914年10月

在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下面另外编练模范师，委任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为筹备员。这样，在北洋军重要军事机构中，开始出现了袁克定的名字。

1914年10月，首先成立“模范团”，按照袁氏父子的想法，希望团长一职由袁克定来担任。

袁世凯为这件事专门去征求段祺瑞的意见。段祺瑞对于这位袁大公子素无好感，所以就硬梆梆地顶了一句：“我看他不行吧。”语气中透出军人特有的强硬。袁世凯为了不过分表现出自己的专制，兜着圈子，又与段祺瑞谈了小半天，然而段祺瑞就是不肯让步。也许他对于1913年春节他与冯国璋一同给袁大公子拜年受到的冷遇还记忆犹新吧。

“那么你看我行不行呢？”袁世凯有点儿气急败坏了，嗓门提高了。段祺瑞没有想到堂堂的大总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时竟无言以对。于是，袁世凯硬着头皮担任了第一期模范团团团长。到第二期时，他便以自己公事繁忙、精力不够为由，让袁克定接替了他。

（三）争储心切，欺父误国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华势力骤然上升。它以对德宣战为借口，不顾中国的中立国地位，出兵占领青岛——德“租借地”，进而占领胶济铁路，控制胶东半岛。

日本的军事行动，使袁世凯外交重心由英、美转向德、日。他的帝制活动势必要首先在外交方面得到日本的承认与支持。

日本方面对于袁世凯称帝野心早已洞若观火。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受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之命，至怀仁堂晋见袁世凯，面呈“二十一条”的文本。“二十一条”内容主要如下：（一）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境内的一切特权；（二）承认日本在满洲的优越地位；（三）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附近矿山不准其他公司开采；（四）中国所有沿海岛屿港湾概不得租借或转让他国；（五）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并由日中合办警政和兵工厂。

“二十一条”是灭亡中国的条件。待日置益陈述完毕，袁世凯的表情越发凝重起来。他冷冷地说：“本件应与外交总长会商。”

日置益刚走，袁世凯便大声命令在场的总统府内

史夏寿田：“你立刻把关于帝制的所有事情给我停下来！”

帝制活动暂时搁浅，急坏了大公子袁克定。殊不知，他早已将“大皇子印”的金印私刻好，正梦想有朝一日登上太子的宝座呢。

为了争当皇储，袁克定不惜大搞冒险活动，他的目光很自然地转向了舆论界。

当时，北京有一份报纸叫《顺天时报》，它初名《燕京时报》，1901年创刊，是日本外务省在京出版的汉文报纸，它是日本政府在华的主要舆论工具，因而《顺天时报》的言论极为重要地反映着日本政府的立场。

袁世凯平时只要有时间，总要浏览这份报纸。

袁克定于是集合了一班笔杆子，每天编造一份假《顺天时报》供袁世凯阅览。真版《顺天时报》则由他们严密控制不准流入中南海。袁世凯一直受着蒙蔽，一直以为日本政府很支持他称帝，根本不知道日本政府的态度已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一天，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的一个小丫头离开中南海去探望父亲，转天，用整张的真版《顺天时报》包了一包五香酥蚕豆给袁三小姐。袁三小姐立刻留意到这张《顺天时报》的论调与平时所看的《顺天时报》的论调极为不同。于是她找来与真版《顺天时报》同一天出版的那期假版《顺天时报》，发现了问题，报告给袁世凯。

第二天早晨，袁世凯派人去叫袁克定，在事实面前，袁克定不得不承认自己一直在制造假版《顺天时报》。袁世凯气愤已极，举起皮鞭，照准袁克定没头没脑地就是一顿狠抽，边打边骂：“孽子，欺父误国！”

袁克定政治冒险受到挫折，但他还不甘心失败，他还要动用其他舆论工具。

1915年7月，担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古德诺博士访华，并于8月20日在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了其著名论文《共和与君主论》，继续重申他关于中国民智低下，只宜行君主立宪而不宜行共和的论点。古德诺访华期间是袁克定负责接待的，古德诺的论点极大地鼓舞了政治冒险受挫的袁克定。

袁克定的谋友杨度，借机推波助澜，向袁世凯进呈《君主救国论》，作为复辟帝制的理论张本。深得袁世凯的欢心。袁克定也基本上控制了当时舆论界的主流。

1915年8月，由杨度牵头，联络刘师培、严复等人，成立筹安会，这是在袁克定的直接授意下成立的。标志

着袁世凯帝制活动进入公开化阶段，并成为继之而起的全国请愿丑剧的先声。

就在筹安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帝制，袁氏父子美梦正酣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师、著名学者严修忽然从天津来到了北京，求见袁世凯。严修说古论今，劝说袁世凯不要容忍筹安会继续胡闹，并说为国家计、为袁氏计，袁世凯都不应违背历史潮流，搞帝制活动。

袁世凯心有所动，于1915年9月6日，派亲家杨士琦到参政院，宣读了大总统就时局对全国的宣言，表示“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宜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障碍，本大总统有保全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

这个宣言对于刚刚成立的筹安会和各省请愿运动，无异于一瓢冷水，袁克定闻言不禁大怒。他马上召集帝制中坚人物，在他的北海离宫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在会上，袁克定痛骂严修，扬言：“改行帝制是改定了，现在已是四海皆知，怎么能出尔反尔？那样结果岂不更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谁要是能担保取消帝制袁氏家族永远没有危险，则姓袁的不做此皇帝！试问谁能担保？”

说着话，举起手中的拐杖，恶狠狠地将窗户上的玻璃悉数捅得粉碎；又抄起大瓷瓶，将穿衣镜打得粉碎，算是表明了他改行帝制的决心。

（四）储位未稳，同室操戈

袁克定有个二弟，叫袁克文，是袁世凯三姨太太金氏所生，天性风流、才华卓具。写诗、作赋、填词样样都很精通，是旧时代一个十足浪漫才子型的人物。与张伯驹、张学良和溥桐并称民国四大公子。

袁世凯很喜欢他。

袁克定在骑马摔伤致残之后，袁世凯说他“六根不全”，不是君临天下的材料，他的目光渐渐转向二子克文。

他为众位皇子定做了华贵高雅的“皇子服”，但给二子克文和五子克权定做的皇子服与其他各位儿子的皇子服是不同的。区别在：其他人衣服胸前的图案是牡丹花，唯独二皇子克文与五皇子克权胸前的图案是麦穗。而袁克定胸前的图案也是麦穗形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问袁克定。“也许是二弟和五弟模仿我的衣服的式样偷偷到瑞蚨祥定做的吧。”轻描淡写的解释掩

饰不了袁克定内心的惊慌不安。

“您可还记得唐王朝初年李世民喋血宫门的故事？”袁克定手下的一个幕僚趋身近前，语气中带着说不出的阴森森的寒意。“我懂了。”袁克定摆摆手，让幕僚们都退下。

不久，在北海团城，袁克定设下西餐午宴款待他的二弟、三弟、四弟、五弟、六弟和七弟。袁克文身边其时也不乏智友谋士，他们用三国时期曹丕、曹植兄弟“煮豆燃豆其”的故事告诫克文要提防自己的兄长袁克定。

午宴上，袁克定满面含笑向他的弟弟们劝酒，但克文却推说头痛滴酒未沾。袁克定脸色显得很不自在，他说：“那就随使用餐吧，大家不要客气。”袁克文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把银制刀匙，一试，发现银匙已然变黑。他气愤地站了起来，一甩袖子含怒而去。其他兄弟也猜测到个中原因，便纷纷告辞。于是，一场西餐午宴不欢而散。

袁克定随后扬言说：“如果大爷（指袁世凯）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

袁克文闻言，心中恐惧已极。他本是一个文人，对于做官以至当太子都了无兴趣。他做了一首《感怀》诗，以排遣胸中苦闷：

乍著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塞雁掩孤月，西去骄风动几城。
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吹梦欲三更。
绝临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这首诗明显含有讽刺袁世凯称帝的意味。袁克定将此诗内容密报袁世凯。袁世凯尽管素来疼爱他的次子，但为了严肃家规，下令将袁克文软禁于中南海，不准他再与任何文人名士往来，并禁止他出入宫廷。袁克文从此被囚于中南海，每日只有宠妾小桃红陪伴。靠摩挲宋版古籍，玩赏尊彝金石打发时光。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袁克文才重新获得自由。

克定、克文堪比三国时的曹丕、曹植乎？当时不仅在社会上，就是在袁氏家族内部，都作如是观。所幸随着帝制活动的风消云散，古代的悲剧才没有完全在袁克定兄弟身上重演。

（五）与杨度及汪精卫的交往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杨度和汪精卫都是颇有名气

的人物。袁克定与他们都有相当的交往。

杨度在民国初年是社会上颇负盛名的才子。他是袁克定为帝制活动四出奔走的过程中，结交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盟友。

杨度主张君主立宪可谓由来已久。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因欣赏其才华，曾几次邀他加入，但都被他拒绝。他对中山先生讲：“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是，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杨度在清朝时期，始终没有得到飞黄腾达的机遇。民国成立以后，他从袁世凯身上嗅到了帝王气息，于是，千方百计地巴结逢迎袁克定，他称袁克定是当代秦王李世民，言下之意，他自己就好比是唐代名相房玄龄、杜如晦了。

对于这位久负盛名的才子，袁克定自然也十分器重，及时地将他收在麾下。

杨度与袁氏父子的交往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1年辛亥首义，清政府为挽救残局，下诏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不肯接受。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于是想到当时内阁统计局局长杨度与袁有私交，便请杨度与徐世昌同去彰德，请袁改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5日，袁正式组阁，将杨度作为学部副大臣列在他组阁名单中。

日后，杨度在帝制活动中，为袁世凯父子呕心沥血，效尽了犬马之劳。

1914年7月，袁克定由京畿拱卫军的三个分队随同担任警卫，以养病为名移居汤山。从此，汤山便成为洪宪帝制的一个重要策源地。杨度也随从移居，与袁克定过往无间。1915年1月，袁克定约请著名学者、政治理论家梁启超至汤山赴宴，席间婉转地屡次暗示帝制问题，但梁启超坚持己见，不予赞成。席间只有杨度一人作陪，可见杨度在袁大公子心中的受信任程度。

1915年4月，杨度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撰写了2万余字的《君宪救国论》，呈递袁世凯，袁世凯极为赏识，于5月底特颁亲笔题写“旷代逸才”的四字匾额一方赐杨。

8月14日，又是由杨度牵头，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组织“筹安会”，杨度自任理事长，进一步为《君主立宪》摇旗呐喊。

为了早日确定皇位，免致夜长梦多，袁克定和杨度等人极力劝袁世凯先举行内部登极仪式，然后择吉日

召宴外国使臣，据说这样“既可省国帑，对外又冠冕堂皇”。袁克定与杨度等人几乎每天都围绕在袁世凯身旁进行撺掇，并把一切有关节目准备就绪，只待袁世凯一旦亲口答应，就可立即登极。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国人唾骂声中病逝于中南海。杨度赴居仁堂吊唁，曾献上一幅挽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明公”即京剧《捉放曹》中陈宫对曹操的称呼，杨本人是戏迷，故而用戏中人的故事作为自己倡君宪、搞帝制失败的“自辩状”。

袁克定与汪精卫也有一段很深的交往。

1910年3月，在中国社会革命风起云涌、清王朝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同盟会会员汪精卫、黄复生谋刺摄政王载沣。31日，事败被捕入狱。

汪精卫是同盟会评议员，又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在南方革命党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况且被谋杀的对象又是摄政王载沣，故而此事在社会上极为轰动。舆论普遍同情汪、黄二人。这时候，袁大公子也极力从中斡旋，使汪精卫由死刑得以减刑，并获无罪开释。

辛亥革命开始后，清廷明令授权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1911年11月，袁世凯北上入京。袁世凯为了收买人心，极力做出一副同情革命的姿态。入京不久，袁世凯即经梁士诒、杨度的介绍，接见了刚从刑部释放出来的汪精卫。由于汪精卫的减刑与获释过程中，袁克定都出力不小，所以，袁世凯就让袁克定与汪精卫互换帖子，结拜为把兄弟。

以后，袁世凯又让袁克定全权代表自己，与南方革命政府代表汪精卫商谈南北议和的有关事宜。在会谈中，袁克定正式向汪精卫提出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

- 一、推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
- 二、实行南北统一；
- 三、袁世凯对蒙藏地区沿袭皇帝名义。

汪精卫对此绝无半点异议，他就此致电黄兴，征询意见。黄兴回电明确表示：“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乎项城无疑。”袁世凯顺利地就任了中华民国大总统。

抗战爆发后，汪精卫投降日本，沦为中国第一大汉奸，由于与袁克定曾有旧谊，并且袁克定在袁世凯去世之后在社会上还保持着相当的威望，汪精卫就想拉袁克定一起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但被袁克定称病婉言拒绝。

（六）拒任伪职，保全晚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欲吞并中华。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高级成员中，像贵族院议员、陆军中将阪西利八郎、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兼东京警察总监土肥原贤二、日本驻济南派遣军司令官喜多诚一、保定特务机关长铃木繁二郎等，在袁世凯在世时即与中国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有些人公开身份是袁大总统的顾问官，实则是日本派往中国的政治间谍等等。他们过去与袁克定都有所交往。此时就想让袁克定出任华北伪政权要职，借以网罗袁世凯的北洋旧部，但袁克定年已花甲，他以自己年老多病为借口，始终拒绝“出山”不与日伪合作。

1936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亲日汉奸王揖唐联络一批人，在《庸报》上刊登声明，鼓吹“华北自治”，为日本人在华北的势力渗透大造舆论。由于王揖唐在民国时期曾追随过袁世凯，与袁克定也有数面之缘，故而在声明的署名中玩了一个花招，将领衔的人名写成“袁克定”。

事隔两天，袁克定看到《庸报》上的这个声明，马上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启事，郑重声明与此事无关。此言一出，舆论大哗。不独王揖唐等汉奸颜面下不来，就是日本人也感到万分嫉恨、恼火。其实，经历了那么多的世事沧桑，袁克定早已看破红尘，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了。

这时候，汪精卫出面了，一方面劝日本人给袁克定一些活动自由；另一方面，又托人带上礼品和一笔款子去游说袁克定。但袁克定只收下了礼品，表示不忘他们的私谊，钱则分文不取，如数奉还，显示了袁大公子做为中国人的气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袁克定住在颐和园，每日以书画自娱。一次傅作义将军游览颐和园，经人介绍，与袁相识。傅作义将军便谈起八年沦陷时期，袁克定不受威胁利诱，不降日伪，拒任伪职的旧事，语气中含着高度赞扬。

袁克定手捻胡须，微微地笑了，他为自己在日伪统治时期没有丧失晚节，也感到欣慰。

●马克锋

四大家族

及其子女的现状



■西安事变时期的蒋介石、宋美龄和孔祥熙

黄花亦灿烂，毕竟花落去……

曾经在中国大陆辉煌一时的四大家族，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一个个携妻带子，举家逃往海外，或孤守台湾，或流亡美国……，一个时代结束了。

随着四大家族的掌门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的相继谢世，这几个显赫世家已开始树倒猢猻散，画上了一个历史的休止符。

如今，四大家族的第一代，依然健在的，就仅仅剩下百岁老太婆宋美龄和九十老翁陈立夫了；第二代人物除蒋经国随父而去外，其余的也大半已步入风烛残年之地；第三代人物中，蒋家的孝文、孝武兄弟先后去

世，更加重了家族败落、江河日下的苍凉气氛。

蒋家在老头子蒋介石和大公子蒋经国死后，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蒋家一统台湾天下的局面。

1991年9月21日清晨，台北松山军用机场，九十多岁的宋美龄女士，在孔二小姐的搀扶下，缓缓登上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面对送行的国民党中央主席、“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院长郝柏村等高官显贵，泪别宝岛，悄然离台，到异国异乡孤独晚年。至此，“我将再起”的豪言壮语变成了孤寂凄清的情怀。如今，98岁高龄的宋美龄居住在美国纽约长岛的蝗虫谷高级寓所。这是50年代她和孔祥熙合买的，现在她和

孔祥熙的儿女们共同住在一起。孔二小姐未病前，宋美龄的起居住行都由她主管，现在，这一任务则留给孔家的孙子们了。

目前，宋美龄除了看病养生之外，唯一的消遣就是阅读书报、听听秘书和台湾来人关于台湾政治情况的汇报。不久前，蒋纬国到纽约探望宋美龄，曾向新闻界透露，宋美龄的身体“上上下下”都很健康。

1990年，在台湾第八届“总统”选举中志在一搏的蒋纬国，迫于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在中途仓皇收场。至此，他的政治生命算是划上了句号。如今，年届八十的蒋纬国，对于追求了一生的政治已经心灰意冷，别无所求。在有生之年，蒋纬国希望了却平生两大心愿：一是抛弃难言之隐，彻底揭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二是盼望中国能够早日和平统一，回大陆看看，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在两岸关系上，他“愿做任何事情”。

蒋家第三代总共有六男一女，其中蒋经国有五男一女，长子蒋孝文、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女公子蒋孝章，皆为蒋经国与他的苏联夫人蒋方良所生；此外，孪生兄弟章孝严、章孝慈，是蒋经国主政江西时与他的情人章亚若所生。至于蒋纬国，只有一个独生子蒋孝



■宋子文与母亲倪桂珍

刚，是他45岁时与第二夫人邱爱伦所生。

长子蒋孝文，自小被视为“问题少年”，在美国留学险些入狱，美国移民局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回到台湾后，劣行不改，吃喝嫖赌，无所不及，民间传言他得了性病，几乎成了废人。1971年脑部受到严重损伤，1988年又患了喉癌，一年以后命丧黄泉，终年55岁。

二公子蒋孝武，“苹果脸儿，乌溜溜的眼睛，金黄的头发”，从小就长得漂亮可爱，被老蒋夫妇视为掌上明珠。特别是孝文不成器后，蒋家把继承江山的希望都寄托到这位二公子身上。但是，1984年蒋孝武涉嫌杀害《蒋经国传》作者江南一案，闹得声名狼藉。为平息这场风波，蒋经国派他到新加坡任“商务副代表”，最后一事无成，1991年7月1日因患急性心脏衰竭一睡不起，“英年早逝”，年仅46岁。

老三蒋孝勇，无意政界，投身实业，一直是台湾工商界的活跃人物。夫人方智怡是前台湾“高速公路局”局长方思绪之女。蒋孝勇打着蒋家的招牌，利用中国人“打狗也得看主人”的传统心理，在台湾工商界无处不赚，大发其财，倒也相安无事。但是，蒋经国一死，失去了权威庇护，蒋孝勇过去依仗权势所搞的特权承包以及贪污受贿、走私、炒汇等种种劣迹，纷纷被新闻界披露出来，一时间，蒋孝勇被看成是岛内头号“官倒”，成为政界、民间反蒋、倒蒋的主要靶子，许多“立法委员”甚至提出要求有关方面追查“清算”的动议。这样，曾在台湾呼风唤雨的蒋家三公子，再也无法在岛内继续混下去了。不得已，1989年3月初，蒋孝勇举家远走加拿大，不久前又移居美国，去找他的老奶奶了。他在回答记者时说：“蒋家应该打个休止符。”

至于蒋家仅有的千金小姐蒋孝章，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在美留学期间，她不顾父亲蒋经国的强烈反对，与已有妻室的台湾前“国防部长”俞大维之子俞扬和热恋起来，1961年结婚，次年生下独子俞祖声。俞扬和一生经商，远离政治，蒋经国对他颇为反感，认为他的女儿由千金小姐变为商人妻子有辱家风，所以两家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蒋孝章夫妇也很少回台湾探亲。目前，蒋孝章一家定居于美国的旧金山。

蒋经国与章亚若所生的双胞胎兄弟章孝严和章孝慈，为人忠厚，严谨自律，在台湾人心目中印象颇佳。孝严一直在外交界任职，任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而孝慈则远离政界，默默无闻地从事着他的法学研究，在学

术界很有影响。总的来说，他们兄弟二人的人品和业绩都比那几个嫡出的兄弟要强得多。但是，碍于蒋家的“面子”和台湾当局对蒋经国的“神化”，兄弟俩至今还不能“归宗认祖”。

1993年8月20日，章孝慈以台湾东吴大学校长身份，出席在北京召开的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亲切接见了她。章孝慈的大陆之行，深受海峡两岸和国际舆论的注目。这是因为他的身份颇为特殊——他是蒋介石家族中重返大陆的第一人，也是四大家族中重返大陆的第一人。

9月5日上午，章孝慈冒着滂沱大雨，来到广西桂林东郊凤凰岭下，在兄弟俩集资重修的新墓碑前，按照中国传统的家祭仪式，祭扫生母章亚若之墓。

当司仪宣布“恭读祭文”时，章孝慈泪如雨注，泣不成声。他断断续续地读道：“……劬劳我母，生于忧患。万方多难，世局崩离。孿生二子，孝严孝慈。抚养六月，驾返瑶池……”章孝慈长跪雨中，雨水与泪水相融，雨声和哭声交织，他坚持着读下去：“两家九口，独我来斯。外婆吾父，魂应相随……我悲我母，九回断肠。我思我母，山高水长。”在场的人或潸然泪下，或哽咽不止，场面极为悲惨肃穆。

当记者问及章孝慈此次回乡扫墓心境如何时，他说：“我能回桂林祭扫母墓，极为激动。此刻，我和天下所有儿子在母亲灵前的心情是一样的。”在谈起大陆之行的观感时，章孝慈说：“大陆之行给我的印象是：大陆的潜力在慢慢地发挥出来。整个社会有一种活力，这种活力你可以感觉得到，我早上五点多钟起来，到西湖去，小贩已经在做生意了。”

在日趋密切的海峡两岸交往中，章孝慈的大陆之行，无疑是锦上添花。

蒋孝刚是蒋纬国的独子，因为与其他兄长年长相差悬殊，所以来往并不密切，倒是与他年龄仅差两岁的侄女蒋友梅的感情特别的好。1980年底，他们叔侄二人同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蒋友梅主攻艺术，他主修法律。在剑桥几年，他隐名埋姓，专心学业，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商业法和国际法方面造诣颇深。剑桥大学毕业后，蒋孝刚赴美国纽约参加全美律师资格考试，天遂人愿，一试中的。如今他已是美国纽约的著名大律师。正因为他是不靠权势而自我奋斗成功的蒋家后代中的

佼佼者，所以其父蒋纬国才会讲出“儿子在精不在多”的名言。

蒋家的第四代传人也已经长大成人了。排行老大的蒋友梅，是蒋经国生前最疼爱的孙辈、蒋孝文的独女，如今已是三十有三了。她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完艺术专业后，一直在英国工作，她的志向是做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此外蒋孝武的儿子蒋友松、女儿蒋友兰，蒋孝章的儿子俞祖声，蒋孝勇的儿子蒋友柏、蒋友常，章孝严的儿子章万安，女儿章惠兰、章惠筠，章孝慈的儿子章劲松，女儿章友菊等，或经商，或读书，一个个都远离政治，“不愿外界仍以有色眼镜看他们这一代”，开始走一条迥异于父辈的人生道路。蒋友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想从商，大学要念经济系。”妹妹友兰，“跟我一样，学经济。”当记者问道：“是不是蒋家第四代要完全脱离政治”时，蒋友松以很坚定的语气回答：“我希望如此，我希望如此！”蒋友松的一番话，可以说反映了蒋家第四代人的现实心态和人生选择。

宋家6个兄弟姐妹中，六弟宋子安1969年死于香港，是宋家年龄最小而又最早去世的人，终年63岁；长子宋子文于1971年4月因食物卡在喉咙中，死在旧金山，终年74岁；长女宋霭龄于1973年病逝纽约，终年83岁；次女宋庆龄，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1981年5月病逝北京，终年89岁；次子宋子良在80年代中期死于纽约，终年80多岁。宋家掌门人宋子文的夫人张乐怡，1988年病逝纽约，终年79岁。宋子文没有儿子，生有三个女儿：长女宋琼颐，嫁给冯颜达；次女宋曼颐，嫁给余经鹏；小女宋瑞颐，嫁与杨成竹，或从政，或从商，现都定居美国，1993年1月，纽约“华美协进社”举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曾向北京商借了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据知情人讲，实际幕后推动这项活动的就是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

孔家的掌门人孔祥熙，1967年死于美国纽约，终年86岁。孔祥熙与宋霭龄共生有二子二女。长子孔令侃，1992年8月死于纽约，终年75岁；次子孔令杰，大陆解放后，携其父亲几十年所搜刮的民脂民膏，在美国大肆挥霍。最令国内外舆论视听感到震惊的是，他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郊外，耗费1800万美元建造了一座能够防止核辐射的“地下宫殿”，当地人戏称为“007城堡”。

孔令杰做过台湾驻美“大使馆”武官，平时趾高气



■抗战期间，宋庆龄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

扬，仗势小姨妈宋美龄的庇护，谁都瞧不起。5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准备组建海岸巡逻队，蒋介石有意让孔令杰当司令，孔却不想干，他表示愿意当爱尔兰公使，后来公使没有当上，便在国民党驻美大使馆发泄怨气，无人敢惹，据说连顾维钧“大使”也怕他三分。后来又因为和俞大维争权夺利，受到蒋介石的喝斥，最终失意。离开华府后，孔令杰即从事炒股票、炒房地产、倒卖石油等生意。而且还不断地与他的夫人、好莱坞二流女星黛布拉·佩吉特演过《折箭为盟》、《大神秘》等剧，出尽了风头。

孔家长女孔令仪，曾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1943年与国民党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陈纪思结婚。当时宋美龄为女儿准备了八大箱的嫁妆，飞机在重庆机场起飞后失事，嫁妆也随之报废，但孔家有的是钱，马上又置办了六大箱子以弥补。如今，已经79岁的孔令仪居住在纽约长岛，与她的姨妈宋美龄相依为命。据报界披露，去年孔令仪曾经返回台湾，作短暂探亲。

孔家最出名的是孔二小姐孔令伟，他一生女扮男装，为人凶悍、跋扈，独断独行，目空一切，嗜烟爱赌，无所不及，但颇得宋美龄之钟爱。如今已经75岁，早已失去昔日风采，正缠绵病榻，来日无多。

陈家本来在蒋家王朝中所扮演的就是帮闲的角色，逃亡海外后混的也最差。陈果夫1951年8月病逝台北，没有留下后代；其弟陈立夫的命运似乎要比他的哥哥好一些。

陈立夫总共生有三子一女。长子陈泽安，毕业于台湾大学农学系，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农学院专攻水果学，获硕士学位；后又进新汉姆顿大学研究植物病理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在新泽西州几所大学任教达二十

余年，是一个颇有名望的植物病理学家；次子陈泽宁在美国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现在一家电子公司任职；三子陈泽龙获台湾航空工程与工商管理双科硕士，现定居美国；女儿陈泽蓉，排行老三，是陈家唯一的千金，擅长绘画，现在定居美国。

陈立夫1950年离开台湾，流亡海外，栖居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湖林镇，时间长达近二十年。在这期间，陈立夫先后办过报纸、经营农庄，还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同时潜心学问，研究中国文化。1969年，在蒋介石的多次相邀下，陈立夫才打消了和儿女们定居美国的念头，回到台湾安度晚年。

回到台湾后，陈立夫开始远离政治，醉心于他在美国时就已从事的《周易》和中医的研究，系统弘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先后出版了《我是中国人》、《我的信仰和希望》等十余种专著，主持翻译了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的宏篇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作为炎黄子孙，陈立夫心系大陆，多次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祖国看看。1993年10月，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思想文化学术刊物《东方》杂志在北京创刊。93岁高龄的陈立夫先生应邀欣然为该杂志题词：“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统一。”1993年11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了陈立夫先生的代表作《四书道贯》，陈立夫先生为了表示支持大陆正在实施的“希望工程”，毅然决定将其所得稿费3000元人民币全部捐助大陆教育事业。当陈先生得知捐款已用于“希望工程”后，高兴地说：“一个老采矿工程师，能有机会捐助‘希望工程’，是最合乎我的希望，也最具有教育意义的。”同时，据报道，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已受托将陈先生的另一部分稿费寄赠浙江湖州英士高级中学。拳拳赤子之心，由此略见一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日益密切，同是华夏子弟、炎黄子孙的中国人，不管是在台湾、香港、澳门，还是旅居美国、加拿大以及世界各地，民族感情，血浓于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岁月的流逝，历史上所发生的不快和恩恩怨怨，都将会得以化解。“本是同根生”的中华民族连心锁会把世界上所有中国人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永远不再分离。对此，我们满怀信心。

水的贫困

严重威胁着中国

严重耗竭中国

水环境

●徐 刚

世界上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依靠着大江大河而出现，并沿着它壮阔的波涛而无尽绵延发展着她古老璀璨的文明的：埃及与尼罗河；巴比伦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与恒河；中国与黄河、长江。

可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大河衰落的时候，大河文明也衰落了。

——题记

濒临耗竭的水资源

中国是缺水大国，水资源并不丰富。中国包括地表水、地下水的水资源总量约为 28124 亿立方米，河川经流总量约为 27115 亿立方米，平均年经流 284 秒米，少于巴西、苏联、加拿大、美国和印尼，居世界第 6 位，人均占有量 2630 立方米，居世界 88 位，不足人均世界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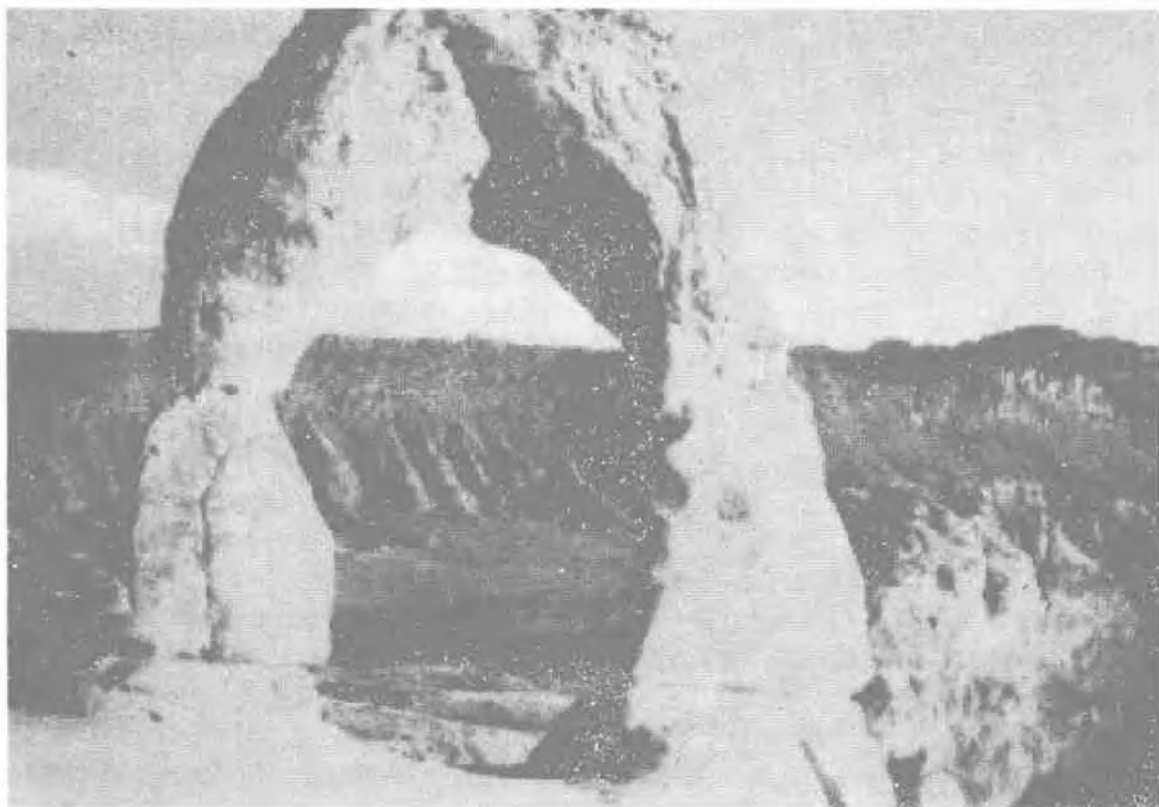
平 8300 立方米的一半。

贫水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贫血的中国。

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变化也极不均匀，年降水的时间分配不合理，以至水灾旱灾频繁。

每年 70—90% 的降水集中在 6—9 月份，并大多以暴雨形式出现，水资源的 70% 以上由滔滔洪水组成。一个从文化传统以及心理积习上习惯于求太平求安稳的民族，却因为上苍的意旨，而每年都要承受或者洪水或者干旱的冲击。

水资源的分布似乎也说明了水的狂放不羁的另一面，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水资源量占全国的 82%，而耕地仅占 36%。长江以北地区耕地占全国的 64%，而水资源只占 18%。仅辽河、淮河、海河流域，耕地占全国 1/3，而水资源量只占 5.8%。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



计：

1979年，中国有154个城市缺水；

1988年，有300个城市缺水，总缺水量高达54亿立方米；

1988年之后，中国缺水的城市每年都在增加，城市膨胀，流动人口剧增之后，不得不挤占农业用水，或完全不顾后果地大量超采地下水，出现大面积地下水漏斗，地面沉降，地下水水质恶化，海水入侵……

这一切对都市而言，已经不是隐患而是明忧了。

如果离开烦琐的数字，沿着历史行进时留下的黄土高坡稍作探询，具体的形象更会提醒人们注意那迫在眼前令人惊心动魄的事实：

曾是八水环绕的古都长安（西安），历史上借着清清黄河水使中华民族的历史达到盛唐的繁荣，如今在历尽了黄河由清复浊的千百年沧桑巨变之后，水荒竟使黄河变浊，泥沙开始大步逼近了这座名城。

缺水的西安风沙肆虐无忌地肆虐；古城墙由于地下水的过量开采出现一道道裂痕；大雁塔倾斜了；钟鼓楼开裂；西安市内从东到西出现9条裂缝……。

这些实实在在的裂缝、倾斜告诉我们：自然生态的

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和谐，因为人类的掠夺行为就都在面临决裂之中。

北京，在近10年中的变化是人所共知的：高架桥的凌空而起；三环四环路的开通；住宅小区林立；乃至城市绿地的出现，这些都说明了这座城市的长足进步。然而北京的水资源却因为城市的不断膨胀和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而更为紧张了。

据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估算，北京每年缺水10亿多立方米，城区7亿，郊区3亿。北京的人均占水量仅是全国的1/6。为了保证城市人口和工、农业生产对水的需要量，不得不靠每年超采10亿吨地下水补足。这样做的结果，北京地下水位逐年下降，有的地方已深到30多米，就是这样还在不断开采。从理论上说，地下水位若深至50米到80米，就再也采不出水来了，到那时怎么办？人们似乎还来不及作这样的深思。

北京的旱情已经十分危急了。1993年密云、官厅两大水库来水量锐减，仅5.5亿立方米，比1992年减少5.2亿立方米，如果1994年旱情依然，官厅水库将无水可供北京，密云水库的供水形势也会更趋严峻。（据报载，由于今夏北京郊区下了几场大雨，密云水库蓄水量

已达到历年最大的饱和)

1993年底,北京的地下水位又下降了2米。

北京地下水的漏斗已扩大至2100平方公里。

据《光明日报》消息,到2000年北京的地下水位将降到70米以下,水质硬度将大大超过国家饮用水标准——由25德国度激增至50德国度。北京现有的水井将大部分干枯报废,北京城近郊区将没有合格的地下水可以引用,水资源危急已不带有任一丁点儿夸张的意味。

北京如此,北京的周边即华北缺水区又如何呢?

所谓华北缺水区,除了北京之外还包括天津、河北、山西、豫北、鲁北胶东、辽宁中南部。这一大片地区是我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政治、文化集中的中心地带。

但这个地区人均水资源量只占全国平均数的1/5,世界平均数的1/20。其中水资源更紧张的山西能源基地、京津唐地区和黑龙港地区的人均水资源量,又仅为该地区平均数的3/5。

据新华社消息,一直靠黄河维持生存的胜利油田已经无法从黄河中汲取一吨水。黄河下游今年夏天由于持续高温干旱,不少地方已出现断流。近20年,黄河下游的断流时间不断延长。引水量大增也是河道干涸的一个主要原因。

长江枯水,黄河断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险象?

倘说是警告,那么警告的次数已经太多了。年年防洪,岁岁抗旱,越防越洪,愈抗愈旱。水,在不该到来时汹涌着吞噬一切;水,当人们渴盼甘霖时却无影无踪。可是人们依然以最落后的方式、方法用水,在这绝对贫水的国土上,水的浪费仅仅从下列数据便可想到其惊人的程度了:

我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85%,但灌溉用水有效率只有25—40%。

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为20—30%。

我国单位工业产品的用水量比发达国家高出5—10倍,仅相当于日本60年代和美国50年代的水平。

生态环境是这样地严峻,它告诉人们:即使在富起来的人群中,也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在条件许可下生活。走向奢靡就是走向毁灭。

水,无论是汹涌的还是泪滴的,都是绵长的。

我们甚至分不清今天倒进我们杯子里的,究竟是

古时水还是今时水,在大自然绝妙的循环中,气、云、水纵有形态的区别,却更有着本质的关联。

你在西安古城墙上怀古,夕阳下,吟哦“正西风落叶下长安”时,想起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你只需大口地呼吸,但会吸进当年李白曾吸入过的空气的5000万个分子;当你去趁还没有最后淹没的三峡寻访杜甫的足迹时,一边慨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一边捧起一掬江水饮入口中,又有谁能断定这里面就没有当年这位落魄诗人穷愁潦倒时饮用过的水分子呢?

我们只是把空气弄混浊了!

我们只是让江水污染了!

长江正在成为第二条黄河,这是主要从江水挟带的输沙量而言的。河床抬高、变窄,江底下沙龙蜿蜒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航道堵塞,江水不得其门而入时便夺路而去,毁堤泛滥,这是我们中国人年年面临的防汛、防涝。

同时,江河水的污染却是不知不觉进入人体的。

《当代社会与环境科学》杂志有一篇文章这样说:

“由于大量污水进入水体,我国淡水资源又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例如,就江河的情况来说,据对全国55500公里河段的调查,不符合饮用和渔业用水水质标准的有47700公里,占85.9%。不符合地面水水质标准的为26100公里,占47%。甚至不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也有12800公里,占25.7%。其中污染严重,鱼虾绝迹的河段有24000多公里。

全国七大水系中近一半河段污染严重,86%的城市河段水质普遍超标。以淮河为例,在评价的2000公里河段中,78.7%的不符合饮用水标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近几年来发生污染事故54起。据8月31日的一则新华社报道透露,今年7月中下旬以来,淮河中下游又发生大面积水污染事故,使一些地区的群众饮水发生困难,直接危及了下游人民生活及生产。

全国七亿人饮用大肠杆菌超标水,1.64亿人饮用有机污染严重的水,3500万人饮用硝酸盐超标水。

惜清水之不再,叹污浊之汹涌。又有谁认真地想过:水是怎么流动的?是有其不可改变的进程呢?还是能够属于人类意志借助着高技术而可以自由支配?是的,水可蓄、可拦,可分流、可以灌溉、可以航行。地球是个“水球”,人世间的万物都是水滋润、水托举的。在人

类完全凌驾于自然的神话破灭之后，其实，人仍可以回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即：我们本来可以通过对人自身生活方式与行为的选择，来影响流淌于大地母亲身上的河流的质量的。可惜人类没有这样做，在凌驾不得之后便是任意索取，在最宝贵的资源与金钱之间，我们慷慨而愚昧地抛弃前者，自私而不要命地追逐后者。

笔者曾经两次踏访长江三峡，并且记录下了沿岸的污染、泥石流及光板田。

长江沿线旧有的 16000 多处城市污染源尚未得到治理，现在长江又面临着三峡工程上马、库区沿岸城镇搬迁及大量移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布局。如果不从现在开始着手治理，未来的三峡库区将出现大面积的污染带和污染水域，三峡水库建成后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严重污染的滇池。



长江与它的支流嘉陵江是重庆市的主要生产、生活饮用水源，也是主要纳污水体。重庆市每年排入长江的污水总量为 5.56 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达 3.9 亿吨。按城市人口 240 万计算，长江、嘉陵江年接纳的生活污水总量为 1.66 亿吨。

排入长江次级支流的污染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 19 条次级支流的监测表明，属重污染及严重污染的河流占 49%。临江河、璧北河、綦江河尤为严重。长江干流在重庆的入口处，24 项水质指标中有 5 项超标，流经重庆后马上增加到 10 项。

人们对三峡库区的环境忧患又岂只是重庆？

库区沿岸有 10 多个城市，除重庆外，尚有万县、涪陵等均超过了 20 万人口，每年排放到长江的污水量均

超过 1 亿吨。沿岸市、县属下的化肥厂、磷肥厂、氮肥厂、造纸厂、化工厂均乘排放废、污水之便而沿江分布。

葛洲坝的污染像一道浓浓的阴影，投射在三峡库区。

葛洲坝的夜明珠河段，在规划中是旅游风景区，而现在夜明珠港区已经被污染得风景全无了，水面上的废油，在有的地方已经到了“掏起一勺便能开拖拉机”的程度。黄柏河流经宜昌县城河段原先为一类水质标准，葛洲坝建成后水位升高，成了相对静止的回水湾，水质变得发黑发臭。

水利专家、环境专家已经不止一次大声疾呼了：

三峡枢纽工程建成之后，目前重庆附近的长江、嘉陵江段、巫山的大宁河小三峡，四川万县等附近水域，都将成为回水区或相对静水区，在上述这些河段长江不再奔流，或者说长江奔流的天性被人为地遏阻了，水体的稀释自净能力将大大削减。而三峡水域日前已经严重地存在并且还在日益加剧的水污染问题，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

但愿葛洲坝的今天不是三峡水库的明天！

危机存在于中国的每一条河流。

新疆，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之一。这是一条流经沙漠腹地孕育着和田绿洲的生命之河。

然而和田河自 90 年代以来，注入塔里木河的水正以每年 4 亿立方米的速率持续递减。1993 年注入时间仅为 10 天半，流量不足 1000 万立方米，已经接近断流的红色警戒线。

河水减少最直接带来的后果是，沿岸的胡杨林带变窄了，呈现衰败的趋势，已经固定的河上开始活跃，在多处中断的绿色林带间悄悄地聚合，滚滚泥沙正直逼河岸。

河水流量锐减之后，和田河在穿过沙漠时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要不了多久，和田河只能望大漠而兴叹，不再是源头活水，而是变成一潭死水，然后干枯，只留下一条戈壁的古沙道让后人凭吊。

沙漠的一线生机也最后死亡了。

辽河是东北的一面镜子。

辽河流域工业发达，城市密集、人口众多。“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的离情别恨往往会使人想到辽河两岸的荒凉，其实，早在原始社

会这里就聚居着人类的村落。辽东森林繁茂，多山林之饶。辽西为辽河下游冲积平原，河湖纵横，多鱼泽之利。而辽阳城，从战国以降，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进入近代之后，辽河流域资源及辽河水系本身，使这一带分布着几乎辽宁省的所有重工业城市，如沈阳、鞍山、抚顺和本溪等。这些城市的钢铁、采矿、石油开采、石油化工、航空制造、机器制造业等工业用水及辽宁一省大多数的居民用水、农田灌溉用水，全靠着辽河提供。

只要稍稍设身处地为辽河想一想，便能感觉到辽河很累，辽河不堪重负。

1993年11月，笔者曾有辽宁之行，先是到了盘锦，辽河的入海口。由盘锦去沈阳途中过辽河时，正值枯水期，河床中沙洲连绵，河边是一座抗洪纪念碑。沙洲与纪念碑默默对视着。

辽河水系的另一条大河——太子河水再一次被重污染。

在太子河进入鞍山之前水质已经污浊不堪，然而鞍山正在翘首而望。

鞍山，中国的钢都，有全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同时为了钢都的正常运转还有一整套发电、化工、机械、炼油、建材等工业企业，更普遍的是工矿要用水，工人、市民要喝水。假如没有水，钢都就没有钢，钢铁元帅升不了帐，没有钢铁的支撑，共和国的大厦会是什么样子？无疑，我们需要钢铁，那么太子河还要不要呢？钢铁与人类的生命健康比起来孰轻孰重呢？这就是现代人的两难境地。

太子河鞍山河段起于唐马寨，止于小姐庙，流段37.5公里，这短短的37.5公里却要无可奈何地接纳鞍山1650个工矿企业和260万人口排放的每年2.48亿吨各类污水、废水！

这37.5公里的太子河段，是工业污水扼杀河流生命的典型的真实而又形象的写照：污水资源不断。各种有毒的物质在光天化日之下以黑色或褐色倾泄在河中。鱼虾绝迹、水草不生。

太子河是辽河水系中的一条主要河流，经本溪、辽阳和鞍山市至三岔河与浑河相汇合，至营口入海，全长413公里。可是，太子河从形成干流到入海为止，已被通体污染，流经本溪与鞍山的河水是黑褐色，连地下水也被酚、氨氮、硫化物严重污染，致使太子河流经的郊区几百眼中的井水不能饮用。

流经本溪的市区河段有排污口27个，1985年排入

太子河的污水达2.3亿吨。其中含酚77.1吨，氰化物117.9吨，粉煤灰29.2万吨，油267吨，瓦斯泥2万吨。

笔者曾请教过生态学专家，专家称：对于太子河来说，仅仅这一年的来自本溪的有毒工业污染就足够毒害自身并毒害饮用太子河水的人群了。

然而，太子河的厄运还远不止于此。

当太子河痛苦地出本溪入参窝水库，经过稀释、沉淀、氧化，水质有所好转后，却又很快进入辽阳市区。辽阳化纤公司、辽阳纸板厂、庆阳化工厂的年排放量1.5亿吨的工业污水以及沈抚灌区日排放量为24万吨的含油污水都注入了太子河，一条河流就这样无声无息似乎连呼叫声都没有就这样被窒息。向太子河传送鞍钢西部排放污水的运粮河，在《辽宁省环境质量报告书》中被恰如其分地称为“黑水河”，运粮河已经完全全地死去了。

当太子河出鞍山与浑河相汇时，它带给浑河的当然不是清澈与明净的了，而是本溪、辽阳、鞍山三市年排放量达7亿2千万吨的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

这便是水污染的“交叉效应”，即，小河要流进大河，大河是由各种水系组合而成的，一条死去的河流不可能孤立地死亡，而是随时把死亡的水分子通过分流与汇流扩散，再通过这种可怕的“死亡扩散”影响到别的水体及小生物乃至各种农作物及人类的生命本身。

湖泊，是地球上的掌上明珠，是水资源的重要来源，也是蓄洪排涝的主要基地。中国应该说是一个湖泊分布比较多的国家，而自1949年以来，我国湖泊减少了500多个，面积缩小了1.86万平方公里，占现在湖泊面积的26.3%，湖泊蓄水量减少513亿立方米，其中淡水减少340亿立方米，超过华北地区供水量的50%。自1954年以来，湖北、安徽、江苏及洞庭、鄱阳湖的湖泊水面减少了1.2万平方公里。江汉平原在1949年有湖泊1066个，目前只剩193个了。湖泊和湖泊水蓄量的减少及随之注入湖泊的水质量下降，极大地影响了湖泊作为吞吐水容量，调节用水甚至调节地区性气候的作用。据《中国国情报告》说：令人最为担忧的是，今后一旦长江、黄河洪水泛滥，无处分流泄洪，堤防溃决，势必淹没下游大面积良田，百余城市将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

水已经污染，那是文明的污染，也是一个时代的污染。

水的消失,也将是文明的消失,一个时代的消失。

都市梦的忧思

古老文明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和城都随着水的流向而推移,不同历史时期的兴兴衰衰,实质上是人与城的迁徙不可分的。

就历史的民族形成过程而言,中国土地上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是一个巨大而松散的网络。这个网络在历史上的更为独特之处,是用方块的汉字把中国地域上绝大多数居民结合成为一个香烟不断的民族——汉族——同时也和别的民族相处——甚至如元、清两代为少数民族统治——但从文化而言,无论是蒙古族还是满族却先后都被汉化了。

中国历史到了唐朝后期,城市化的过程加速了,不仅城市的数量增加,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也不断提高。美国学者施坚雅称之为发生在中国的“中世纪城市革命”。按照施坚雅的统计,八世纪的长安(今西安)人口达100万人;北宋的东京(河南开封),人口为75万人;南宋的临安(杭州)于南宋灭亡之前,人口为120万人。这些城市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

施坚雅并且认为:与中世纪的长安、开封和杭州,先前曾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一样,南京在明改建以后的十年左右时间内赶上开罗,城为世界最大的城市,至15世纪某一时期为北京所代替。除了17世纪短时期内,亚格拉、君士坦丁和德里曾向其居首地位挑战外,北京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城市,直到1800年前后伦敦才超过它。

时至近代,在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同步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衰退了,并且在因其文明久远而斑驳的古墙上,留下了血肉模糊的殖民者、侵略者刀枪的烙印。

但上海是例外,这个显然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大都市,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便有了“东方巴黎”之称,作为租界统治和港口条约的产物,它的每一幢建筑都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象征,外滩一带被分割的殖民结构杂陈了英国、法国建筑的线条,从外部掩盖着更广大得多的陋巷、棚户及马桶。

1842年,上海人口为30万人。到1949年,便已激增至300万人。

上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态下的畸形发展,无度

的掠夺和奢靡,带来的在生态方面的结果是:整整污染了一条苏州河。

苏州河的变黑变臭,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警示。当苏州河已经臭得没有法再臭的时候,上海市的人口到1960年时已高达600万。于是,流域面积大得多的黄浦江,又被严重污染了。

1990年出版的《中国国情报告》指出:人口在1985年便已有1180万,流动人口200万,每平方公里的密度高达9782人的上海市区,日产生活垃圾8000吨,建筑垃圾3000吨,粪便7500吨,工业垃圾2万多吨,四项之和每天产垃圾4万吨,一年达1500万吨。目前我国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不到5%,这些垃圾该有多少被倒进了黄浦江?

说苏州河是臭水河,说黄浦江是垃圾江,早已不算过分了。

迄今为止的事实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仍然坚定地走在城市化的道路上。与此同时,农民大量离开土地,以百万计的数字涌进大都市,铁路告急,住房告急,用水告急,治安告急。对于都市人类学家来说,都市的膨胀似乎是在“刹那间”完成的。但城市本身却毫无准备,基础设施还是陈旧的,城市街道依然那么多,就连警察也来不及增加。更不知道这么多人要生存下去须臾不可缺少的水又在哪儿?城市的膨胀和人的贪欲的膨胀一样,在无序中显得不可阻挡。

1949年以后,中国曾经有两次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一次是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不顾国民经济的实际水平,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在三年之内有1970多万农民涌进城市,使城市人口急剧膨胀,1960年全国总人口66207万,城市13073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9.7%,这个时期成了我国城市化超速发展时期。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大跃进失败后的大萧条,城市里粮食、副食明显供不应求,中国由此开始了长期的大量的“票证年代”,凡是生活必需品无不凭证供应,而且食不果腹,大肚子病丛生,营养不良折磨着所有的中国人。至于农村,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然后是大量人口从城市往农村迁移。

第二次,1978年开始,我国城市化又进入了高速发展期。10年中,新增加242个城市、8000多个县镇。城市人口到1988年时达2017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18.4%。

直到现在城市人口还在增加中，城市化的进程从1988年以后，继续方兴未艾。根据联合国对世界未来城市人口的预测，中国到2000年时，全国城市人口总数为2925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4%。

城市化的速度还有人嫌不够快，但《中国国情报告》却告诫道：城市化速度与基础设施建设不相适应；

全国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仅2.4平方米，每1万人只有1.8辆公共汽车；每1百人拥有2.2部电话；全国城市的自来水普及率为45.9%；城市家庭用煤气、液化气普及率只有36.7%；全国城市居民每人每年平均用电为63.6千瓦小时；1万人拥有30位医生和43.5张病床；城市住房为人均6.5平方米。

这份统计中还缺一些重要的现代城市不可缺少的数据，比如：人均路树；人均绿地、空气、水源、水质及学校、书店等。

现在是在向我们的都市发出这样的警告的时候了：

在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恶化的趋向中，城市首当其冲，愈是大型的超级城市愈是脆弱，从能源危机，到地下水位下降，甚至一次病毒性感冒的流行，一个火警，都会使城市面临着灾难。

人类文明走到今天这一步，都市的高楼大厦已经成为顶天立地的“丰碑”了，这些千篇一律的学着外国模样的高大建筑的主体核心是水泥和钢筋，它的主体特征便是在各种包装下的冷漠，而夜晚的灯光、各种霓虹灯广告则是过分的浓妆艳抹。

所有的这些建筑为了能让人居住、显得有活气，首先便是能源和水的供应。

一个留学美国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朋友曾经这样对我说：

如果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都到了无差别状态，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文化可言了。中国人心态中一个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国作为发展的榜样，城市建筑是最典型的，欧洲学不了，古希腊的每一座城堡都是美仑美奂的艺术。美国建筑的暴发户式的高大要学得多，其实那不是美国社会民主、进步一面的精髓

欧洲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它的相对的独立性，你看看那些建筑就知道了，面对这雄浑、深厚、精致的文化与历史，美国佬也不能不服。有时候一个民族骄傲的头顶上的灵光便闪烁在镌刻着这一民族历史的建

筑物上。

人们几乎从未提及过这样一个问题：在建筑、测量、冶炼技术领先于世界的漫长时期内，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出现大型的、集中的高层建筑。但，中国的佛塔，云岗石窟等等却充分地说明当时的建筑匠们完全有能力修造可以夺世界之冠的建筑来，可是没有，只是把一些十分有节制的精美的殿堂楼角留给了后人。

那时候的人们包括统治者在内，对天、地都有一种敬畏感，认为大的领域是不能随便占有的；而且必须十分珍爱土地，而使更多的地块生长五谷。由此形成中国的古建筑尽量少占有空间，在有限的范围内精心营造，以叠障和隔断及天井沟通左邻右舍、天时地气，这岂不是太绝太美了吗？

我不懂建筑，却认为言之有理。

残存无几的古都的大墙几乎都处在缺水的干涸中。地质矿产部于1993年发布的最新消息说，全国36个城市出现地面下沉——

地面沉降大于200毫米的面积达1412.5平方公里，且有加剧的气势，安徽阜阳市地面沉降面积360多平方公里，最大累计沉降量870多毫米。地面塌陷主要发生在覆盖型岩湾水源所在地区，比较严重的有秦皇岛，山东半岛。山东省受到海水入侵面积400多平方公里。

地球是一个整体，不仅风、雨、云、海水，就连板块也都是亲密无间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西伯利亚的寒流总是要催促我们赶紧关好门窗；而美国的生态学家则预言：中国任何一处森林落下一片树叶，都会使他心里颤动的原因之所在了。

发展中国家高速城市化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如同人类生存环境的所有困惑一样，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曾经遇见过，并且正在反思与调整中。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落后的一个特权：即避免先进者曾经犯过的错误，那将是子孙后代的幸运。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因为实际上沿着别人走过的哪怕明知是错误的路走下去，也要比走自己的路省力得多。

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使我们很难有自己的过程，而只能得到已被别人证实了的不堪设想的结果。

灾变性的生态环境

为了金钱与财富，今天的的确确有不少中国人已

经到了无所不为的程度。

谁能想到含沙量日增而被指为第二条黄河的长江，因为江底的泥沙又在招来新的灾难，甚至危及到南京浦口和下关的江岸安全。

南京江段的浦口和下关一带，地质状况一直比较脆弱。1954年曾发生大面积塌江，津浦铁路长时间中断，南京发电厂、南京港码头都有淹没在滔滔江水之中的危险，其时，由苏联专家帮助，国家投资几个亿进行了沉船、打桩、投石紧急抢救，保住了南京江岸。此后的30多年中国家对长江南京江岸一直采取加固措施，我们无法想象一旦这一段江岸再次大面积塌江，长江上游奔流而来的雷霆万钧之势于此改道，将会是何等结果？

长江中的流沙量为每秒钟9吨，这些江沙多数沉入江底，由于一路冲刷之后沉没，所以颗粒均匀，不含泥土，被建筑部门视为最理想的建筑用沙。一只挖沙船每小时可取江沙300—400吨，每天获利2—3万元。

少则几条多则十几条挖沙船在禁区内挖沙，江浦县和浦口区有专门的挖沙公司，屡禁不止，愈挖愈凶，至于从南京江段外延的更长一些的江面上，几百艘挖沙船同时操作在江面上，已经不足为奇，如此滥挖已经导致：长江河床局部恶化；京、沪、杭越江电缆多次受损；航道受阻，正常航行受严重影响。

人们污染了一条举世闻名的大江，人们又在无度地挖掘它那本来就充满野性的不稳定的河床。长江的悲哀始终是在人的灵智的观照下走向黑色深渊的。

当有识之士在谈论1954年的塌江事件时，或者指出如此过度的、无节制的挖沙可能会引起长江河道走势的改变，从而危及南京城时，这些声音是如此地弱小，而且不合时宜。

假如我们把今天已经发生的种种灾难，看作是预兆着今后将会发生什么的迹象的话，应该说就迹象本身而言，一切都已经到了应该石破天惊的程度了。

1993年的深圳大火、爆炸如果说这是由于人们追逐金钱的私欲与浮躁膨胀心理带来的结果的话，还有一则数据更具有深层的启示就更使人惊心：

1993年，广东省境内发生主要地震灾害10起，在其中的8起“土地崩塌及滑坡”灾害中，深圳市就占了7宗。

我们看到的是深圳的高楼林立，看不到的却是地底下地质、水文的变化，由于高层建筑大量增多，及源

源不断地抽取地下水，准确而全面的估价深圳地质地貌的变化，实在是当务之急了。我们怎么能现在还认为地壳的承受力是可以达致无穷的呢？

1992年，深圳市龙岗商业街发生塌陷后，1993年山体滑坡、土地崩塌现象急剧上升，大大小小的灾难近百处。6月4日，一场暴雨过后深圳龙华镇第4工业区因山体滑坡造成了死14人伤16人的惨剧。

也许，火急火燎的人们在建设现代城市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如何面对现代灾难，而这些外观美丽、新颖的高层建筑，其实是何等的脆弱，在突发事件面前，往往不堪一击。

没有人计算过深圳在土地开发过程中破坏植被导致水土流失所引起的巨额的环境、财富的损失，但这种损失丝毫不因人为了的忽视而无足轻重，相反在不断增值中。

一个迄今为止见到的模糊的统计说：深圳由于水土流失造成河道淤塞而引起的水灾损失，每年达几亿至十几亿元人民币。

近几年来，滑坡、崩塌、泥石流已经成为中国的常见山地灾害。中国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区总面积为17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8%。近10年中，死于此种灾害的总人数为1万人，平均每年死亡928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33—36亿元。至1990年底，全国至少有100家大型工厂、55家大型矿山因此而受到严重危害。

至于1992年的调查统计表明：全国至少有9万公顷的土地被毁于崩塌、滑坡及泥石流中。

铁路枢纽沿线已经形成了1386条泥石流沟，对3000多公里长的铁路实施包围，其中尤以宝成线、成昆线、宝兰线损失最巨，路毁车翻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社会上屡见不鲜的质量滑坡、精神崩塌、媚俗低下的文化浊流却正在时髦的外衣下或者标榜新潮或者依傍“大款”，而款款而至。

世间如果再有“圣人”的时候，大自然便是唯一的圣人，它以先声夺人，希望人类在灾难中觉醒，但它也在痛苦彷徨之中。

宇宙不再无中生有的时候，就是人类步入有中生无的绝境之际。

人们快点警觉吧！地球病了。水的贫困在威胁着中国，我们要赶紧想办法阻止灾难的迅速到来。

责任编辑 方 徨

大漠女儿情

——中央电台记者彭玉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动人故事

●张 飙

“我去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地，据石油队的队长说，我是中国第四个到过那儿的女人。”

什么？她到过塔克拉玛干？说实话，她这一句话就把我给“镇”住了。我抬起头，仔细地打量着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她，我面前的这位清纯秀丽的女孩子，竟然到过塔克拉玛干？而且还是腹地？

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面前这位和她的名字——彭玉冰——一样晶莹可爱的姑娘和那个恐怖的大沙漠联系起来。我虽然没有到过那里，但我却记得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那里神秘失踪的。在我和许多人的眼里，塔克拉玛干就意味着死亡，那里是“死亡的海洋”。所以，我竟像自言自语似的问她：“塔克拉玛干？唉，你到那里去干什么？你知道它代表着什么吗？”

看来这个问题很可笑。所以她笑了——

塔克拉玛干是一句维吾尔族话，那意思就是“进去出不来”，也就是谁进去谁就会死在里面。是的，古书里也有记载：“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者皆死，无一幸存。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渡处，则莫知所以，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

是，听着是有些恐怖。可是你要是真的去了，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恐怖。

对，我是体验到了。但在体验到了恐怖的同时，我也真正体验到了沙漠的浩瀚、博大，宏伟、壮丽。你想想看，一片面积相当于3个浙江省或9个台湾省的茫茫黄沙，该是什么样子？你再想想看，一个人，站在沙漠中间，举目四望，到处都是无边无沿的沙海，起伏的沙浪就像万里狂涛要把你吞没，四周没有一点绿色也没有任何生命，就像被抛回了洪荒时代，你又会是什么感觉？

是的，你想象不出来。在去之前，我对它的感觉也只是朦朦胧胧的好奇。也许这是女孩子们的天性——越是距离遥远、越是神秘，就越是想认识和了解。而当我真的站到那沙海里时，我却觉得它离我更遥远，也更神秘。我知道，我的脚下虽然没有路，但这里却曾经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我虽然用手挖了好一阵都没看见一点别的东西，我却感觉得到，漫漫黄沙下掩埋着一座座繁华一时的丝路古城。尽管这黄沙冷冰冰的没有生气，我却像看到了地下有一条一条的石油大河在奔流！这里，听不见鸟叫，听不见人声，没有汽车马达声，没有机器的轰鸣。沙漠风刮起来，巨大的怒吼声让人一切都听不见，而一旦静下来，又静得出奇，什么声音都没有，静得能听见流星在天上划过的声音……

怒若奔狮，静似秋泓，胸怀开阔能包融天地，外表质朴却蕴涵着巨大的能量——你知道这几句对沙漠的评价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这些品质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话，他会是我们每一个女孩子苦苦追求的恋人……

这回，可轮到我觉得可笑了。把沙漠比作恋人，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她为什么会对一个不毛之地的沙海情有独钟呢？看来她那“女孩子的天性”传染了我，我心里竟产生了一种想了解、理解这个姑娘内心情感的冲动。

其实，我是第一次见到她，而且也很偶然。一个很有名的单位要搞一个大型的又吃饭又演出的招待会，请了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企业之声》节目主持人的彭玉冰和另一位男同志当主持人。可是到了快开始的时候，男主持人有事来不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主办单位临时拉了我来当主持人。晚上要开会了，下午我才和彭玉冰一起写主持词。



或许就是在写台词的时候她说了一句“去过塔克拉玛干吗”？我草草写完，只对了一遍，就拉着她说起了大沙漠。她呢，也不含糊，竟把沙漠比成了恋人。我仔细看看她，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相反，她晶莹透彻的眸子里，闪烁着的是绝对的纯情，也许，像沙漠里的清泉？

唉，苦苦恋着沙漠，这是一种怎样的女儿情怀？

望着两汪清泉，我随口问了一句：“你是怎么去的塔克拉玛干的，坐火车吗？”

没想到，这一句话竟打开了她的记忆闸门——

不是。为了去塔克拉玛干，我坐了飞机，坐了汽车，还走路，就是没坐过火车。

第一段路很平常，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第二段路很浪漫也很累，坐着一辆蓝色丰田越野车，穿戈壁，越天山，爬沙丘，闯干沟，整整两天才到了沙雅——这里有一个石油物探局的直升飞机临时机场。

第三段路可就是非常艰难了。不，不是难在路的本身。我们到达沙雅的那天，遇到了30年没见过的大雪，飞机不起飞。可是，我大老远的从北京来到了沙雅，眼看已经是到了塔克拉玛干的边上，总不能这样就回去啊。我于是就开始了“公关”。

你别笑，那里的“公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我才知道，来的记者太多了，再加上有些记者的言行和

这里的人“不对路”，记者已经不是很受欢迎的了。而且，直升飞机从沙雅飞到塔克拉玛干腹地，一个来回要花17000元，上了一个人，就要少装很多东西——沙漠深处的物探队员的进出、蔬菜、粮食、生产记录磁带、设备应急配件、紧急救护用品、邮包信件，都是靠飞机这一唯一的工具来运输的！

实际上，飞机是沙漠腹地和人类社会联系的唯一通道，有时甚至是石油物探队员们的信念。后来我听到过一件事：一位老家在河北的物探队员，在沙漠中开车拉东西遇上了大风暴，小沙包被风推着搬家，天昏地暗，三步以外就看不见人。车上的电台坏了，他一人竟坚持了6

天。当人们救出他时，大家抱头痛哭一场之后，他说，他时时听到飞机来救他的声音——他竟然靠对飞机的幻觉和对生存的渴望活了下来，可见飞机对他们是多么重要！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要想挤上这“沙漠的生命线”是多么的艰难。

我的“公关”从纠缠队长开始。当然不止是我一个人，那次从北京去了不少记者。然而队长几句话就把大家发了——气候恶劣，不能起飞。

我不甘心，跟着队长一个劲儿地“蘑菇”。后来到了有一大堆男人——大概都是物探队员——的屋子里，有人说：“那好，你实在要去就给我们唱个歌，我们帮你和队长讲情。怎么样？”

一屋子的人都跟着起哄。

唱就唱。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在这个用煤炭烧土暖气因而满屋子都是烟味的矮平房里，我竟然能一个歌一个歌地接着唱下去。我唱《石油工人之歌》，唱《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也唱《九九艳阳天》、《月亮走，我也走》。开始，屋子里的人还鼓掌，加油，后来就是一片宁静。等到我唱《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时候，竟有人小声抽泣起来！

于是，就有人劝我别唱了。我不。我还是接着唱。当时我想，要是不答应我去沙漠腹地，我就不停地唱，哪怕唱上三天三夜！

鬼使神差似的，我唱到“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的时候，我自己也哽咽起来！

那时大概已经是后半夜了。队长也来劝我别唱了。可是他仍然没有让我去沙漠腹地的意思。我真的感到很委屈，所以他随口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的时候，我差一点大哭起来！

当然没有。我只是和队长说了我的情况——我爱人也是地质队员，还是个“野外队长”。他们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一次出来之前，我和爱人已经有一年没见面了。可是就在我出发前一天，他回来了。爱人在外地，我在北京，野外勘探队员和妻子的团聚，对双方来说都是节日一般宝贵。可是他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出发来塔克拉玛干了，然而现在竟不让我进去，我怎么不伤心！

没想到，这样简单的几句话，竟比唱了几十首歌还有用。我发现，所有的人——包括队长在内的这些在沙漠里无比坚强的男人们——听了我这几句话，竟都眼泪汪汪，有的人还很激动……

说到这里，彭玉冰的眼睛里又涌出晶莹的泪花。

我的眼睛也潮潮的。我觉得，我已经对这位聪颖纯情的女孩子对沙漠的恋情有了一些了解——也许，她对沙漠的情感就是她对自己爱人的情感的“外化”。

所以，我说：“可能因为你的爱人在野外地质队，所以你对从事野外作业的人更感到亲切，你也更能和石油队员们达到心灵沟通的地步。爱勘探队员，也就爱他们的工作环境，也就爱上了沙漠。于是，沙漠就成了‘恋人’。”

说完，我很得意自己“逻辑推理”的严密。

谁知，她只用一句话就推翻了我的结论：“不是的。我爱人的考察是在大山区，不是在沙漠。但是我更爱沙漠，而不是山……”

那么，她爱沙漠的什么泥？我决心探讨个明白。于是我换了个话题说：“好吧，你爱的是沙漠。可是你究竟到了塔克拉玛干的腹地没有呢？”

一提起这个，她的眼睛里马上闪出了动人的光彩

当然到了。而且，那次去的记者，只有我和与我同行的两个人上了直升飞机，到了沙漠腹地。

对别的记者有的说我“会公关”，有的说：“我们拿着物探局局长的条子都不管用，你可真有本事。”我不在乎，我自己知道，我是以自己的心换得了石油队员们

的心。

如果详细一点说，我和沙漠的情感是在飞机腹地降落后，飞机机门打开的那一刹那开始产生的。那是怎样的情景啊！

走出机舱，看到的是茫茫黄沙中的黑黑的人群——飞机的到来永远是在腹地队员的节日。而让我惊奇的是，跑在最前面来欢迎我们的竟是几条拼命向飞机摇着尾巴的狗！

看来，石油物探队员们的惊奇肯定超过了我。因为，在这绝对是男人的世界里，忽然来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你可别以为我是个自我感觉太好的人。我说如花似玉，是指在当时给人的感觉。想想看，整个一片茫茫黄沙里，没有一个女人，男人们也就不修饰自己，有的人连头发都不理。是啊，修饰了给谁看呢？当然，有时他们是没有时间来修饰自己。

不管是什么原因，本来形象也不出众的我，在那些不修饰自己而显得褴褛的人们中间，大概是更加清新；在这些因为整天和沙漠打交道而分外强悍的汉子中间，大概是更加柔弱。而在这长年见不到女人的地方，我看到的男人的眼神是纯净，是慈爱，是珍惜。还记得当年看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创伤》里有一句话说“和诚实的人在一起能纯洁心灵”吗？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感觉……

说几件印象深的事？可以。

就先说一个“狗和人的感情”的故事——谁让我一下飞机看到的首先是狗呢？

说起来你也许不会相信，我们的石油物探队员们在想象不到的忙碌之中还有闲情逸致来养狗，而且不只养了一只。

说他们是“想象不到的忙碌”，一点也不过分。1983年，石油物探局与美国西方物探公司合作，组建了两只由中美联合管理的1830、1831和中国人自己管理的1832队，进入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进行石油勘探的时候，我们的石油队员们就下了“找不到石油不出来”的决心。近10年来，在沙漠里，他们没有节日，没有娱乐，风霜雨雪，酷暑严寒，在大沙漠中默默地工作。一次，1830队在野外连续工作了18天，回不了宿营地，只能在沙漠上露宿。等回到营地时，队员们个个都瘦得不成样子了。后来我问他们这么干不感到辛苦吗？一个队员说，国家每年给我们一个队的投资是1300万，如果一天不出工，就等于3万元钱白花了。3万元啊，能够买

多少粮食啊!

可是自觉自愿地忙成这样,他们还有心思来养狗!

我在腹地边缘的2222队和腹地里的1830队,都见过狗住的小巧别致的小屋。在2222队那天,大雪纷飞,队员们给狗搭了棚不说,还把自己的棉絮给狗盖上。在1830队,5只小狗就像初生的婴儿那样被沙漠汉子们宠抱着。他们常常花钱买上红烧牛肉,就用自己的饭盒喂小狗崽。那种温柔细心的神态和爱心,令我久久激动不已。在这样一幅景象中,我发现了人和动物的融合……

当然不都是这样美好的景象。毕竟是在沙漠里啊。那年,1830队要搬家了,狗并不知道。一只早晨离开营地玩耍的狗,回到“家”时,只剩下了片空空的沙地。没有人知道它如何“一个人”度过了那些孤独恐怖的日子,也没有人知道它历尽了什么样的苦难和挣扎,人们只知道它过了20多天终于找到物探队的新营地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脚掌被沙子磨得血肉模糊。在队员们的欢呼声中,它默默地钻到了餐车下面,趴在那里再也不动。无论是人们给它东西吃,还是别的狗用身体摩擦它,它都是一动不动,只是默默地、无力地淌着眼泪,是在伤心人们没有通知它就离去,还是在庆幸在死去之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谁也不得而知。只知道这条狗一直不肯离开营地餐车,不吃不喝,直到死去……

这条狗的死亡给全体队员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从此,凡是营地要搬家时,一定会有专人把狗的数目点清楚才动身。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1830队搬家,向“塔中一号”靠拢,我看到,一个队员正在小心翼翼地清点着狗的数目……

我听了这件事以后,沉默了很久很久。我没有去问物探队员们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爱狗。但我完全知道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物探队员也是人,他们也有满腔的爱。而他们所爱的人——爱人、孩子、父母、兄弟姐妹,都在遥远的地方,于是,除了对同志的爱、对工作的爱以外,他们就把自己的爱倾注在了狗的身上。这是一种无可奈何、但却十分真挚的爱。我想,也只有狗这样的忠诚的动物够资格承载这样的爱。沙漠里没有绿色,没有啤酒,也没有女人,但沙漠队员的这种爱,却把沙漠装点得分外多情……

彭玉冰不说话了,像是思考着什么。我也感到气氛有些沉重。不过,我好像对她的沙漠情怀有了进一步的

理解:她的对沙漠的爱恋,的确不能说是对自己爱人的恋情的“外化”,但可以说是她深深地受到了沙漠队员的感染。

但我没有说出口。不是不想说,是接受刚才的“教训”,我不想再一次说错。但我也想在这样沉重的气氛中聊天,于是便说,沙漠里就没有轻松一点的事可说吗?太伤感了人可容易老啊。

她笑了——

怎么,太沉重?讲点轻松的?好的。

就讲讲我在沙漠里“上厕所”的事。

不怕你笑话,我在沙漠里的那些天最怕的就是上厕所——因为沙漠里就没有为我们女同志准备厕所。你想想,黄灿灿一片巨大的沙地,几公里内都是“一目了然”,我怎么好意思?

但也不能总是忍着啊。记得刚刚到沙漠的那天晚饭后,一天都没有“方便”过的我实在有些受不了了,便溜出了宿营车。

现在想起来,我就是在离开宿营车以后知道了什么叫作“恐怖”的。

你别笑,真的。天上没有星星,地上没有灯光。完完全全的黑暗。我使劲揉着眼睛,还是“两眼一抹黑”。而一阵一阵从眼前飘过的黑暗,又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关于沙漠里的恶魔的种种传说。猛地一股凉风吹过,竟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可也不能不解手啊!正当我为难之际,野外队的副队长张利平来到了我的身边。他眼睛看着远处说:“走吧,别怕,我带你去。”

没想到这些粗犷的汉子中间还有这样细心的人。我又感激又不好意思地跟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黑暗深处摸去。就在我刚刚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候,突然,一声狂叫,不知从哪儿窜出三条黑影,“汪汪”地狂叫着向我扑来!

“妈呀——”我吓得掉头就向后跑,真像遇到了魔鬼。那三条黑影却不肯放过我,一直追到我爬上宿营车。我当时气都快喘不过来了,那种恐怖的心情,恐怕只有在《巴斯克威尔的猎犬》里的伯爵才能体会得到。

后来还是张利平副队长想出了一个主意:驾着他那26马力能载重24吨的V10进口车,送我到沙漠远处的凹处。唉,这可是在内地想都没有想过的待遇,坐着汽车上“厕所”!你说,要是没有沙漠队员的关心,我怎么办?

是的,这是很小的事情。但常常是很小的事情反映

出人的灵魂。正因为这样，我萌生了很强烈的采访这些人、写这些人的愿望。

你说得很对，我第一个采访的就是张利平。

说起采访你也许比我还熟悉。但我敢断定，你没有在我这样的条件下采访过。因为，我是坐在他的车里和他聊天、感受他的心灵的。

天啊，那是怎样的行车啊！

一部已经该淘汰的车，车门都关不上了。张利平让我用铁丝把车门拴上，他一手开车，另一只手拉住车门，我还得一只手扶靠背。严冬的沙漠里，气温在零下几十度不说，车晃来晃去，我的头撞了好几个大包。但我一直忍着，告诉自己：不要叫！

说起来也好笑，我上车之前是“吹过牛”的。张利平开始劝我不要和他一块出车，说很“恼火”，我当时就说，嗨，我怕什么恼火，什么样的恼火我没见过？

当然，这其实也不完全是说大话。因为我真的很坚强。比如说，我在北京一个人过，丈夫远在外省，根本帮不上任何忙。我怀孕6个月时，一次下班骑自行车在广安门摔了一跤，半天都爬不起来，我当时真想大哭一场。后来一想，男人又不在，哭给谁看啊？算了，自己爬起来，推着自行车、哼着胎教歌就回家了……

这还不算坚强？再说，从怀孕到生孩子，就没人照顾过我。回成都时，都快生了，下火车我是跳下来的，当时就吓来了车站接我的公婆一大跳。生了孩子不到一个月，我就背着孩子到处去同学家里去玩。我当然不是一个娇气的女孩子！

我和张利平还说了不少自己的“业绩”，所以他同意我和他一块出车。我怎么也不能叫啊。可惜，我还是没有坚持住，还是叫出声来了，而且最后还吐了个一塌糊涂！

现在想起来都还记得那个滋味。当时我觉得我就要死了，我眼泪汪汪地说：“你走吧，我怎么也不坐车了。”

张利平呢，却一个劲地夸我，说我比他刚来时还好一些，说他和不少人刚来时吐得比我利害多了。这一

夸，我也不好意思了，愣是硬挺着到了目的地。可干完了活还要回营地啊，我可是怎么也不愿意上车了。张利平看我实在不行了，竟提出让我开车！

我也不知深浅地开了起来。真怪，一开车就不晕车了。到了沙漠高堆，我不敢开了，他才接着开。你知道吗，事后我才知道，回营地的时候，车上装的是满满一车炸药！我真后怕，要是我开的那十几公里有个差池，我可能就没办法和你在这儿聊天了！

这件事，使我更进一步理解了沙漠队员的爱心。我



想，他对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都有这样的爱护——为了不让我晕车连炸药都不怕了——他对他的亲人一定会关怀备至的吧？

我猜得没有错。一说起他的在河北老家的妻子和孩子来，这个坚强的汉子立即变得温柔起来。他甚至就在沙漠里把车停下，在凛冽的寒风中和我聊起他的家。

张利平的妻子黄晓卿在老家工作，又要带他们的独生儿子，又要照顾父母。妻子最大的愿望是他能够在她困难的时候帮她一把，可惜，堂堂男子汉，就连这一点也作不到，曾经有河北的好几家单位想调张利平，可他又实在舍不得那留下了他8年青春和生命的大沙漠。

据我所知，石油物探队里有不少人和他一样，有许

多机会可以离开沙漠，但当离开真的要成为现实的时候，他们又都舍不得离开这片平时不知诅咒了多少次的沙地。不用多说这些队员，沙漠队里居然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厨师！

老人叫柳其林，从13岁起就在美国军舰上做杂工，18岁时开始学做西餐，一做就是50多年。他的西餐据美国人说比美国人做得还地道，在这片茫茫黄沙中，能吃上他做的西餐，对老外是个极大的安慰。只是他老伴已经68岁了，四个儿女也时时刻刻盼着他回家。可他却说，沙漠里还没有人能顶替我的工作，我走了，没有人给老外做西餐，会影响他们的情绪，会给国家带来损失……

在工作和享福之间，他们选择了工作。在轻松和劳累之间，他们选择了劳累。在妻子孩子和沙漠中，他们选择了沙漠。这是怎样的恋情，这是怎样才能说明白的恋情呢？

所以，当回到营地后，我也捧了一把黄沙，让它从手指缝中慢慢地漏下去，然后，我也面对沙漠，跪了下来……

彭玉冰的话停住了，但眼睛里却闪着激动的光芒。那宝石般的黑眸子，透出一种让人着迷的向往。或许，她又看到了那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是的，沙漠里的人离不开沙漠，沙漠队员和沙漠之间有一种斩不断的情感。我力图理解这种居然强烈地感染了彭玉冰这样的偶然到了沙漠的女孩子的情感。我想起了刚才彭玉冰说过的一件事：

1989年10月，在我们共和国40周年生日的时候，由腹地石油物探队提供井位的“塔中一号”中途测试，喷出了高产油气流。远在北京的总书记江泽民称，这是对我国国民经济的“雪中送炭”。看着油井喷出的财富，听着总书记对他们劳动成果的评价，队员们激动万分。就在兴奋的热泪流下面颊的时刻，队员们觉得，在夏季40—60度中挥汗如雨的奋战，冬季零下30—40度时咬紧牙关的工作，抛妻别子的痛苦，远离情人的思念，这一切都有了报偿……

我问玉冰：你说，这不是一种我们常常说的是人民对自己国土的热爱，也就是说是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呢？

彭玉冰缓缓地摇摇头，说——

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这里我只用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说起来很简单，我发现在这大沙漠里的外国人也

很眷恋塔克拉玛干。

论据很有力吧？1830队有澳大利亚人，有荷兰人，他们都是美方的雇员，我的到达沙漠腹地同样使他们很惊奇，也很兴奋。为此，我们中方的领导向美方郑重提出，不准他们晚上敲我的门。同时，队长带着我去外籍队员的车上去作了一次客。一问，这些老外们原来一直在沙漠中工作，来塔克拉玛干之前，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撒哈拉沙漠里工作，对石油物探特别是沙漠装备的维修很是在行。

尽管他们挣钱比中国队员多，休假时间比中国队员时间长，吃的东西比中国队员好，但他们和中国队员一样，得忍受着没有绿色、没有女人的生活。特别是没有女人这一点，对于生活习惯开放的老外来说，比中国人更难忍受。所以，我看到，美方雇员的宿营车里，到处都贴着裸体女人的照片和画像——或者，外国人也懂得“画饼充饥”？

但是他们也恋着这大沙漠……

人对工作本能的热爱？也不是。我想，可能每一个人离不开沙漠都有他自己的理由。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在这沙漠里的人们爱这片沙漠。而且，因为他们爱，所以，一旦他们发现有人和他们一样爱沙漠时他们会立刻对这个人充满敬意。

不，不是指他们对我的友好。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

一位沙漠队员的婚期到了，但他硬是走不开。于是，姑娘决定到塔克拉玛干腹地来和小伙子结婚。这对于石油物探队来说，真是一件大事！这是第一个要到工地上来作新娘的女子！队里让小伙子到沙雅去等着新娘。

可是，到了预订的时间，新娘还没到。又过了两天，还是没到。别说小伙子，就是队里的领导也沉不住气了！打长途电话问，说已经出来了不少日子了。队领导决定，让小伙子去乌鲁木齐去接。

可是，等小伙子到了乌鲁木齐，姑娘已经离开了乌鲁木齐，坐汽车去了沙雅！等小伙子又赶回沙雅的时候，姑娘已经在沙雅呆呆地等了三天了！

就在小伙子回到沙雅，就在沙雅的大街上，小伙子突然看到了在街上凄凄惶惶走着的姑娘。两个苦苦思想又苦苦寻觅的恋人，就在沙雅的大街上抱头痛哭起来……

挺感人？感人的事还在后面。

要到当时的营地，除了坐飞机和汽车，由于下了大

雨，还要趟着半人深的水走上十几里路。为了让一对新人尽快举行婚礼，队长下令，派了十几个壮小伙去，说“背也得把新娘子背到工地来”！

果然，到了要趟水的时候，物探队员们轮流背着新娘子走。其他的人则手拉手围在新娘子周围一同前进，组成了一个奇特的队伍。那情景可真是蔚为壮观。新娘在这些队员的背上，看着这些心地善良的人，不由得泪流满脸……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动人场面，但在队员们和我说起这件事时，我还是禁不住哭了起来。这是怎样的人们啊！这种人和人之间的纯真情感，如果仅仅用一个爱字来形容，岂不是太苍白了？

彭玉冰的这番话，使我探索她“大漠女儿情”的努力几乎“全军覆没”。

可是，我仍然固执地认为，她对沙漠的恋情，其实是一种对人的情感。这里有对她的爱人的情感而扩展出来的对所有从事地质石油勘探工作的人的情感；有她来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后体会到的物探队员高尚情操的敬仰；有对沙漠队员的真挚的爱心的共鸣。所以，当我向她指出这一点，她表示不赞成时，我说：就是这样的，只是你自己也说不清而已。如果不是这样，你为什么说话都是在赞美他们不离开沙漠的精神，做事都是在维护着沙漠队员的利益？

她静静地看着我，清泉一般的眼里，漾起了一股清波——

不是这样的，我也做过“对沙漠队员不利的事情”。

你别笑，我不是在说笑话。按有些人的想法，我真的做过一件“对不起沙漠队员的事”，而且还是一个很英勇的名叫王英豪的队员。

王英豪是江汉石油学院78级的大学生，82年毕业以后分配到了新疆，在1831队工作，后来成了这个队的副队长。他在沙漠里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曾在1987年12月31日一天放炮409炮，创下了沙漠地震勘探日施工效率的全国纪录。

可就在该他出沙漠探亲的前夕，1831队营地搬迁时发生了意外事故，他牺牲了。留下了他的5岁的女儿沙沙，留下了为他含辛茹苦操持家务、带小孩养父母的妻子。牺牲时，他只有27岁……

物探领导部门把王英豪当英雄看待。他的妻子和女儿被接到了库尔勒。我在沙漠腹地知道了王英豪的事迹，出了腹地后，我无论如何也要求到库尔勒去，去

看看他的妻子和女儿。

我记得清清楚楚，到他家时已经是晚上了。听到我和王英豪妻子的谈话，他女儿王沙在里屋叫了起来：“妈妈，来了一位阿姨吗？你让她进来嘛。”

原来，小沙沙已经睡下了。我赶紧进了里屋。我绝对没想到，她开口第一句话就对我说：“阿姨，我爸爸在沙漠里干活，就快回来看我们了！”

说完，沙沙几分得意几分幸福地笑了。天啊，她父亲已经牺牲了一年多了！我的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我强忍着自已才没让眼泪掉下来。我无法正视沙沙那纯纯的目光，我怕我忍不住会大哭起来，我不敢说任何安慰她的话，我不愿意用苍白的好话欺骗一个天真的孩子。我只好把她拥在怀里，满眼潮湿地为她唱起摇篮曲……

那一晚，我和沙沙的妈妈谈了很久很久。你是个男人，你大概永远不会了解一个死了丈夫的年轻女人的痛苦。不过，她的痛苦比别的同样遭遇的女人更深一层，因为有关部门把她丈夫当英雄看待，就不能容忍她再找爱人。要知道，她才仅仅27岁啊！有个男人常来帮助她做事，于是有人就说那人是“乘人之危”，我们这文明古国，什么时候起，帮助人也成了坏事了呢？

第二天，我就去找了她的领导，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没有权力干涉人家的私人生活，她有再选择的自由。让人家27岁就守一辈子寡，你们和封建家族的族长又有什么两样？

或许这样做，是对不起王英豪了。但我觉得，这样做，丝毫没有影响我对大沙漠的深深的爱恋。相反，我更觉得沙漠的感情是复杂的、神秘的，因而也就对我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情怀？

看着彭玉冰那因为激动而显得更俏丽的面庞，我什么也没说。

是的，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也许真的是“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不再思索彭玉冰对沙漠的情感是何种恋情。我忽然明白了，有些事情，特别是感情上的事情，用理智你是永远弄不清楚的。王英豪，张利平，老厨师，物探队员们，彭玉冰，都爱着这沙漠，但爱的方式和原因决不会是完全一样的。就让这些秘密永远藏在他们的心底吧！我们只要知道有一群人在沙漠里默默地为我们的共和国奋斗，他们为了人民的幸福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我们记住他们，这就够了！

古代廉吏拒贿术

●杨开保

唐太宗李世民有句名言：“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深入反腐倡廉的今天，观赏一些古代廉吏的拒贿“法术”，对于我们弘扬为官清廉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推进廉政建设，当不失为一剂“良药”。

良言拒贿

《左传》中记载：宋襄公15年，一人得一洁白无瑕的宝玉，跑去献给大夫子罕，并说：“如此稀世之宝，只有您这样清正的大人才佩带得起！”子罕回答说：“你有你的宝贝，我也有我的‘宝贝’。你的宝贝是美玉，我的‘宝贝’是‘不贪’。假如我收下你的宝贝，那么我们俩都没有宝贝了。咱们还是各自守住自己的宝贝吧！”来人见子罕言衷意诚，只好红着脸将美玉拿走了。从此，“人贵不贪”便成为千古名言。

婉辞拒贿

北宋文豪苏轼曾在京作过大官。一日，其乡友带上厚礼，想求他帮忙谋个一官半职，并说：“如您不便，劳令弟之驾也行。”不便明伤乡情，苏轼便先给来客讲了一则“寓言”。大意是：某人穷极盗墓，数掘无获，便想去掘伯夷、叔齐之墓，只听伯夷在墓里说：“我是在首阳山饿死的，除了一把枯骨，别无一物，何以如尔愿？”盗墓人丧气地说：“那我就挖开叔齐之墓，碰碰运气吧！”伯夷又说：“连我也不过如此，我弟弟就更帮不上忙了！”苏轼的弦外之音是：您的苦衷我知道，但我们兄弟都无法帮忙啊！乡友悟知求官无望，只好知趣地带上礼物走了。

挂联拒贿

清末著名爱国志士林则徐曾以两广巡抚挂帅处理鸦片难题。林素知南方贪、贿二风盛行，上任伊始，便在

衙堂和客室各挂一副对联。一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一为：“求通民情，愿闻已过。”二联一出，准备行贿“走后门”者，纷纷龟缩，贪风大敛，民心大振，终于夺得了禁烟运动的胜利。这种用悬挂对联的方式表明心志，拒收贿礼的方法，类似如今的“颁布政纲”或发表“施政演说”。此法沿习者极多。

诗拒受贿

明代有个名叫吴纳的监察御史，曾受命到贵州考察“三司”吏治。返京途中，已走入四川境内，后面却追来一位骑者，说是奉命向巡按大人献上黄金百两。吴纳一边戏说“姓吴名纳”就是“无纳”之意，一边取笔墨在礼盒上题诗一首，以示拒受。诗云：“萧萧行李东向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言下之意，即使你勉强塞给我了，到前边我也要扔掉，绝不会收受带回。骑者只好原物并诗带回复命。

诗拒行贿

明代还有一个著名政治家名叫于廉，曾任兵部尚书和巡抚等要职多年，向以刚正清廉闻名朝野。他不仅有名诗《石灰咏》历代传诵，还有一首拒绝行贿的诗也颇有名。当时，外官每年回京述职，多有人携带名贵土特产向权臣国戚送礼，而他却每次都是两手空空，不凭关系，只凭政绩。从僚有人劝他随风入俗，明哲保身，他不但谢绝了从僚的好意，还给他题了一首诗：“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国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阖话短长。”明代廉史颇多。吴纳和于廉这两首诗，一首拒受贿，一首拒行贿，堪称“合璧佳作”。“两袖清风”和“沉诸碧波”两句成语，至今还被用来比喻为官清廉，一尘不染。

悬鱼拒贿

东汉灵帝时，有一位“悬鱼太守”闻名朝野，就是南阳太守羊续。一天，有个府丞派人送上几条大鱼，以图巴结。羊续当时忙于批阅公文，未及明拒，那人放下鱼就走了。羊续只好派人把鱼剖开洗净，悬挂于通风之处。几天后，府丞又送来几条鱼，羊续再三推辞。来人问道：“您为何上回收了，这回却不要了？”羊续“啊”了一声，忙叫人取下悬鱼，递给府丞，叫他一块儿拎回去。府丞羞得面红耳赤，连忙悻然离开。这典故，也很有些类似现在的“曝光”了。

沉物拒贿

北宋著名的“包青天”包拯曾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当地盛产一种极为珍贵的特产——端砚，列为朝廷贡品。许多官吏额外加征，或中饱私囊，或贿赂权贵。包拯不但一尘不染，还严格限按贡额征收，余由百姓自由买卖，砚工深为感激。包拯三年任满，老百姓精制一砚，悄悄塞到包公船上。船到采砚石的羚羊峡时，包公让书童查看行李有无端州百姓财物，书童如实禀报。包公一面朝端州百姓鞠躬致谢，一面果断地将砚石掷沉江中。后人为了表彰包公清廉，还特意在其掷砚处修了一座纪念亭，名叫“掷砚亭”。

棍棒拒贿

民间历来有着“当官的不打送礼的”一说，但专打送礼的廉吏也不乏其人——五代时的顾协便是一例。顾协曾任南梁皇帝的诏书起草人，既参与人事，又参与赏罚，相当于现今的机要秘书、人事科长一类的业务，自然想巴结者不少。他有一个学生在府中当听差，无非是当今通信员一类差使。一天，他溜进顾家，捧上一堆金元宝，以谢先师提携之恩。不料顾协怒从中来，厉声喝道：“来人啦，把这个行贿的家伙拉出去打二十大板！”那个门生被打得皮开肉绽，还被赶出了大门，从此再也不敢给谁送礼了。

以死拒贿

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是北宋中期的著名爱国志士。但他两次变法，却被两次罢相，致使改革失败，终于忧愤成疾，卧病江宁（今南京）家中。病危之中，他的门生听说一种优质人参可以帮助治好其病，便买了一包，送到府上，王安石却坚辞不收。门生又亲自煎汤，把勺喂他，他还是闭口拒服。门生无奈含泪离去，王安石却笑了，并说：“只有这样，你我才均不污清名！”竟至病逝。

西陵山下

●鲁 淳

近年来，“炎黄文化热”经久不衰，相对而言，作为“黄帝正妃”的嫫祖却仍受冷落，不少人引为憾事。

以嫫祖文化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以往还未听说开过。今年7月中旬。来自北京、湖南、四川、湖北等地，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神话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热心炎黄文化的人士共50余位，聚集于湖北宜昌市西陵山下，举行1994中华嫫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就嫫祖其人其事，嫫祖文化的形成、内涵、特征和意义，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广泛探讨。

嫫祖是“宜昌姑娘”吗？

同炎帝、黄帝一样，嫫祖这位上古时代的“文化英雄”，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争论的热点之一，是出生地问题。

宜昌的一些同志，经过多年的搜集资料，反复考证，认为嫫祖出生于古西陵，西陵就是现今的宜昌市，并把嫫祖称作“宜昌姑娘”。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记》中，有一段关于嫫祖的记载：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

话嫫祖

——记一次生动活泼的学术研讨会



■宜昌市西陵山上嫫祖庙中的嫫祖塑像

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颡顼也。”

嫫祖为“西陵之女”，人们未置疑。这次会议的会址就在举世闻名的三峡之一西陵峡东口。峡口岸边有一座山，名西陵山。山上原有一始建于晋代的嫫祖庙，1940年毁于日本侵华战火。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宜昌市西陵峡口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等单位集资重建，于会议开幕前落成。这是一座四层阁楼式建筑，古色古香。一尊6.3米高的嫫祖坐像安置在阁楼底层中央。她左手执茧，右手抽丝，神态安祥。登楼顺浩浩长江

西眺，峰险流激的西陵峡就在身前；朝东俯瞰，拦江筑起的葛洲坝水电站尽收眼底，翻开历史地图集，古西陵国的位置恰在今宜昌市。

然而，以“西陵”为名的地方在全国数不胜数。嫫祖这“西陵之女”的西陵究指何处，学术界其说不一。有古国名说，氏族名说，地名说，人名说，还有说是泛指西边的山坡等等。应邀与会的四川盐亭嫫祖文化研究会的同志，列举盐亭有嫫祖山、嫫祖穴、嫫祖坪等，有关嫫祖的遗迹和传说甚多，并以“盐”字古念“咸”，“咸”与“西”、“亭”与“陵”读音相近为据，认为嫫祖生于盐亭，是“盐亭姑娘”。河南有的学者认为，“黄帝居于轩辕之丘”，轩辕丘在河南新郑。司马迁说的“西陵之女”不带“氏”字，表明西陵不是氏族名，就是地名。嫫祖不是另

一个氏族部落之女，应生于黄帝有熊氏族地区之内，具体说即是新郑市黄帝轩辕丘西侧。新郑市西陵附近自古即有嫫祖祠、嫫祖洞，类似说法，陕西、山西、山东等地都有。

另有学者见解不同，认为族名、地名、人名合一，在古史传说中屡见不鲜。“黄帝娶于西陵之女”在《大戴礼记》中即写成“西陵氏”，“西陵”既为地名，也为族名。黄帝族的发源地在今甘肃、陕西边界一带，早期有一支南下，有可能到过今宜昌境与西陵氏部落通婚，衍生出“昌意”族。昌意族的一支又沿长江而上，向西发展，进入蜀地，并与蜀地部落通婚，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即此意。后来，昌意族的一部分迁到今河南的中原地区，构成“颛顼”族的来源之一。黄帝族的传承不仅这一条线。《国语·晋语》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不可只承认某一部分，而否认其他部分。但“西陵之女”的西陵在今宜昌，是可能的。

主办这次会的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宜昌市人民政府。在开幕词中，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冯征，就嫫祖生地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有人说嫫祖是宜昌姑娘，也有人说她是盐亭姑娘、苏州姑娘……等等。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正说明全国人民都纪念嫫祖，嫫祖是一个中国姑娘，这是无可争议的。其实，嫫祖走的地方很多，有以她为象征的蚕丝业及其遗迹的地方更多。各个地区都有理由纪念她，都可以继续找证据，作过一步的研究探讨。”主办单位还一再强调会议宗旨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四化大业，会议要发扬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精神，并有利于团结。这一指导思想受到与会者普遍赞赏。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求大同、存小异，心平气和地切磋探讨的风气，充溢于会议始终。

还有人认为，百姓称嫫祖为“宜昌姑娘”似无不可，只是不宜排斥嫫祖同时也可能是大量遗迹、传说的其他地方的姑娘。古人和今人一样是不断迁徙的，生于甲地，长于乙地，迁至丙地，再迁丁地……这种情况很多。被称为“上海姑娘”的不必生于上海，迁居北京时间稍久，又会有“北京姑娘”的称谓。此其一。以上古时代的社会历史状况言，“西陵”是一个氏族部落的可能性较大。作为一个人，出生地只有一个，作为一个氏族部

落的代表人物，则往往不限一人，何况一庞大的族系。此其二。因此，嫫祖的出生地多说并存，不难理解。这类问题的争论，反映了群众爱祖国爱乡土的深情，作为炎黄子孙对于伟大始祖的仰慕和自豪。适当争一争，可促进有关研究走向深入、知识加速普及的双重效应。

嫫祖是养蚕缫丝的创始人吗？

年岁较长的人提起嫫祖，首先会想到她是养蚕缫丝的创始者，是“蚕神”。在一些蚕丝业发达的地方，这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宜昌蚕丝业有悠久的历史，今天虽不及江浙等地蚕丝业那么名扬中外，仍有相当高的丝绸工艺水平。自古每到传说嫫祖的生日农历三月十五，这里的蚕农祭祀不绝。嫫祖又名嫫祖、皋祖，也叫雷祖。春雷声响，预示解蚕时节开始。嫫祖与蚕丝密不可分，嫫祖文化的内涵，核心在蚕丝文化，精髓在蚕丝文化，重点在蚕丝文化。离开了蚕丝文化说嫫祖，至少会显得贫乏、苍白。不过，在此范畴内，意见也未尽一致，可喜的是共识逐渐增多。

与会的史学家说，《史记》和在此前后的一些史书《山海经》等，载有嫫祖为“黄帝正妃”，却未提养蚕治丝之事。对“先蚕”即蚕业创始人的祀奉，始于南北朝的北齐。起先，人们把蚕业创始者同其他许多创始者一起，归于轩辕黄帝。北周以后，才把西陵氏作为“先蚕”祀奉。后人常引用的，是宋罗泌《路史·后纪五》的一段话：“黄帝无妃西陵氏曰嫫祖，以其始蚕，故又祀为先蚕。”晚于司马迁著《史记》千余年。因此有人认为把嫫祖说成蚕业创始人，不可信。

与会的神话学专家，首重引述晋人干宝编撰《搜神记》中有关“马头娘”的故事：太古之时，一老翁远出，家中一匹牡马由唯一的女儿饲养。一日，女对马说，你若能把我父接回，我即嫁你。马果然挣脱缰绳，找到其父。老翁惊喜，担心家中有事，急速回家。他见马有情，喂以精料，马不吃。老翁奇怪地问女儿是何缘故，女儿以实相告。老翁恐辱家门，杀马将其皮晒于庭院。老翁不在时，女儿对马皮说：“你是畜生，怎能娶人为妻？真是自讨苦吃！”话毕，马皮卷着女儿走了。几天后，老翁

见裹着马皮的女儿化为蚕，栖息在树上。人们说，蚕有少女般娇柔的身躯，又有马形的头。缘此，故名马头娘。养蚕多由妇女操持，为求蚕丝丰收，一些地方蚕女把她作为蚕业的保护神，虔诚信奉。马头娘神话和嫫祖传说共存民间。“先农”炎帝和“先蚕”嫫祖自古并提，反映了我国古代“男耕女织”自然经济的特征，说明蚕业在中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会的考古学专家，以对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印证历史文献的某些论点，并表明古代一些传说决非凭家臆造。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存中，有一个被切去半截的蚕茧，引起学者的极大兴趣。半截蚕茧常人不足挂齿，专家们却据此认定，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已开始养蚕。而这又与黄帝、嫫祖的时代相当，决不是偶然的。在后来发掘的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丝织物的残迹，距今近七千年。至于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丝织品，更令人叹为观止，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丝织工艺水症已经很高。可见中国是丝绸之国，以嫫祖为象征的丝绸文化传播于广阔的疆域。

与会的社会学者以独有的角度论述，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远古时代的传说，事实研究与价值研究应当并重。有些历史事实一时难有定论，其文化价值却不可低估。诸如炎黄二帝和嫫祖这些华夏民族普遍认同、早已深入人心的文化现象，大的脉络理清了，就要着重研究如何发挥其在中华民族凝聚、振兴文面的现实作用。“能精确处当精确，于模糊处且模糊。”对远古传说时代的历史，尤要如此。文化社会学、文化心理学长期被忽视，今天日益见其重要。

当今的科学研究对象越分越细，学科越来越多。正因如此，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现象也越加明显。出席这次研究会的学者们虽学有专攻，却并不各执一端，发言也往往是多角度的，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统观全局，则充分显现集有关学科专家于一堂，共同探讨传统文化的某些课题，可避免局限性，发挥互补性，利于研究的深化。

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中国以古代“四大发明”著称于世，现在看来，除了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之

外，还应加上丝绸，并称“五大发明”。汉代张骞开辟了通向中亚、西亚及至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今天中国的丝绸仍为世人所珍爱。诚然，养蚕缫丝的发明如其他古代重大发明一样，是人民群众世代经验的积累。人民群众既把嫫祖作为发明蚕丝的代表和象征来纪念，只要对此朝健康方向引导，就会起推动蚕丝业进一步发展，丰富和美化人民生活，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何乐不为？

嫫祖为何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炎帝、黄帝是被作为华夏民族的男性始祖来看待和祭祀的。不言而喻，祖先必有男有女。嫫祖既是“黄帝正妃”，理应作为女性始祖受到同样的敬仰、祀奉。事实并非如此。原因何在？不少学者发言中谈及这个问题，进而呼吁重视女性文化的研究。

从事清代宫廷礼仪研究的学者指出，从乾隆帝开始，清代规定每年均祭“先农”与“先蚕”，由皇帝主持祭“先农”，皇后主持祭“先蚕”。可是，对“先蚕”嫫祖的祭祀，规格远远不及“先农”，而且每况愈下，直至最后近乎名存实亡。

作为蚕业之神，在举世闻名的蚕丝之国，尚且未得应有的重视，嫫祖更被忽略的一个方面，是“行神”、“道神”，用今天的话说，即“旅游之神”。宋丁度《集韵·平脂》载：“嫫祖好远游，死于道，后人祀以为行神。”宋张君房辑《轩辕本纪》曰：“帝周游行时，元妃嫫祖死于道，帝祭之以祖神。”传说嫫祖随黄帝南游，死于南岳衡山的路上。今湖南有一山峰，被称嫫祖峰，也叫雷祖峰。正当世界旅游业蓬勃发展之际，纪念这位旅游女神，对我国旅游事业的迎头赶上，不无作用。承办这次会议的宜昌市社科联、市建委和峡口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等单位，着眼于三峡旅游的进一步推向世界，组织与会者作实地考察，并广为宣传嫫祖，把文化与旅游结合，开发嫫祖文化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不能不说是很有远见的。

嫫祖之所以从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是多方面

的，与会专家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有的说，嫫祖其人其事的传说基因，在我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但其定型却较晚，比起炎黄二帝时间短得多；还有的认为，民间传说中嫫祖功德虽然很大，还不及炎黄二帝功德那么多、那么更为重要；还有的说，我国原始社会先民开始以兽皮、树叶蔽体，以后较早用于穿着的是麻织品，丝织品由于工艺比较复杂，长期不能被普遍使用，直至今日仍然如此。大家的共同看法是，中国数千年形成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制约嫫祖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主要原因。“男尊女卑”不仅表现在社会各个方面，还被用一种哲学宇宙观企图加以固定化，这就是《周易·系辞》所谓的“天地尊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引人注目的是，这次嫫祖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的专家学者中，女性占有较大的比例。她们也更注重就嫫祖文化与女性文化的关系畅谈己见。许多人建议，明年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应把嫫祖其人其事作适当介绍和宣传，因为嫫祖不但是中华民族的女性始祖、伟大的母亲，也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是世界妇女的骄傲。她作为发明人的代表，把丝绸奉献于世，以其柔软多姿的质地，绚丽多彩的色调，服务人类，美化人类，特别是女性。

胡耀邦谈

●田方

耀邦同志逝世5周年了。22年以前那次谈话，却始终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1972年夏，我从西安来到北京，住在人民日报招待所。由于耀邦同志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我作为陕西日报的副总编辑，和他打过几次交道，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所以就想去看看看望他。

那时候，林彪已经自取灭亡，“文革”热浪有些降温，但“四人帮”还在台上。我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习仲勋的黑爪牙”，虽则已经查无实据，但并未获得解放，也没有被分配工作。当时我们还不能了解江青、张春桥之流就是“四人帮”，但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反感。特别是1972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突然改变了口号，把原来一段很短时间批“左”又变成了反右（按：1971年9月林彪垮台后，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新闻单位和舆论机关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但，很快“四人帮”就指出林彪是“形左实右，右得不能再右了”，要继续反右），也使人莫名其妙。总之，满脑子的疑团解不开。

刚到北京，我先到协和医院看望耀邦同志，表示慰问和思念之情。不久，他出了院，我和我爱人就到八面槽富强胡同他的住宅去看望。当时，他还是被赶住在后院，我们是从旁边的小门进去的。没有料到的是，一见面，他就朗声拍案而起：

“田方，你来的正好！你看鲁迅《伪自由书》中这篇文章写的多好！”只见他在那篇《“有名无实”的反驳》文章中，用红铅笔划了好多道道。

这是鲁迅就1933年5月17日上海《申报》上的一篇杂文。一位特约通信的记者访问了从长城抗日前线调防下来的一个排长。那个排长对国民党当局花了三、四十万元在前线构筑了阵地及掩蔽部，却因为长城的一个要隘冷口的失陷而不战而退，深表痛心。原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值得称庆，结果事与愿违，不禁感叹：“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

鲁迅就是对这件事发的议论：“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第一，他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得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第二，……，第三，……，第四，……。”鲁迅怪那个排长：“这是不懂命理：中国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痴呆的排长，难怪他连叫两个‘不幸’，居然自己承认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其实究竟是谁‘有名无实’，他是始终没有弄懂的。”

耀邦同志是那样高兴地把他发现这个道理告诉我：“田方，你看，

鲁迅杂文

“圆梦”播出之后

●郭 旭

林彪虽然垮台了，但是林彪那套主义不是还在台上吗？”

啊！真是一针见血。我来时正要向耀邦同志请教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

那天，耀邦同志还说，他在西安时，被左倾分子整了以后，“我就害了怕，从西安开小差到了北京。其实，怕什么呢？我就顶在那里，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所以，你也不要以为我胡耀邦有什么了不起，人没有武器是不行的！”

是呀！林彪灭亡以后，我作为“反党分子习仲勋的黑爪牙”，为什么迟迟不能平反、不能解放！？甚至当时的陕西日报上还时时出现批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文章，我似乎也有点明白了。

鲁迅这篇文章已经过去60多年了，耀邦同志那次谈话也过去20多年了。时移境迁，今非昔比，但是，历史的教训不可忘记，即使留下一点“左”的或右的残余，也还是有它一定的土壤的，这是不足为怪的。这也可以使人们有个比较，要不然，也难于显示出正确的正确来。问题是，人们不要像那个痴呆的排长那样，不懂得究竟是谁“有名无实”。

写完这篇短文，正好看到“羽田孜当选日本新首相”以及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衷心祝贺”的新闻报道；又在当天《参考消息》上看到法新社东京4月22日电：这位58岁的政治家去年说：“我们应告知我们所有的儿童，他们的前人在过去通过发动战争做过什么事情，否则，人民的头脑将继续是模糊的。”不说别的，我对羽田孜这番话就很赞同。这不仅大大有利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而且，这话对我们也大有启迪：“我们也应该告知我们所有的儿童，他们的前人在过去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做过什么事情。否则，人民的头脑也将继续是模糊的。”

责任编辑 方 实

那天，我打开电视机，这时画面上出现了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下面打出一行字“18分钟经济社会·圆梦”，电视记录片吸引了我，我带着好奇心看了下去，原来片中记录着边远山区的失学儿童在北京肯德基员工的帮助下来北京参观游玩的事。

画面上，肯德基的叔叔阿姨带着他们来到赛特购物中心选购商品。从他们那一双双惊奇的眼睛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头一回来北京，第一次看到了这么多的玩具。

他们中有一个小女孩走到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娃娃跟前看了又看，还摸了摸洋娃娃手上戴着的戒指和美丽的大白纱裙，又把它抱了起来，可以看出她非常喜欢这个洋娃娃，但是最后她还是把洋娃娃放回了货架。一位记者叔叔问她为什么不买这个洋娃娃，小姑娘诚恳地回答：“我只带了三十元，这还是妈妈向邻居借的。再说我爸爸有重病，一直卧床不起，这钱也要拿回去给爸爸治病。再说我今天能上学能来北京还是叔叔、阿姨帮助的结果，我怎么能乱花钱呢？”听完这段话，使我深受感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真不知比他们强多少倍。

“圆梦”又介绍了这些孩子在北京的生活状况，最后，肯德基公司经理说了一番话非常有意义：“肯德基员工的力量是小，如果全社会都支援希望工程，为失学儿童送去千千万万颗爱心，这对祖国的建设也是一个惊人的贡献。”

“圆梦”结束了，但我们全家人还沉浸在这个故事之中，爸爸满怀深情地说：“‘希望工程’是个伟大的工程，它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每个人都应该参加进来，‘希望工程’才能取得伟大的成绩。”妈妈也感慨地讲：“看到这些孩子回到了课堂，我都替他们高兴，只有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才会有这样动人的故事。”这时我仿佛想起了什么，对爸爸、妈妈说：“咱们也为‘希望工程’捐点款吧！”话音刚落，全家人都鼓起掌来，我兴奋地拿起话筒，拨通了“希望工程”热线电话……

愿这小小的话筒带去我对山区孩子们的一点心愿，带去我们全家，不，是首都人民对他们的期望。望他们刻苦学习，早日学好本领，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家乡一穷二白的旧貌，让丰收的赞歌从他们的家乡传到北京来。

『505』为我解忧



权延赤，著名作家。1970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后参军入伍，历任话务员，无线电技师，指导员，大队副政委，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空军政治部专业作家。1976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近400万字，曾12次获省以上文学创作奖。长篇纪实文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红墙内外》、《领袖泪》等一经发表，即在文坛产生巨大轰动效应，为世人争相传诵。

我年轻时，身体很棒。我曾在水泥搅拌场扛水泥袋，一干就是12个小时。也曾迁安矿山开山凿洞，18磅的大锤一口气能抡100下！在内蒙古当兵时，整个冬天睡在草棚里，我照样活得结实，自在。那时，我就好喝酒，一次能喝2斤，身体从未有过“不适”。至多出点洋相。40岁过后，酒量不如以前，而且易醉，难受，肝部隐隐作痛。心里不免有些忧虑：酒毕竟是我多年的“好友”了，又如何戒得了！？

前几个月，我试用了一个朋友送来的505元气袋，竟去了心头之忧。果然如朋友所说：“此物能治杂症。”我带了不到一个月，酒后，尤其是醉后，不再难受了，肝痛也减轻了许多。腹部常有温热感，越发身壮气顺似的。505确实不错，值得一用。

请订阅《期刊锦绣》大型文摘月刊

格调高雅知识性与科学性并举
内容新颖可读性与资料性兼容

为繁荣我国的期刊事业，适应新形势下文化市场的发展和读者的需要，中国期刊协会将于1995年1月创办一份新型刊物《期刊锦绣》。她是一份采编中外期刊佳秀，以刊摘为主的综合性文化刊物。坚持思想性与知识性完美结合为选发稿件的最高准则，选载、摘编中外期刊兼及报纸发表的优秀文章，同时适当组织一些社会上热门话题的自撰稿，以此向读者奉献出营养丰富、精美可口的精神食粮，使读者在饶有兴趣的、轻松愉快的阅读过程中，增进创造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并能使读者在思想、情操、知识以及生活指导等方面有所获益。

《期刊锦绣》本着杂志内容“个性化”，设计创作“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在编辑手法上将站在新的高度探索创新，不拘成规；在风格上力求质朴温馨，不俗不媚；在外观上力

求新颖大方，不逐妖艳；在栏目设计上将以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纷呈，代表选发稿件不同的范畴与内容，以反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以及我国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

《期刊锦绣》是中国期刊协会所主办的刊物，她将以全国七千多种期刊作为自己的后盾，力争起到为全国期刊服务的作用，并团结协作，为促进我国期刊向高水平发展，共同努力。

《期刊锦绣》是大型文摘月刊，大16开本，84页，彩印四封，定价3.6元。第一期将于1995年1月11日出版，以后每期于每月11日陆续出版。本刊交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向全国公开发行人，邮发代号：82—619可到当地邮局订阅。如漏订漏购，可与本社联系办理邮购手续，另加10%邮购费。本社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2号。邮编：100727。电话：4016886。联系人：郭玉华、阎中英。

博采众花酿新蜜，《期刊锦绣》为中外期刊之精华博览，一刊到手可领略千万里旖旎风光。她五光徘徊，十色陆离，视野缤纷，风神别具，自成一格，将以全新面貌与读者见面。为博识文萃，活跃精神，请您订阅《期刊锦绣》！

炎黄春秋



东北抗日英雄马占山传奇

兴建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内情写真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其人其事

世界“屋脊”上的神秘宫殿

古代廉吏拒贿术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3.20元